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

Andre Gunder Frank

［德国］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著

高铦 高戈 译

人文与社会译丛

刘东 黄平 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

[德国]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著
高铦 高戈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德）弗兰克（Frank，A.G.）著；高铦，高戈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12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ISBN 7-80567-981-9

Ⅰ.依… Ⅱ.①弗… ②高… ③高… Ⅲ.①生产关系 研究-不发达地区 ②商品交换-研究-不发达地区 ③地区经济-研究-不发达地区 Ⅳ.F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5053 号

登记号 图字：10-1997-01号

书　　名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
作　　者　[德国]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译　　者　高铦　高戈
责任编辑　府建明
原文出版　Monthly Review Press，197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2
字　　数　195 千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81-9/I·617
定　　价　13.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的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唯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砖窑

译者说明

在发展研究中，underdevelopment 一词一般均译为"不发达"。与此相关联，有"不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y)、"不发达(问题)理论"(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不发达的发达"命题(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等词语。作为与"发达/发展"(development)相对的"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指的是一国或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扭曲与滞后的状态，犹如生物成长的"发育不良"，而不仅仅是"未发展的"(undeveloped)状况。underdevelopment 一词后来也译为"欠发达"。本书中仍译为"不发达"。另外，书中原有的着重号，一律改排黑体字予以突出。

纪念我的智利学生、朋友和同志

达戈维托·佩雷斯·巴尔加斯

他把理论问题抛在脑后，
为了反对靠依附、不发达和剥削求积累
而英勇战斗，壮烈牺牲！

序　　言

XI

本书试图通过对世界资本积累进程中依附性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分析，来说明不发达的问题。因此选用了本书的书名。

我们把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或时期：重商主义阶段（1500—1770）、工业资本主义阶段（1770—1870）以及帝国主义阶段（1870—1930）。每个时期先以历史章节进行研讨，提出世界资本积累进程中的重要发展，特别集中于宗主与外围之间的“交换”关系，然后进而分析亚洲、非洲与美洲各主要地区中依附性“内部”生产关系和不发达的发展的联系性变化。每一历史章节以后接着“理论”章节，讨论每个时期出现的一个社会—经济理论（以及历史事实）的重要问题：为什么美洲新世界的不同部分——具体来说，一方面是采矿业地区和种植园地区，另一方面是北美洲的东北部殖民地——在重商主义时期走上了不发达和发展的不同道路；为什么现在的不发达国家没有经历类似于西欧以及北美和澳大利亚新移民区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以及从那时以来）的内部市场发展；国际分工——尤其是现在不发达地区最被忽视的商品出超——如何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西欧资本积累，以及西欧对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投资。

本书大部分是1969年和1970年间在智利写作的，其余部分主要是1972年和1973年间在智利修改的。其后的情况影响 XII

了它的写作，读者们应记住这一点。本书作者过去曾通过他的《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一书(写作于1963—1965年，1967—1971年间出版了多种版本)，以及其他一些著作，对创建不发达问题的"依附论"观点作出了贡献。1968年和1969年，我设法把这种"依附论"观点应用于研究其他地区，我和萨义德·A.沙编写了一本篇幅很大的《不发达问题读物》，着重谈了亚洲、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的依附性。本书的第一稿和第二稿是在1969年10月和1970年2月写的，当时打算用作《不发达问题读物》第1卷(历史卷)的理论导论(同时，有关当代不发达问题的第2卷正在编写中)。对依附问题的强调，以及以"第三世界"各个主要地区的历史经验来分析依附问题，依然是当前出版的本书的特点。

与此同时，本书作者和其他人对依附性的分析却成为越来越多批评的对象。批评者认为我们的观点(1)强调了"外部"交换关系而实际上忽视了"内部"生产方式；(2)没有充分考虑拉丁美洲及世界不同部分的差异，没有充分考虑发展的不同阶段；(3)没有真正对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的历史进程进行辩证的动态分析，在这种资本积累中，宗主国经济发展与附属国外围的不发达理应作为单一进程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第一点是最常见的批评，乔瓦尼·阿里吉和萨米尔·阿明在对本书第二稿的批评中重申了这一点；当时阿明正在撰写他的《世界范围的积累》，批评本书第二稿未能充分区分和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阶段(以及"以拉丁美洲目光观察一切")。第三点批评特别来自本书作者自身，并反映了我的信念，这已经在《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一书的序言中谈过，认为有必要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单一体系的历史发展。

这些不足之处和批评意见导致我在1970年7月间撰写第

三稿(共有160页,包括了前两稿的材料),我试图同时对付上述三点批评与挑战:(1)通过"内部"关系(也许不是生产方式)来分析依附性,说明它们共同决定并联系"外部"交换关系——特别是(虽并非全然是)与宗主国的交换关系;(2)研讨资本积累或负积累历史进程的"内部"决定性动力及其可区分的发展或不发达阶段;(3)把所有这些因素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单一体系的单一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这意味着强调资本积累进程,但尽可能在世界单一历史进程的每个阶段中同时观察世界各个部分的不同方式,而不是像我在《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不发达问题读物》以及本书第一、二稿中那样依次谈论地区史或国家史,只稍稍联系整个进程,根本不联系彼此的情况。当然,这种做法就不去考虑原先要"介绍"那本《不发达问题读物》的意图了,而本书1970年第三稿的长度与范围也有了质的变化。

这一稿当时题为《走向资本主义不发达问题理论》,后来即成为本书,它试图超越"依附论"观点,但并非放弃这种观点或者对不发达问题的关注,而是要进而把依附性和不发达结合在世界积累进程之中。第二稿一开始就讨论这种理论过渡所提出的理论问题(部分内容反映在本书导论中),设法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走向另一个历史阶段;并通过对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之间关系的分析,设法一方面研讨世界各主要地区在每一发展阶段对世界资本积累进程所作的不同贡献,另一方面分析现在不发达"第三世界"中各个主要地区在参与世界积累时造成的不发达后果。

这种尝试即使取得一点成功,也是非常局部的(虽然,手稿的有些读者,例如欧内斯特·曼德尔在他的《论文》新版的"后记"中认为这种尝试是一大进展——或许就本文作者过去的落后而言)。把第三稿修改得稍能令人满意的想法却因1970年9月阿

连德在智利取得竞选胜利以后的其他事态而受到阻挠。后来，局部的修改在两个不同方面取得进展。一个方面是通过调查积累周期（即使在前工业时代，积累周期也是明显可辨的），以及调查世界各部分在各个时期或者至少在每一周期的各个阶段中的相互关系或相关的同时参与，从而扩大并加深历史分析。这项历史工作主要是在 1973 年进行的，它把本书的第二章从 20 来页扩充到 250 页。这项工作原定要做到当前，却被 1973 年的智利政变所阻断，然后又因本书作者缺乏研究资料而受阻；现在则以《1492 至 1789 年的世界积累》为题，成书出版了。

对 1970 年第三稿的另一个方面的修改，是撰写三篇长文并在 1972 和 1973 年以及其后时期中作了很大修改，以处理 1970 年草稿中未曾得到满意解决的某些理论问题。第一篇文章（现为本书第二章），即《论新世界发展与不发达的根源：斯密与马克思对韦伯派学者》，试图回答为什么新世界的各个殖民地早在殖民地时代就已经走上发展与不发达的不同方向。通过对墨西哥和秘鲁的采矿业经济、西班牙领地的自耕农农业区、巴西的种植园体系、加勒比地区和（后来的）美国南部，以及新英格兰等地"内部生产关系"与"外部交换关系"的结合，进行连续的、比较的调研以后，就得出这样的论点："殖民地"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结合，促成不发达的发展的开始，而新英格兰由于"故意被置之不理"而缺乏这种结合，却反而使它能够（虽然是不够的）经历了发展，其他自耕农社会则不在此例。使新英格兰进一步突出的因素是它特殊的"半外围"中间地位（根据沃勒斯坦的提法），或者在世界资本积累进程中的"原始次帝国主义式"的插手和参与，加上它在三角贸易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得到重要的商业资本积累以及最终对新英格兰和中部大西洋诸殖民地的工业化进行投资。这一章还提出亚当·斯密（以及卡尔·马克思）的读物来支

持这一论点的主体部分，同时还反对或修正从亚当·斯密到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也包括美国许多左翼与右翼历史学家以及本书作者过去的著作）的传统论点，即：内部市场的发展是和自耕农农业社会中存在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和相对的政治民主有关的。

第二篇理论文章的题目（即本书第五章），套用了亚当·斯密著名格言的用语：《内部市场的规模受国际分工与生产关系所限制》。这篇论文也修正了本书作者对收入分配在内部市场发展中的作用的早先立场（在《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一书以及本书的前几稿中的立场），并提出了以下的问题：如果不是收入分配，那么是什么决定内部市场的发展？为什么在有些时间和地点发展，而在其他时间和地点却不发展？原料生产与出口同内部市场的发展及本国生产制成品和资本货币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先对一些关于比较利益、自由贸易和贸易条件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古典派、新古典派和改良派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调研；然后，通过以"二元论"理论来讨论内部市场的规模与形成，研讨了主产品理论、联系效应、新生工业以及进口替代政策和技术的差距；最后，我调研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进程中部门区划与阶级利益的关系。关于内部市场形成的讨论超越了前工业发展的历史情况，并且涉及到（而且是主要涉及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期间出现的发展经验与问题。

第三篇理论长文（即本书第七章）论述《多边商品贸易失衡及不平衡经济发展》，研讨了1870至1930年古典帝国主义期间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重点不在更为正统的国际收支（包括劳务收支），而在实际商品贸易格局以及它的失衡（即现在的世界不发达地区对现在的发达地区的实际出超）如何促成了后者

的发展和前者的不发达。因此，这三篇长文或章节研讨了1970年稿中提出的关于资本积累、依附性和不发达的若干理论问题，本书导论性的第一章重述了这些问题。

然而，全球的历史情况以及亚洲、非洲和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生产方式转变情况，在三篇论文和章节中并未明白显示。所以，上述各“理论”章节以前都安排一篇“历史”章节（把1970年稿中的历史材料重行结合进来），它提出了总的历史背景供理论分析并以此与世界各主要地区（包括部分欧洲宗主国和北美）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第二章1500—1800重商主义时期，第四章工业革命与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以及第六章到1930年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中生产方式的转变联系起来。这些章节篇幅较短，因为部分历史材料已包括在“理论”章节之内，还因为对其他历史材料的修改大大扩充了内容而使上述各时期中的最早时期已单独成书出版（上文已说明过）。我希望这种简要的历史回顾仍然有助于使这项课题从一开始就能再度确立历史与理论的统一。

我深深感谢萨义德·沙对本书的重大贡献，还要感谢其他许多一直提供批评意见的人们，但他们可能不愿对本书内容负责。在他们之中，我已提到了吉奥瓦尼·阿里吉和萨米尔·阿明，我还必须加上欧内斯特·曼德尔、保罗·斯威济、哈里·麦格道夫、乌尔斯·穆勒·普兰腾堡，以及特别是我在智利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朋友们和同事们鲁伊·毛罗·马里尼、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海梅·托雷斯等等，以及我在智利的许多学生——他们中仍然在世的，在当前情况下以不提名为好，其他一些人中特别是我的朋友达戈维托·佩雷斯，他为了结束靠依附、剥削和不发达求积累而英勇战斗，在1975年10月16日惨遭军政府杀害。愿他的事业与英名永存！

下列各章以前曾以同样内容或类似内容发表于下列期刊：

第三章发表于《国际社会学评论》（罗马大学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学刊）1974 年 8—12 月，第 2 集，第 10 卷，第 2—3 期，罗马；修改稿发表于《理论与社会》（艾尔斯维尔科学出版公司）1975 年第 2 期，阿姆斯特丹。

第五章发表于《经济与政治周刊》1976 年 2 月，年序号第 11 卷第 5—7 期，孟买。

第七章发表于《欧洲经济史杂志》（罗马银行），1976 年秋季，第 5 卷第 2 期，罗马。

本书作者感谢德国斯塔恩堡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和德国和平与冲突研究基金会的经济支持，使我得以修改先前的几稿并撰写成本书出版。

A. G. 弗兰克于法兰克福

鸣　谢

本书作者与出版商感谢以下各方惠然应允我们引用版权保护的材料：

乔治·艾伦与昂温有限公司同意引用保罗·拉马丁·耶茨所著《外贸四十年》一书中的一张表格。

奥古斯塔斯·M.凯利出版社同意引用盖伊·史蒂文·卡伦德所著《1765—1860 年美国经济史选读》一书中的一段话。

利物浦大学出版社同意引用 S. F.索尔所著《英国海外贸易研究，1870—1914》一书中的一段话。

W. W.诺顿公司同意引用 J. B.康德利夫所著《各国商业》一书中的一张图表。

兰登书屋同意引用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一书中的一段话。

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有限公司和每月评论出版社同意引用罗莎·卢森堡所著《资本积累》一书中的一段话。

彼得·史密斯出版公司同意引用刘易斯·C.格雷所著《南部诸州农业史，至 1860 年》一书中的一段话。

题　　铭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48年

目　录

序　言 ………………………………………………… 1

鸣　谢 ………………………………………………… 8

题　铭 ………………………………………………… 1

第一章　导引问题 …………………………………… 1

一、"内部"决定对"外部"决定的问题 ……………… 2

二、分期的问题 ……………………………………… 7

三、生产与交换的问题 ……………………………… 10

第二章　世界资本积累、贸易格局与生产方式，1500—1770 ………………………… 14

一、贸易三角 ………………………………………… 15

二、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生产方式转变的差别 …………… 18

第三章　论新世界发展与不发达的根源：亚当·斯密与马克思对韦伯派学者 ………………… 26

一、关于韦伯的理论 ………………………………… 26

(1)韦伯理论的意义 ………………………………… 26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29

(3)非正统派韦伯幸存 ……………………………… 32

二、关于亚当·斯密与新世界 ……………………… 35

三、关于卡尔·马克思与资本积累 ………………… 40

四、关于世界资本积累、国际交换和新世界的多种生产方式 ………………………………………… 46

(1)墨西哥与秘鲁的采矿业经济……………………… 48
(2)西班牙领地的自耕农农业………………………… 50
(3)转型:巴巴多斯实例 ……………………………… 54
(4)加勒比和巴西的种植园制度……………………… 55
(5)美国南方:奴隶种植园对农业 …………………… 58
(6)美国东北部:农业对外贸 ………………………… 62
(7)尾声——迟了两个世纪…………………………… 73
第四章　工业革命与英国统治下的和平,1770—1870 ………………………………………… 75
一、宗主国资本积累与欧洲工业革命……………… 76
二、资产阶级的工业政策和新的国际分工………… 80
三、北美……………………………………………… 84
四、拉丁美洲………………………………………… 87
五、印度……………………………………………… 92
第五章　国内市场的范围受国际分工与生产关系的限制 ………………………………………… 97
一、关于贸易………………………………………… 98
(1)关于古典派与改良派 ……………………………… 98
(2)关于比较利益与自由贸易………………………… 99
(3)关于贸易条件的恶化 …………………………… 106
(4)关于不平等交换 ………………………………… 108
二、关于市场 ……………………………………… 116
(5)关于二元结构 …………………………………… 116
(6)关于主产品理论 ………………………………… 117
(7)关于联系效应 …………………………………… 119
(8)关于发展国内市场 ……………………………… 127

(9)关于新兴工业和进口替代 …………………………… 134
(10)关于分工与技术差距…………………………………… 136
三、关于生产与积累 ………………………………………… 139
(11)关于经济部门与阶级…………………………………… 139
第六章　帝国主义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生产方式的转变，1870—1930 ………………… 146
一、罗莎·卢森堡论帝国主义对自然经济与农民经济的斗争 ………………………………………………… 147
二、帝国主义在亚洲 ……………………………………… 152
三、帝国主义与阿拉伯世界 ……………………………… 160
四、帝国主义与非洲 ……………………………………… 163
五、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 ………………………………… 170
第七章　多边商品贸易不平衡与不均衡经济发展…179
一、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格局 ……………………………… 180
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对宗主国积累与海外投资的资本贡献 ……………………………………………… 196
三、统计与方法论附录 …………………………………… 207
参考书目 ……………………………………………… 218
索　引 ………………………………………………… 241

第一章

导引问题

本书以及这些导引问题是试图突破“发展理论”的恶性循环。最最当代的(即新古典派)发展理论家都作茧自缚地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他们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穷,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富(缪达尔,1957)。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低水平平衡陷阱”(莱本斯坦)是通过凯恩斯式的需求或市场交换方面而显露的:由于穷人无力支付、富人投资就不能得利,因此穷人就始终受穷。其他经济学家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人文地理学)则从供应或生产方面陷入恶性循环:他们的理论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缺乏资本、企业家才干以及其他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政治素质,这些理论家认为这都是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而为投资与发展所必需。大多数当代的理论家作茧自缚地陷入了狭窄的理论恶性循环,这有效地界定了他们自身创造的理论局限而不符合发展与不发达问题的现实,因此他们无法解释国贫与国富的性质和原因,有关的决策者们就更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了。为了突破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建议重新回复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其作为出发点,并设法根据后来的历史发展与理论发展使之发扬光大。

为了摆脱狭窄而局限的新古典派理论无法对国富与国贫的性质与原因进行认真的研究,我们可以将亚当·斯密的全球历史观和卡尔·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分析法作为出发点,设法推进一种

2 包罗全世界的全盘性的、反映真实世界历史的、具有社会结构性的(所以实际在理论上就是辩证的)发展与不发达理论。这项任务要求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据和记录进行科学的调研,并根据这种证据来更好地在阿尔都塞的意义上重温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而这一切却是新古典派“发展理论”故意回避的。我们秉着这个目的和这种精神,综观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参与这种世界范围历史进程的情况;我们强调,这些地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从属性依附地位就是它们不发达的发展的原因所在。现在的理论论文试图从“依附论”观点再前进一步,并建议研究资本积累进程为国富与国贫的决定性本质与原因。所以,本书及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温”,也是对既有历史记录与证据的重新审察。

一、“内部”决定对“外部”决定的问题

我们可以研讨这个问题:发展与不发达对发生着变化的社会单位而言是由内部还是由外部决定的?其决定领域是生产领域还是交换领域,抑或二者兼有?

马克思说:“现代生产方式只有在它的条件已经在内部形成的地方才发展起来。”毛泽东说:“适当的温度只能使鸡蛋变化为鸡子,但不能使石头变化为鸡子。”然而,一切古典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包括亚当·斯密、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认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宗主国及其亚、非、拉殖民地之间的交换关系和统治关系,对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或者说历史不发达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试图说明或解释(了解,更不用说干预)世界历史进程的后者,却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理论问题。我们的理论分析怎么能既承认殖民地“内

部"生产进程的首要性，又使它与兼具决定性的"外部"交换关系及其他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依附关系调和或结合起来呢？亚当·斯密对此帮助有限（虽然我们下面将引述他对殖民地的分析），因为他倾向于着重交换而排除生产，甚至有一处提出殖民地的不幸"似乎是偶然造成的"。马克思之专注于宗主国的生产进程，使他把我们的问题归入他永远不打算撰写的一卷《资本论》之中，而与此同时他认为国际贸易的这些后果"真正超越了我们的（他的）分析范围"，他在结束《资本论》第一卷中短短的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时承认："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843 页）

其他人提出并回答了内部决定对外部决定的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

>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89—291 页）

帕洛伊在特别谈我们的问题时用同样的语调写道："就我来说，我认为应当从主宰经济的（内部）情势开始，以便在连锁的另一端看到它通过不平等交换对他人发展的影响。不平等交换是一种中继，一种联系，其本身不是目的。"（帕洛伊，书目 1969 a，第 221 页）

但是帕洛伊在别处谈到不发达国家时继续说："外部动力决不能导致内部动力，相反却追随内部动力；它不是自主的，而是被内部动力所诱导的。除此以外，所谓外部动力只是内部动力所提问题的外部表现而已。"（帕洛伊，书目 1969 b，第 21 页）

贝特尔海姆同样认为：

> 富国对穷国的"剥削"……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被统治国"渗透"的重要事实，以及资本运动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引起的结构变化。……所以，有必要把每个"国家"视为构成某种以特殊结构为特点的，以及以存在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阶级为显著特点的社会形态。正是这种结构决定了各种社会形态介入国际生产关系的方式。这里我们又发现了这个基本主张：剥削关系不能在'交换水平'上构成；它们必须植根于生产的水平上，没有生产，交换无法更新。（贝特尔海姆，见埃马纽埃尔书目，1969，第 325 页）

这些考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理想而言，我们应当设法对全世界整个资本主义积累进程以及对随之而来的全世界生产方式的变化进行历史的理论分析。但是这项任务所必需的

分析和理论发展却超越了本文和本书的范畴。这对于该范畴内可以适当产生不发达理论,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但是,适合于分析全世界资本主义积累和发展(及不发达)的理论,其发展速度仍然超乎我们的想象:自列宁以及近半个世纪后的巴伦与斯威济以来,对这一全球性理论提出重大突破的著作为数寥寥,为时 5 颇晚——而且主要面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发达部分:帕洛伊所著《开放经济中的增长问题》(1969),伊曼纽尔所著《不平等交换》(1969),以及阿明最为雄心勃勃的著作《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积累的理论》(在本书写作时尚未出版)诸研究作品。所以,我们首先对不发达国家不发达问题及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的研究,其实际局限并非任意提出,而是必然存在的。

这种局限反过来又给我们提出了它自身的理论与阐述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首先观察资本主义宗主国的生产方式与资本积累。我们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简单地来一个互换,从宗主国内部换到殖民地内部呢?不能,这样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只会在科学上和政治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批评意见见弗兰克书目,1969;瓦伊塔尔书目,1968。)我们能不能把殖民地简单地看成是一些受到宗主国外部力量无辜侵害(或拯救)的国家呢?不能,这些自命的"结构主义者",例如这样做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分子们,只是提出一些依附征象的表面现象,而转移了我们对"外部依附性"的基本内部性质或原因的注意。(批评意见见拉米雷斯书目,1966;多斯·桑托斯书目,1969;弗兰克书目,1969。)那么我们如何既能分析殖民地的"内部"生产方式和积累或不积累,又仍然充分考虑到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外部"交换关系和资本流动的殖民依附呢?

为了在我们的分析中遵循这种辩证程序(正如帕洛伊和贝特尔海姆被迫所做的),我们就必然要回头研讨整个世界资本主

义体系的内部矛盾以及其中的宗主国。而且，为了让这些标准使用恰当，我们的分析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是同步、动态而辩证的：它必须分析世界体系各个部分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同时相互作用，并观察它们的矛盾在随后的各个时期如何产生它们的性质和相互作用。这仍然超越我们此时的能力，但以后在弗兰克的《世界积累，1492—1789》以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作了尝试。

6 另一方面，我们在本书中专门注意了（虽然仍然很不充分）世界资本主义的和宗主国的资本积累与发展的内部动力；我们还尝试着进行同步分析：试图指明世界资本主义积累与发展直到晚近的三大历史阶段；我们又考察每一阶段的全世界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如何导致下一阶段的发展。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发达部分，我们特别设法强调形成其生产方式特点的主要内部矛盾。尽管我们有这些良好的意愿，我们在这方面的局限可能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质量上的。

在评论本文的早先一稿时，我们的朋友乔瓦尼·阿里吉正确地说道："现在我来谈更加基本的问题。在整篇导论中，如同你们以前的作品，对内部结构的分析总是从属于对外部条件的分析。那就是说，你们采取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的"形而上学观"。对事物发展的解释，首先不是从它们的内部结构与矛盾中去寻找，要分析它们（一旦认清以后）与外部条件的辩证相互作用。你们却是寻找现象与内部结构和矛盾的外部决定因素。……换句话说，我认为你们没有信守自己的保证：辩证地分析不平等交换与社会生产条件所强加于生产要素的种种局限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倾向的主要方面是使阶级分析从属于殖民地结构的分析。两者能够而且必须结合起来。……毛泽东的观点与你们的观点之间的差别在于：在前者，殖民地结构是阶级分

析中'固有的';而在你们的作品中,则是阶级结构分析(在进行时)是殖民地结构分析中'固有的'。虽然结论往往是类似的,这两种观点却在两大方面有所差异:(a)……你们的观点往往反对把历史力量与矛盾等同起来,而它们都能产生革命结构变化。……(b)更为基本的是,你们的观点喜好概括(而概括与抽象相反,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因此不鼓励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真髓(虽然事实上你们的结论却来自具体分析);在政治上,概括当然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采取一些往往与有待变革的内在矛盾无关的行动。……"(阿里吉,个人通信,1970 年 3 月 23 日。这同一论点的长篇内容后来发表在两篇文章中,1970,1972)

这里,我们当然要避免阿里吉提到的错误。但是我们的数量局限有时排除了把"外部"因素的分析作为世界资本主义或宗主国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而我们的质量局限又使我们令殖民地的内部矛盾脱离其正确位置以分析依附性外部原因,毛泽东对此并不排除,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更不用说新古典派理论家了——则在调研不发达问题时对此忽视。我们设法不要概括特定的具体经验,而要把支撑和支配这种具体现实的一般原则加以抽象,使这些原则在各个时间与地点更有效地用于改变具体现实。

二、分期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其他学者也面临分期问题,目的与我们类似,但并不一样。在这些学者中,我们可以提到普里奥巴曾斯基、曼德尔和阿明。普里奥巴曾斯基在 20 年代讨论原始积累时写道:

> 对于以经济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史，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青年资本主义时期，理论上是自由竞争但事实上是垄断。……这个时期以后，接着是自由竞争时期。……最后是第三个时期，即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由于建立了一种全国——资本主义机制的体系，……我们在一方面看到每个大资本主义殖民强国倾向于把它的内部市场垄断化扩充到殖民地去并以武力来保卫这种权利。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输出到殖民地，来自殖民地的剩余利润越来越成为来自同样技术水平而工资较低的企业剩余利润的形式。这种从一种剥削逐渐转移到另一种……（普里奥巴曾斯基，94—5）

曼德尔划分了类似的时期，强调了每个时期中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典型交换关系：

>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剩余价值的起源与占用因此构成了三个不同时段的辩证统一：以不等价为基础的不平等交换；以等价为基础的平等交换；以等价为基础的不平等交换。只有考虑了这三个历史时段，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资本在西方世界里是怎样起源的？它是怎么增长的？它是怎么扩张到世界大部分地方去的？因此，这种初步回顾已经使我们面临两大时段——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平等交换；当代世界商业中心的不平等交换——以及西方资本与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曼德尔《原始积累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英语版译自法语原文，西班牙语译文载哈瓦那《思想评论》第36期。由于打字错误，法语原文的三个时段缺了两个，但在西班牙语版中补上了。）

曼德尔的各个阶段在历史时间上大体相当于普里奥巴曾斯基的古典阶段，但我们将在下面注意到，宗主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三类交换关系并不是所有殖民地在确切的同样时间里总是经历到的。

萨米尔·阿明对于结构性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兴趣与我们相类似，但是他对《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一书的撰写范围则大大超过我们，而划分的阶段则类似。他更加关注殖民地在三个阶段的世界（即宗主国）资本积累进程中的不同地位或功能；他也同样谈到特定殖民地或殖民地集团后来经历的特定的结构性不发达进程和类型。阿明总结称（他在一封个人来信中评论本文的早先一稿。——他不想把评论公开发表）：

> 我划分三个时期：(1)重商主义，(2)发达资本主义（后工业革命，前垄断），以及(3)帝国主义。在每一时期中，外围地区都有相应的特殊功能，为中心地区的重要积累需求服务。在第一阶段，外围地区（主要是美洲；次要是非洲，它为前者提供奴隶）的重要功能是容许大西洋商业资产阶级积累货币财富，这种财富在工业革命后转变为实际的资本。因此就有了种植园制（在掠夺矿藏以后），整个美洲就依靠它从十六世纪转入十八世纪。这种功能因工业革命而失去其重要性，当时，资本的重心从商业转到了工业。因此，外围地区的新功能就是要降低(a)劳动力价值（通过供应大众消费的农产品），以及(b)经常资本组成要素的价值（通过供应原料）。换句话说，外围地区容许反对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马克思也观察到这一点——弗兰克注）。为了达成这一点，在第2时期中，资本只能支配一种手段：商业。另一方面，在

第三时期中，资本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资本输出。因此，只有从那时以来，而不是在那时以前，真正的不平等交换才出现了。

我们可以认为，这里说的“真正”，指的是曼德尔所谓的“以等价为基础的不平等交换”，普里奥巴曾斯基谈到的“具有同样技术水平而工资较低的企业的剩余利润”，伊曼纽尔在《不平等交换》标题下分析的主要交换方式，而这也是我们讨论十九世纪时还将再加研讨的分析和分期问题。阿明将不会否认曼德尔所说的“以不等价为基础的不平等交换”在重商主义时期的最先优势地位，在这个时期中，这种不太细致的剥削方式在世界资本积累、宗主国发展和大多数殖民地的不发达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已注意到的。这里的第一时期，特别是这段时期中的内部结构性变化，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分析不发达的发展时也进行了研讨。

三、生产与交换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按照我们的理论核心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这些纲要各自强调了一个不同的方面（虽然上面引述的简短段落中的这种强调不一定勾划了这三位作者主要著作的特点）：在第一个纲要中，各阶段的划分主要根据宗主国生产结构的差异。在第二个纲要中，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种种交换关系的有关差异中含蓄地提到上述这种差异。阿明更加明白地讨论宗主国积累与生产进程中这类交换的功能，强调后者决定前者。鉴于本文的前述范围与局限，我们将首要关注这一进程中殖民地内部的结构性变化，并设法研讨殖民

地在世界资本主义积累进程各阶段中的功能怎样通过殖民地的生产方式而关联到生产进程(和非积累进程,这是很重要的)及其组织的。简言之,我们将提出:在第一阶段,殖民地的资本被严重剥夺,它们发展的结构性能力被严重削弱,虽然尚未消灭。在第二阶段(这在各个殖民地并不是确切同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弱小社会力量对宗主国工业资产阶级及其在殖民地的盟友进行了不成功的生存斗争(除了在新的移民殖民地)。在第三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这些殖民地中发展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被全部消灭或者完全不许构建,因此排除了在资本主义下的进一步发展或未来发展,巩固了各殖民地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发达的发展,并产生了当今新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矛盾与斗争。在整个分析中,由于我们的局限,我们将面临上述的"外部"交换对"内部"生产或阶级决定性的问题。

我们研讨资本主义积累与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的主要目的,是要把最紧密和重要地参与这一进程的那些殖民地当时的生产方式中的要素抽象出来。但是,第一个重商主义资本主义阶段则直接、间接地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成为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基础。所以,我们对第一阶段的调研也必须包括对直到后来才产生它们最重要成果的那些进程的历史根源加以分析。

在我们对第一阶段的调研中,出现了下列三个问题:(1)为什么大多数欧洲殖民地遭受不发达而其他一些殖民地却获得发展?具体来说,为什么新世界的大部分处于不发达而只有美国和加拿大逃脱了这种命运?(2)集中于单一生产供出口的原材料,对于这种进程起怎样的决定作用?(3)走向不发达的国家与(真正)走向发展的国家之间的工资水平差异的历史根源和解释

是什么?

这三个问题及其答案是相互密切有关的,是和世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达密切有关的。其中有些内容虽不详谈,但将在本书稍后部分(第五章)进行研讨,这里可以暂时谈点看法。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已经在西欧(除去地中海地区)及其海外白人移民拓殖地(具体而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繁荣昌盛。南非、罗得西亚和巴勒斯坦也有局部发展,那里是由白种欧洲移民和土著人口占有的。其余的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新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占人类绝大多数人口,却沦于不发达。这些后者殖民地集中于并专长于生产未加工或粗加工的原料,供出口到宗主国;虽然有些移民拓殖地在它们历史上的某些时候也曾集中于原料出口。伊曼纽尔,以及阿明和马丁内斯(他们二人在更晚近的未发表研究中)否认原料生产专业化本身决定了不发达(虽然他们的理由不同于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或加拿大的"主产品"增长理论派),并声称明显的决定关系只是一种"视觉幻象"(伊曼纽尔,49—50),说对它的强调是一种"神秘化"(阿明)。

相反,不平等交换的主要分析家们(伊曼纽尔以及帕洛伊和阿明),认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等价)不平等交换,至少自十九世纪以来,是由双方的不平等工资水平所决定的。如同马克思和普里奥巴曾斯基,他们认为高工资与低工资国家间的贸易导致等价的不平等交换(或者说,市场价格对高工资产品定值过高,对低工资产品定值过低),因而促成前者的资本积累和发展,而以后者的丧失资本和不发达为牺牲。伊曼纽尔也看到不发达国家都是低工资水平,而高工资水平与发展都恰恰在西欧及其上述海外移民地,因此他接着认为:"由此看来,发展不是高工资的原因,而是高工资的结果。"(伊曼纽尔,161)我们暂且不

谈这种论点的优点(以下第五章将作进一步研讨),这里只来看看伊曼纽尔自己对自己分析的看法:工资水平这样就成了伊曼纽尔整个分析中的独立变项,而不去努力解释原来工资水平的根源以及交易国之间工资差异的根源,除了几点非主要的(大部分是错误的)看法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但是这意味着,对贝特尔海姆和阿明,我们必须询问上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宗主国及其海外移民地与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之间工资水平的原先差异,是怎么开始的?其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将在下面一章里讨论。

13

第二章

世界资本积累、贸易格局与生产方式,1500—1770

我们可以简要总结大体从1500年到1770年之间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并观察随之产生的殖民地地区生产方式的转变,从而回顾世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达的第一个主要时期或阶段。第四章里将把欧洲宗主国内有关的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作为此历史进程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加以研讨。

在长达二个世纪的这一世界资本积累的重商主义阶段中,起主导影响的是欧洲商贸活动无可逆转的显著增加以及供出口的殖民地生产增长——这种生产又是受欧洲宗主国商业所刺激、控制和剥削的。刻画这样的特点,并不是要否认这个时期中欧洲生产的重要性及其转变(我们也注意到它的重要性),而是要把这种欧洲商业对殖民地生产关系及其不等价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见前引曼德尔语)同欧洲在第二及第三时期中的生产主宰及随之发生的殖民地生产适应性转变和等价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的基本特点进行对比。W. S. 沃伊廷斯基与E. S. 沃伊廷斯基在他们的权威性著作《世界商业与政府》一书中说(第9页):"新的时代要求对外贸政策进行大力的修改。着重点从寻找外国产品——这是十六世纪以前的外贸主要动力(我们将补

14 述后来的部分情况)——转到了寻找国内商品的出路。……这对于以航海业为主的欧洲国家的殖民政策带来了显著的变化。"

或许应当特别指出(因为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一因素没有得

到应有的注意)，正如马克思所注意到的，武力是一切重要变革的催生剂，然而，由壮人中的民族国家所支持的动武或许在资本积累的这一阶段尤其重要，因为欧洲宗主国在这个阶段里相对而言尚无其他手段来从殖民地榨取生产或勒索贡赋。《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者说(第 4 卷，第 XIX 页)，"十六世纪欧洲人的技术优势，加上他们的冒险眼光，可以充分说明为什么他们立即夺得了主宰地位。但是殖民地经济长期屈从于欧洲市场，不仅是由于经济条件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白种人在冲击关头和巩固时期都使用了军事力量的缘故。"可以注意到，正是在欧洲人长期缺乏军事控制的地方(即亚洲)，与美洲和非洲相比，那里的宗主国统治和殖民地生产方式的转变长时期地延后了。

一、贸易三角

世界的分工以及贸易的格局或流向可以分为两大三角：亚洲或东方三角，以及大西洋三角，它们在长时期中相互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它们正是通过欧洲宗主国而密切联系的。东方贸易三角及其东西方主轴是在美洲发现以前许多世纪里就已发展起来的(并大力依仗近东穆斯林的干预，他们的重要性在当前的分析中被大大忽略了)。这种"香料"贸易基本上包括东方的香料与制成品(主要是纺织品)出口到欧洲，由欧洲支付金银。随着非洲和新世界的部分地区在十六世纪结合进日益扩张的商业资本主义体系，部分的东方出口品被欧洲再出口到非洲和美洲(虽　15
然有些产品通过"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因此越来越多的东方商品由欧洲用美洲白银支付。如前面所说明的，在后文中将再次强调，这种贸易的结果对亚洲生产方式的改变在很长时期中影响较小。

大西洋三角很快发展壮大，比东方三角占用多得多的船只并运送多得多的商品(包括人员商品)，埃里克·威廉斯对此作了总结(虽然他大体上省略了西属殖民地的地点)：

> 在这一三角贸易中，英国——以及法国和殖民地美洲——提供出口品和船只；非洲提供人员商品；种植园提供殖民地原料。奴隶船从派出国带上制成品，到非洲海岸用以换取黑奴并获利，到种植园贩卖黑奴再获利，换取殖民地产品带回派出国。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这种三角贸易得到派出国与西印度群岛(或其他殖民地地区)之间直接贸易的补充(但决非替代)，以派出国(及东方)制成品直接交换殖民地产品。从而三角贸易对英国工业起了三重刺激作用。以英国(与东方)制成品购买黑奴；运送到种植园，黑奴生产蔗糖、棉花、靛青、糖浆，以及其他热带产品，加工这些产品使英国建立了新的工业；而且，黑奴及蓄奴主在种植园的生活供养为英国工业、新英格兰农业与纽芬兰渔业提供了又一个市场。到了1750年，几乎没有一个英国的贸易城镇或制造业城镇不以某种方式同三角贸易或直接殖民地贸易有关联。获得的利润提供了英国资本积累的主流，而这种资本积累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威廉斯，51—2)

除了这个大三角，还应补充曼尼克斯在前面提到的小三角，这包括非洲黑奴、加勒比蔗糖和新英兰朗姆酒；北大西洋三角以纽芬兰渔业(布雷勃纳)为中心；当然西属美洲以及后来葡属美洲的金、银贸易供应了东方贸易，并越来越多地进口英国和东方制成品，由英国销售到西属和葡属殖民地(及其母国)。

维系这种国际分工及其有关的连锁贸易三角的，是欧洲商

业(占主宰地位的时间次序大体是:意大利,伊比利亚,荷兰,英国),它从这种殖民地生产(一度也有宗主国生产)中,在各个三角的每一边都取得大份额的利润。在这方面,也许值得特别提一下两种有关的机制,因为它们没有像经常提到的垄断商贸公司那样受到注意,那就是:再出口,以及多边收支结算。两者都由索尔作了概述,都联系到英国:

> 从贸易新地区进口的货物的再出口,在十七世纪中叶是微不足道的,50 年后却占到总出口的百分之三十。……再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烟草与食糖。……贸易的多边融资已经颇为重要。总的来说,英国利用它对西欧的一大部分盈余来支付别处的赤字。这种间接结算的数额,一部分是由于再出口贸易,但即使不算再出口,其基本状况仍然是同样的格局。……葡萄牙贸易的重要性不应低估(十八世纪中叶,巴西成为黄金的一大供应国)。它有助于伦敦成为全世界的金、银市场,这些金、银供应也是英国扩大对东方贸易以及从北方购买军火的重要环节。……西印度群岛及其南边的美洲殖民地到十八世纪中叶或许已成为英国贸易联系的最重要部分。仅仅西印度群岛,就供应英国四分之一的进口,它与美洲殖民地吸收英国五分之一的出口。……可是,这两组殖民地的贸易格局是完全不同的。西印度群岛几乎始终对英国有顺差,而且,事实上它又把从英国进口的大多数货品再出口到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去。贸易收支以两种主要方式间接结算:通过“奴隶贸易”,英国送消费品去西非,然后把黑奴运去大西洋彼岸;其次是通过北美殖民地的进口盈余,它供应西印度群岛以食品、活畜、木材、等等。……第二个(美洲殖民地的)结算渠道是出口鱼

17

类、小麦、面粉和大米去南欧。(索尔,3—8)

这种商业交换,特别是通过很大程度上依靠武力和暴力的生产方式所生产的殖民地产品、殖民地劳动和殖民地金银的商业交换,以及它们的再出口和多边支付,包含了主要是不等价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它剥削了生产者,特别是殖民地的生产者,它使商人得利,特别是宗主国的商人。虽然这种不平等交换可能不同于那些盛行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不平等交换(据伊曼纽尔的分析),它却肯定造成了生产的殖民地向宗主国的重要资本外流,而宗主国积累了这些资本并纳入它自身的发展渠道,这在下文可以看到。以下我们将调研大约在1760—80以后重要变化的根源以及这种资本积累的使用。

二、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生产方式转变的差别

同世界及宗主国资本积累进程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在一批殖民地和另一批殖民地内是不同的,这是根据这些殖民地在世界范围商业资本主义体系发展阶段中各自的地位和职能。最重要的殖民地成员——新世界——经历了生产方式最深刻和影响深远的转变,经历了不发达的最大发展。非洲在结合进该历史进程的程度以及在生产方式的转变方面,都处于中间地位。而亚洲总的说来,参与和变化都是最小的。

总的说来,亚洲出售农产品和制成品给来访的或落脚于沿海飞地的欧洲商人,他们支付金、银。欧洲没有什么东西能提供给文明的亚洲人,当时尚缺乏或无财力支持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对亚洲人强行推进贸易或生产。沃伊廷斯基回顾称:"当时,欧洲在工业技术上落后于亚洲。为了交换丝绸、棉花、糖和香料,

欧洲只能出口小枪支,但却毫不优于东方制造的枪支。……与意大利城市相比,中国的商业、手工业和行政管理的优越性,是马可波罗所讲迷人故事的主题。……他的故事指的是十三世纪末,但并无迹象表明欧洲在其后一个半世纪中赶上了中国。……瓦斯科·伽马在1498年到达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以后,他带了马拉巴尔王公的一封给葡萄牙国王的友好信函回到欧洲。'我的王国繁荣富足。……我想从贵国得到的是黄金、白银、珊瑚和胭脂。'"(沃伊廷斯基8,649)迟至1793年,中国皇帝写信给英王乔治三世称:"贵国大使可亲眼目睹,天朝万物俱备,对奇技淫巧之物朕不屑一顾,贵国之制造品在此一无用处也。"半个世纪以后,英国的回答当然是把它在印度殖民地上种植的鸦片运去中国以刺激中国人对英国货的胃口。虽然亚洲生产商品出口去欧洲(再出口去非洲和美洲),无疑影响了亚洲生产方式的自主转变,但这种发展除了特定的有限事例以外在很长时期中并无实质的改向,直到很久以后。最早的一些影响深远的生产方式转变发生在东南亚部分地区,在那里,伊斯兰、葡萄牙和荷兰对立势力及其对当地对立势力的政治干预,开始把它们在当地结合商业资本主义扩张的活动从简单贸易扩展到生产出口商品。(这一进程的各个阶段以及与之伴随的不发达的发展,在格尔茨和沃特海姆的著作中进行了分析。还可参阅例如《剑桥欧洲史》第4卷XXⅢ—XXⅨ以及368—371。)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影响也开始伸向日本,但却造成它"闭关"达两个世纪,直到海军准将佩里在1853年重新"开放"日本。按照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亚洲产品和以强迫劳动生产的美洲白银之间的交换代表着一种"不平等交换",它使欧洲人得利而牺牲了亚洲人(当然还有拉美人)的利益;当代的重商主义者和商人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们发现美洲白银在亚洲获得了最高价 19

格——以欧洲可实现的盈余计算。亚洲人被欧洲人进行不平等交换或剥削的程度和数量在十八世纪中叶发生了量变。亚洲社会，特别是印度社会的重大转变在1757年的普拉赛战役以后加速了（第四章有综述，更多的详细讨论可参见穆克吉与森的著作和弗兰克的著作《1492—1789的世界积累》，第四章）。

然而，在工业革命以前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商主义阶段，以及在简单商业贸易的基础上，欧洲人没有自己的产品来提供给工业上更加先进的、自给自足的中国人和印度人。欧洲人扩大对东方贸易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支付西方的白银。这种情况具有若干联系的结果：它使欧洲能通过简单贸易来实现并积累亚洲的部分劳动价值，在几乎两个世纪中，亚洲的劳动实质上仍然保持先前存在的生产方式，直到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来阶段才发生深刻的转变。但是，亚洲的这种暂时平静或者亚洲社会全面变革的历史延迟之所以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谐并存，只是由于世界性商业资本主义体系中另一端同时已有它所必需的生产方式全面而剧烈的变革，以便在那里生产供相对和平的东方贸易所需要的白银。最后，“旧”世界两端的贸易深刻地决定了欧洲自身的变革和发展——从而决定了整个世界的历史。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以及与拉丁美洲、加勒比和美国南部殖民关系的建立，还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把大部分非洲拉进了这个体系。

新世界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它依赖于输入奴隶劳工作为其主要生产力），把非洲的很大部分——从达卡尔到刚果的内陆地区——带进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虽然南欧人早在十五世纪美洲发现以前就已经输入一些非洲人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的一些甘蔗种植园里干活，但当十六世纪时非洲劳工被运去西属美洲，对他们的需求就增加了。在十七、十八、二十世

纪前半叶,当宗主国把非洲劳工运去充任它们殖民地(特别是在巴西、加勒比和美国南部)所需的绝大多数劳力,输入的黑奴就大大增加了。据估计,在这段时期中,有1亿非洲人离开他们的非洲家园,虽然经过猎奴战争和"运输中途"而活着抵达大西洋彼岸的则没有那么多。后来,菲利浦·柯廷在仔细计算之下大大降低了这一早先的估计数。因此,非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向新世界的殖民地单一产品出口经济供应劳力来为宗主国生产这批财富,非洲也变成了单一产品出口经济,这种产品是非洲最宝贵的遗产:它自己的人丁,包括生产力最强的人丁。

如同新世界的白银、糖和棉花一样,非洲的奴隶"生产"与出口也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因为非洲人并不是都站在海边等待被运去海外当奴隶的。虽然以前在非洲有过本地的奴隶制,但这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不同于那种要发展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之一部分的奴隶制;而且,非洲任何地方已经存在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都不适于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千百万奴隶。因此,正如罗德尼、哈格里夫斯和戴维森所说明的,这种发展进程也必须大大变革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从长远来看,比丧失人力和经济盈余更加重要的是非洲社会的改变,这是非洲沿海部落通过战争和贸易从非洲内地"招募"奴隶卖给等在海边的宗主国奴隶贩子的结果:沿海部落与内地部落之间,以及它们与宗主国奴隶贩子之间,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那样发展起实质上同样的单一产品出口经济。在非洲,与宗主国的殖民关系改变了阶级结构,产生了宗主国与本地统治者共同的切身经济利益:他们要寻求一种对非洲人民大众的不发达政策,不但对那些被运走去当奴隶的,而且对大多数留下的。因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西欧(后来还有北美)宗主国的发展,为拉

21

美和非洲不发达的自立发展进程打下了生产与社会的基础。

非洲输出劳工以“换取”少数产自欧洲与亚洲的制成品，而且特别重要的是：朗姆酒和枪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这些殖民地和其他殖民地都是如此，虽然工具则适应于那些阶段——正是这些外国产品对于变革其进口经济生产方式和创造其出口产品最起作用。非洲人需要并使用这些进口品（并不仅仅是外国人或首先是外国人），他们在生产方式变革中最为积极，最为受益，这种生产方式适宜于在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个阶段提供“世界市场”所需要的非洲出口产品。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英国宗主国越来越有兴趣把它自己的纺织品出口到非洲去。当美国南部奴隶生产的棉花需求上升而西印度利益的经济重要性和政治权力下降时，英国对非洲作为奴隶来源的兴趣下降了，而代之以对非洲作为英国纺织制成品的市场的兴趣日益增大。至于以千百万生产力最强的非洲人来“交换”朗姆酒、枪支与纺织品，这是否平等或不平等的问题，答案难以计算，然而这个问题一经提出，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作为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一部分的三个不发达洲，在这一进程的第一阶段中，美洲“新世界”无疑对不发达的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和遭受最大的苦难。美洲输出了黄金、白银、染料、烟草、糖和其他产品——并通过它们流出了许多价值——被欧洲宗主国生产方式的同时变革和积累进程所吸收。在“交换”中，美洲的殖民地区进口了劳工、资本货和消费品，这是推动或促进它们与宗主国需求有关的生产进程与消费进程所必须的。这种生产和交换进程，要通过墨西哥和秘鲁文明程度高、人口密集的白银产区的已往生产方式，证明是不可能组织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些地区建立宗主国飞地而使它们成为二元经济或者部分地区保有已往生产方式的社会，也是不可能的。除

了在某些边缘地区(包括一个地区,那里的边缘性已被半宗主地位所代替,这就是新英格兰),以独立小规模农民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的”生产方式,证明对资本投资或劳工移民都是无利可图和没有吸引力的,新世界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移民劳工运输费都由别人支付了。在这些地方,通过种植园经济的建立和扩大,资本和劳工就能引进,生产进程可以组织起来。主要的采矿区和种植园地区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并不鼓励在这些地区本身进行资本积累和生产多样化(我们可以在第三章和第五章看到)。它们却发动了结构性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并在政策上造成强大的当地既得阶级利益的影响而在十九和二十世纪进一步推进不发达。然而,或许除了加勒比甘蔗种植园(它代表了这种产生不发达的方式的极端形式),这种殖民地和阶级结构并不完全排除制造业增长以及其他生产进程和利益,后者在十九世纪初设法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推进相对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如果它们的雄心——以及特别是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受到挫折,那是因为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仍然太弱小而不能抵御国内战线上与之对立的原料生产利益及商业进出口利益的进攻,也因为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的国际战线上产生的新经济与政治力量对这些对立势力的加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这一趋势也在拉丁美洲日益明显可见。与此同时,三个世纪的不等价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已经从“新”世界大多数的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那里榨取了大量资本,使欧洲宗主国用来投资于经济发展,这在十九世纪又反过来加固了拉丁美洲的不发达。

23

综观一下今天新世界里最最极端不发达的“萧条”地区——这些地区的特点,不但是格外的贫困,而且有压制性的社会体制、大主教极端教权主义或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不自由的政治组织,等等——可以发现它们都是早先时期生产初级产品供出口

的地方，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它们的矿藏、土壤、木材或市场枯竭以后，这些地方就沦于衰微破败。这种情况不但有那些(前)矿区，如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智利的“小”北方和“大”北方、玻利维亚和秘鲁的高地、墨西哥的中部，而且还有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和落基山区的部分地区和加拿大的魁北克；还有加勒比的前主要农业出口区或渔业出口区、巴西的东北部、中美洲和南墨西哥的部分地区、美国南方的棉花带或“烟草路”、加拿大的海运省和盖茨贝半岛；还有和这许多出口生产区相毗连的土著劳工出口区。虽然它们当前的贫困部分地由于它们自然资源的枯竭、人口的密集和矿山区不良农田的衰蚀，可它们现在极端不发达的主要根源并不是物质的，而是它们从出口繁荣的“黄金时期”所继承的社会结构，而且仍然反映在它们的“古旧习俗”中。察看一下亚洲和非洲最贫困的地区，可以发现实质上特点相同的、格外严重的殖民地与阶级双重剥削存在于中非矿区及其劳工供应来源，存在于出口棉花的尼罗河流域，存在于孟加拉以及印度马德拉斯和克拉拉等南部种植园邦，存在于中爪哇，等地。

因此，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揭示问题的、显然矛盾的情况，那是亚当·斯密所预示的，马克思所系统化的：富者变穷，穷者变富。如果我们观察了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所强调的，这种明显的矛盾就消失了。资本主义的分工已经通过一种生产方式和不平等交换剥削了一些地区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这些地区遭受不发达的发展，并使得这些地区所产生的资本和其他财富积累起来。此外，不光新英格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贫困，还有西欧和日本许多方面的贫困，产生了一种生产方式、工资水平和不平等交换的好处(我们将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情况中作进一步的观察)，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建议区分殖民地化和殖民化：殖民地化的生产方式、

低工资水平和殖民地不平等交换，清楚地说明世界资本积累进程内的一种从属性依附，使它们沦于不发达的发展；殖民化则依靠输送移民，它的生产方式、相对高的工资水平以及至少局部地避免（即便不是立即受益于）外部不平等交换使它们能获得经济发展。W. S. 沃伊廷斯基和 E. S. 沃伊廷斯基（678）在“拓殖殖民地”与“剥削殖民地”之间作了类似的区分。殖民地化与殖民化的不同形式与功能以及在重商主义时期新世界里与之有关的“内部”生产方式和“外部”交换关系，在以下的第三章里将作详细分析；至于在工业与帝国主义时期中其他地区的情况，则在以后各章中将作研讨。

25

第三章

论新世界发展与不发达的根源:亚当·斯密与马克思对韦伯派学者

一、关于韦伯的理论

(1)韦伯理论的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和本作者对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达的分析,有一个重要的不同解释,那就是马克斯·韦伯及其信从者和曲解者的解释,这在美国已取得主导地位,从那里它反过来再输出到它的文化新殖民地去。卡尔·曼海姆(夏皮罗引述,225)提到马克斯·韦伯时称他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他的遗孀兼传记作者玛丽安娜·韦伯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改称为一种解释。各种各样的作家,诸如考茨基、H. M.罗伯逊、索罗金、阿伦、巴斯蒂德、格特与米尔斯、马尔库塞、帕森斯、本迪克斯和古尔德纳都认为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代表了一种企图,要取代或者至少严重修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主导上层建筑的理论并特别强调心理—文化因素和宗教对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性。当然,这一野心使韦伯不得不极大地关注马克思的著作和工作方法,因为韦伯把马克思尊为对手。从哲学上看,不同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乐观主义,韦伯对于人性是个悲观主义者

(斯塔克,203);从政治上看,韦伯虽然对某些社会问题持“进步”态度,他对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完全反动的,全心全意支持德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莫姆森、夏皮罗),并全力反对苏联的1917年革命和1918年在他自己德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夏皮罗,格特与米尔斯)。很难接受约齐尔—科瓦尔斯基在《波兰社会学公报》上发表的论点:认为韦伯在学术上尊敬马克思以及吸取一些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局部的历史解释,似乎可以否定韦伯是反对马克思的。韦伯在他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中自己承认(加贝尔,175)宗教并不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兴起的障碍;罗廷森最近表明:伊斯兰并不与资本主义发展不相容。这些都是韦伯论点中不可避免的弱点。无论如何,韦伯的美国信从者们(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帕森斯及其学派)不但无视韦伯的比较历史方法的弱点,而且越来越不顾韦伯掌握的这种方法的相对力量。由于基于“现代社会学分析”(据帕森斯的提法)的意识形态目的而使用马克斯·韦伯,他的当代美国信从者就不得不从科学上阉割韦伯。

古尔德纳观察到:

> 韦伯的立场主要是一种论战,反对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结构”的适应。……他的《新教伦理》的矛头针对马克思关于新教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结果的设想;更加总的说来,韦伯反对马克思关于价值与思想的学说,说到底是依靠经济基础以前变化的上层建筑这一概念;韦伯却设法表明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是以新教伦理而定的。(古尔德纳,121,179—80)

韦伯在美国的主要门徒塔尔科特·帕森斯把这种反马克思

主义的进攻进一步推进，他这样做就使自己确立为美国社会学（或者古尔德纳所谓的“学术”社会学）无可争议的老前辈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 已经改变的是帕森斯。简单说来，发生的情况是：由于（30年代）大萧条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日益突出，就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发展和增强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力量，**并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门社会学**。……（古尔德纳，188—9，黑体原为着重号，系A.G.弗兰克所加）

27

帕森斯自己显然认为他和他的信从者胜利了，因为他在1965年声称：

> 总结起来，必须强调对这一关键问题——关于文化因素的地位——的反马克思立场，在上一世代中已经被理论和实际发展所大大加强。……它们支持韦伯，反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基本的结论几乎是很明显的。……今天，在社会学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帕森斯，1967，134—5）

然而，这些美国意识形态分子并不以此为满足而力求进一步的“发展”，伯恩鲍姆总结了他对马克思和韦伯的比较，提议称：

> 韦伯之关心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独立影响，起源于他同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较量。……韦伯自己也可能以类似的方式进行修正。我们说过，他在分析社会变革时，对意识

> 形态变项给予了明显的独立地位。……或许我们可以说，在社会进程分析中插入一项可行的心理学理论，是系统社会理论的下一步；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这早已在进行中了。（伯恩鲍姆，见斯梅尔瑟［编］1967，15—16）

而且，古尔德纳评述称：

> 虽然功能主义在美国正陷于危机，它在世界上的事业则远未结束。确实，功能主义的事业，以及更广泛的学术社会学的事业，现在在东欧和苏联却刚刚开始。……苏联集团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如同在其他地方，表现出对学术社会学，包括对功能主义以及甚至对帕森斯本人，日益增加的兴趣。（古尔德纳，447，449）

本书作者在“功能主义和辩证法”以及“发展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不发达”的标题下对这些“发展”作了批判性的考察，后者还特别联系到心理学的下一步（弗兰克 1969 年著作中转载）。这里并非要总的探讨这个问题，只是要记住：它构成了这里和本书其他部分提出的更为特定的问题的理论与意识形态内容。现在我们就转到这一方面。 28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现在在美洲新世界可以观察到的差异——北方发展与南方不发达，其根源何在？原因在哪里？怎么解释？韦伯又其自觉或不自觉的信从者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最为著名的并最受广泛接受的。但是，这些答案及其理论根据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们在历史证据上是前后不一致的，在理论上是有局限的 66

和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我们反对韦伯派和新韦伯派的解释，我们建议回复到古典传统、回到马克思并上溯到亚当·斯密，并且寻求一种立即与历史证据相一致的、与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分析世界资本积累进程和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观点相一致的解释。

韦伯理论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他对世界宗教的比较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在韦伯最后的著作《经济通史》中加以总结并应用于新世界：

> 占有并剥削广大的非欧洲地区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何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恰当的。……欧洲国家占有殖民地使这些欧洲国家都获得了巨大财富。……通过殖民地贸易带来的财富积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意义甚微——这一事实必须强调正同沃纳·松巴特的看法相反。……松巴特认为标准化的大规模防备战争是影响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这种理论必须缩小到它恰当的程度。……作为最后手段，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是合理的持久企业、合理的会计、合理的技术以及合理的法律，但也不是只有这些。必要的补充因素是理性的精神、总的生活举止的理性化以及理性的经济伦理。……遭遇到两种主要类型的剥削：西属和葡属殖民地的封建类型，荷属与英属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类型。……清教徒对任何一种封建主义形成传统的抵触心理，宗教动机对此也有作用。（韦伯《经济通史》，298，300，308，354，298，301）

29

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最后段落中自己所作的否认——“但是，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同样片面的

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片面的唯物论因果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已被他的信从者所大部分淡忘，在他们的实践中也被置之不顾，他们在编织心理的和体制的布幕以图遮挡基础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他们论点的实质曾多次被漫画家们形象地加以总结。这些漫画家赞同他们的意识形态信念，但不赞同他们的科学主张，画了一个懒惰的墨西哥人靠在(天主教)教堂墙壁上在热带阳光下睡长长的午觉。那就是不发达；只要他具有清教徒的精神，他的国家就会像他们的一样发展起来！这就是他们的论点。(关于批判意见，请参看上述引文以及弗兰克的其他论文，1969，第二部分。)

韦伯的理论，还有后来的帕森斯等人的堕落(见弗兰克，1969，第二章)，在证据面前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关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韦伯的理论很久以来就受到托尼的挑战，受到H. M. 罗伯逊等人以及最近库尔特·塞缪尔森的抛弃。正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早就观察到的，资本主义诞生在天主教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它繁荣于天主教的比利时和阿姆斯特丹的天主教企业家之中，然后才在新教英国发展起来。至于新世界，历史证据详尽无遗地表明，本文也更为扼要地表明：欧洲的体制并不是简单地从旧世界移植到新世界的。但是即使没有这种详尽无遗的证据，简单的调查也清楚地表明韦伯的理论并不能说明加勒比殖民地——以及后来的非洲和亚洲殖民地——不发达的原因，这些殖民地也有幸被英国资本主义光顾，在西属加勒比也成为出口种植园以前，它们的不发达要比西属加勒比严重得多。韦伯理论也不能说明英属北美洲的北方与南方之间差异的原因。在观察了历史证据以后，布鲁切总结说："总之，有必要得出结论，从很大程度上说，商业的成功主要并非由于清教主义，却是由于牺牲清教主义而取得的。"(布鲁切，48)加布里埃尔·科尔

30

科认为："如果清教徒的宗教概念与商人阶级之间的联盟像韦伯所设想的那样真实的话(清教主义与商业之间的)，冲突就不会发生得那么快。"(引自布鲁切，47)塞缪尔森总结说："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不论我们从清教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教义出发，还是从宗教与经济行动间相互关系的真正概念出发，我们都无法找到对韦伯理论的支持。几乎所有的证据都同这些理论相悖。"(塞缪尔森，154)而且，即使就移民中间的旧世界差异可能对新世界会有影响这一有限范围而言，一项不发达问题(或发展问题)的明确理论必须说明：在新世界，为什么不同类别的人会到不同地方去并有不同的行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从移民的性格特征中去找，而应从他们自此移民的社会和结合进的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中去找，应从这两种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去找。

(3)非正统派韦伯幸存

然而，韦伯理论的精灵则到处游荡。除了学术社会学的新正统观念及其最近在海外的胜利，韦伯的幽灵也缠附上诸如经济学家A.伊曼纽尔和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等人，他们的工作是自觉而明确地决心以(他们声称)马克思所激发的新分析来向正统观念挑战。在伊曼纽尔对不平等交换的分析中(《不平等的交换》，第五章对此作讨论)，中心的论点就是：各国间工资水平的差异造成了它们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也是看到的发展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在他的分析中，工资率是一个未加说明的自变量。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伊曼纽尔却稍稍注意到"体制因素，它首先决定均衡工资，对人类社会并非外源事件"(就其中心论点而言，这并非主要)(伊曼纽尔，163)。然后他设想或声称(第164—165页，第354页)，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拉丁

美洲，美国的初始高工资水平“说到底”是由于“移居美国的人们的不同（即更高）生活工资和‘需求’”（第164页）决定的。这就是说，伊曼纽尔像新韦伯派一样相信移居美国的人们是有所“不同”的，并认为这种不同“说到底”说明了美国后来发展的原因，这种情况由于不平等交换及其他因素而不断增大。伊曼纽尔认为，拉丁美洲则相反，它由于“移民初始生活水平”以及“宗主国教权——封建结构移植到殖民地”而在开始发展时就有“相对的不利条件”（伊曼纽尔，164）。正是这种与美国和欧洲相比的初始不利条件，伊曼纽尔认为“说到底”说明了为什么拉丁美洲永远无法赶上，因为不平等交换的机制只会扩大这种初始的差距。除了伊曼纽尔关于不平等交换的中心论点的有效性与恰当性（这将在本书其他地方讨论），这种“说到底”的分析是相当难以接受的，它违背历史事实，本身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仍然没有说明为何不同类的人们和机构移居到新世界的不同地方去，也因为如此，薄弱的理论基础使得任何分析——关于不平等交换或任何其他问题——的充分性都成了问题，这种分析是以该理论基础为根据的或者是与它结合的。这种论点是受韦伯理论的讨论和以下的不同解释所支持的。

我们的问题最近得到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的考虑，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澄清（在各种书籍中，更为简要的是在他的《美国人民的文化——历史结构》一书中，摘引如下：

> 虽然有许多有关因素，移住民（主要是移居北美的移民）的表现与其他移住民（主要是移居美洲其他地区的大多数移民）相比，可以主要说明自我拓殖与外部统治之间的差异。……说明差异的其他因素……则是移住民原住地社会更加成熟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些因素中突出的一点是，移

32

民社会(至少在北方)更具平等主义的性质,……以及它们社会结构的整合能力。……它们的基本特点是:(1)文化同质性……(2)在民主体制基础上很大的平等主义……以及(3)现代性……在移民殖民地长大的移住民致力于小农业、手工业和小规模贸易。他们所有的人都经历了长时期的贫困匮乏……这些移住民都居住在温带区,当然这并非偶然。……欧洲移民更喜欢温带气候,尽量避开热带地区。当然也有人相反适应于热带。……在这一问题上,工作态度与天主教和新教的某些观点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对应。这并不是说,这些宗教对于树立这种态度起了重要的因果作用,而只是说明这两种宗教都支持它们所主导的社会中的现状:在新教方面是更加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天主教方面是更为落后的贵族政治社会。这种支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里贝罗,10—12)

里贝罗所提出的这批说明性因素,我们觉得,实在反映了他的论点之说明力的相当贫乏:提出气候因素来说明迁移的差异,并不符合欧洲人在世界范围内从许多不同气候自愿迁移到许多不同气候这一证据,也不符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劳工从一种气候被强迫迁移到另一种气候的事实;而且,如果气候被提出来说明发展或不发达,那就不容许接受长期以来就被科学地怀疑的亨廷顿的论点,那就有必要把气候与地质因素联系上有关的生产方式,而里比罗并未这样做。提及宗教因素则呼应了韦伯的论点,那是同上述作家们所观察的证据相矛盾的。提及移住民的成熟资本主义来源并不说明问题,除非这关系到迁入社会在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中的职能贡献,除非这种关系能说明(历史上同时发生的)欧洲移民对例如

33

新西兰和新几内亚以及澳大利亚与阿尔及利亚的发展与不发达的作用之差异。至于他呼应亚当·斯密而提及小农业和小商贸社会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同质性、平等主义与民主——只要它们在历史上是准确的，然而根据我们的观察却是绝对不准确——伊曼纽尔也认为，只有说明了它们自身的起源或原因并联系到"自我拓殖与统治之间的差异"之理由，这才是具有说明性的。(里贝罗把这种差异称为"主要的"说明因素，但是对此他并不试图说明或解释。)因此，里贝罗提及"许多有关因素"，却仍然留给我们许多说明工作。

二、关于亚当·斯密与新世界

我们可以阅读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来开始我们自己的说明：

> 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事。其影响已经很大了。(商务印书馆1979年郭大力、王亚南中文版下卷第194页——译注，下同)……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亚卡普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银的买卖为媒介。(同上，上卷第199页)……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现象。劳动生产力改进了，欧

34

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大了。(同上，下卷第20页)……同时，这二发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促进重商主义的发展，使其达到非此决不能达到的那么显著、那么壮大的程度。这个主义的目标，与其说是由土地改良及耕作而富国，不如说由商业及制造业而富国，与其说由农村产业而富国，不如说由都市产业而富国。但这二发现的结果，欧洲商业都市，不仅成为世界极少部分的制造业者和运送业者，而且成为美洲许多繁荣耕作地区的制造业者，和亚洲、非洲、美洲各地的运送者，并在若干方面，亦是这各地的制造业者了。(同上，下卷第195页。我们可以记住，这是在工业革命以前写的！)……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新的交易，它当然对旧大陆有利，但自然对新大陆也同样有利。由于欧洲人蛮横地侵害别人的权利，一件对所有国家本来都是有利的事情，却成为若干不幸的国家遭到摧残和破坏的根源。(同上，下卷第20页)……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世界上最遥远的部分，使它们能互相救济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奖励彼此的产业，其一般倾向似乎是有利的。不过，对于西印度及东印度两处的土人，这两事件本来能够产生的一切商业上的利益，却被它们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同上，下卷第195页)……自有这二发现以来，只不过经历了二三百年，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其影响势不可能全部呈现出来。这两大事件，以后对于人类，将产生利益，或将引出不幸，人类的智慧，还不能预见。(同上，下卷第194—195页)……

现在，我们有了二百年事后认识的观察，那么亚当·斯密认
35 为不能预见这些事件未来的全部后果，到底有多少正确？但是

他自己的观察可以使他看到那些过去事件所导致的可怕不幸；而且，亚当·斯密有智慧至少能预见到这些新的一系列交易和重商主义除了对人类可以导致利益以外，也有可能导致进一步的不幸。然而，亚当·斯密的新古典派信从者，虽然口口声声声称受亚当·斯密观点的指导，从那时以来，尽管可以借助于事后的认识，却仍然看不到这一点。

关于新世界各地早期欧洲殖民者的动机或野心以及他们得到的不同报酬，亚当·斯密写道：

> 哥伦布陈述的结果，克斯梯的枢密院决定占领这些国家。它们的人们当然没有抵抗能力。传布基督教这个敬神的目的，使这种非正义的计划成为神圣的事业。但此种计划的唯一动机，却是希望发现此等地方的金宝藏。……继哥伦布而起的探索新世界的西班牙冒险家似乎都具有同一动机。……都是对于黄金的强烈欲望。（同上，下卷第133—134页）……每一个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人，都希望发现一个黄金国。命运的女神，在这场合，像在其他极少数场合一样，光临了，使虔信者的狂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而且在墨西哥和秘鲁被发现……他们可以说从命运女神手上得到了他们所寻找的丰饶的贵金属。……欧洲其他各国最初企图到美洲去殖民的冒险家，也是受同样的妄想的驱使，但他们并不怎么成功。……在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的殖民地中，却是至今还没有发现过贵金属矿山，至少还没有发现在今日看来有开采价值的矿山。但英国最初在北美殖民的人，为诱使国王给他们特许状，都以所发现的金银五分之一献于国王。华尔特·罗利夫爵士的特许状，伦敦公司及普利茅斯公司的特许状，普利茅斯参议会的特

许状等等，都以把所得金银五分之一献给国王为条件。此等最初殖民者，希望发现金银矿山，又希望发现到东印度去的西北通路，但对两者都失望了。（同上，下卷第135—136页）

36 这对于所谓北美的新教伦理相对于南美的放荡而懒惰的贪婪的近代"清教徒"理论，倒是提出了一些怀疑；这也是重要的第一步，在为新世界这些部分的物质基础确立客观的差别。

亚当·斯密还开始说明新世界的这些不同部分为什么已经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命运：

因此，西班牙殖民地，从初设时起，就吸引着母国很大的注意，而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却在长期间内，不大注意。（直到资本主义发展的迫切需要吸引了西班牙以外的欧洲对加勒比的更大注意——虽然还小于西班牙对本土的继续注意）。但前者并不因为有这种注意而较为繁荣，后者亦不因为没有这种注意而较不繁荣。（同上，下卷第139页）

亚当·斯密还在其他地方进行观察：

英国殖民地，在处置其剩余生产物即自己消费不了的生产物时，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拥有更广阔的市场。（还可以加一点，把本国的生产剩余和国际贸易盈余投资到自身的发展中去。）各个欧洲国家，或多或少地都企图独占其所属殖民地的贸易，……但实施此种独占的方法，各国很不相同。（同上，下卷第146页）

亚当·斯密区分实施独占的不同方法，区分“注意”的不同程度，他对这些后果的观察，在不同的殖民地如何“繁荣”起来的问题上，看来只会导致以“外部”因素来说明不发达。但是，虽然他看到在“处置其剩余”的重要不同，或者在与不同类宗主国——殖民地关系有关的“外部”交易中平等或剥削程度的重要不同，亚当·斯密也观察到未受注意而繁荣的殖民地与得到注意而不繁荣的殖民地之间的“内部”生产方式的有关不同。 37

亚当·斯密在研讨“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时，在北美部分殖民地宣布独立的1776年观察到：

> 每个殖民者所得的土地，都多于他所能耕作的土地。他无须支付地租，大都不纳税。没有地主分享他们的收获，君主所分摔的通常都很少。他自会使生产物增加，因为这生产物几乎全是他自己的。……所以，他极想从各地搜集劳动者，并以最优厚的工资来作报酬。但此等优厚的工资，加上土地的丰饶低廉，不久就使那些劳动者要离开他，自作地主……优厚的工资。……在其他国家，地租和利润吃掉工资，两个上层阶级压迫下层阶级。但在新殖民地，两个上层阶级的利害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更宽宏地更人道地对待下层阶级；至少，在那里，下层阶级不处在奴隶状况。（同上，下卷第136—137页）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甚至奴隶也比在英属或法属加勒比殖民地受剥削少些。因此，亚当·斯密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或者说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对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认真学子们提供的内容要比论述分工的头三章（总共三十

二章）更多，而任何鲁莽的现代读者大概在该书中就学到这一些。（我们在芝加哥大学弗兰克·奈特的经济思想史课上也就学到这一些。奈特的门徒——经由他的继承者赫伯特·西蒙——米尔顿·弗里德曼几乎完全抛弃了亚当·斯密，宁可由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来取代他作为经济“分析”之父，弗里德曼指导我们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的脚注中学习经济分析，而把实践丰富的正文和附录弃之脑后。）因此，为了追求受益者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目标，就使用了边际经济学来转移对亚当·斯密称之为可怕的不幸的世界范围制度性质及历史原因的中心注意力。这种可怕的不幸也是分工所产生的，它的制度和历史方面是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现在却大部被淡忘了。

38

三、关于卡尔·马克思与资本积累

马克思承认在分析市场交换和分配方面他要感谢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而且，他不是放弃而是加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系统历史观，把它推广到分析生产进程和资本积累。在商业资本主义扩张和发展的时候，新世界的各个部分以不同的生产方式参与这个系统并对资本积累进程作出不同的贡献。

卡尔·马克思在亚当·斯密以后一百年观察了同样的历史进程，发展了理论工具，把分析从市场交换扩大到资本主义积累和发展中的生产方式：

> 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

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这些殖民地为初创的制成品取得了市场，而且，通过独占市场，取得越来越多的积累。靠赤裸裸的掠夺、奴役和杀戮从欧洲以外夺取的财宝被运回母国并转化为资本。……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至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1975年，人民出版社，第784、167、782、819、828、829页）

39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继续论辩说，除了依靠上述“原始积累”的方法，宗主国的资本主义积累与发展过程也得益于后来通过与殖民地进行对外贸易的市场交换力量：

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它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一般说来，它在这方面起作用，是因为它可以使生产规模扩大。因此，它一方面加速积累，但是另一方面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同样，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李嘉图完全忽视了对外贸易的这个方面。)另一个问题——由于它的特殊性，本来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是：一般利润率会不会由于投在对外贸易、特别是殖民地贸易上的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率而提高呢？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虽然这种差额，这种余额，同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交换时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总是会被某一个阶级装进腰包。所以，只要利润较高是因为它在殖民地国家一般比较高，在这个殖民地国家的有利的自然条件下，较高的利润率就可以和较低的商品价格同时存在。平均化是会发生的，但不是像李嘉图认为的那样，平均化到原来的水平。(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文版第264—266页)

对十九世纪国际贸易功能的这种观察，被普里奥巴曾斯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关于原始积累的讨论中所引用和发展，并预示了伊曼纽尔在1969年发表的关于不平等交换的分析，我们在讨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国际交换时还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马克思回述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达的开始情况时，在《资本论》第三卷总结"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时强调了资本主义积累与发展中市场交换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

> 毫无疑问，——并且正是这个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观点，——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例如，我们可以拿荷兰同葡萄牙进行比较。如果在十六世纪，部分地说直到十七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么，相反地，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商业的统治权现在也是和

大工业的各种条件的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我们可以拿英国和荷兰来比较一下。……这里发生了三重过渡：第一，是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第二，是商人把小老板变成自己的中间人，或者也直接向独立生产者购买，他在名义上使这种生产者独立，并且使他的生产方式保持不变。第三，是产业家成为商人并直接为商业进行大规模生产。（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文版第371、372、375页）

斯威济、多布和高桥进一步分析了交换（上述第一点与第二点）和生产（上述第三点）的相对优先地位，但对在欧洲这一过程中于资本主义体系中殖民地部分的这一同样的问题几乎完全未曾提问，更不用说回答了。斯威济在结束讨论时问道：

为什么封建主义由资本主义来接替呢？如果有人也像我这样同意多布所说的由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末的时期是封建主义全面衰败的时期，然而当时资本主义也只是刚刚开始，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困惑的问题。……确实，封建主义的没落伴随着（我要说"起因于"）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以及如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167页）但是历史前提本身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说明。（斯威济，63）

而且，斯威济的问题指的是欧洲（几年以后，他要求对工业资产阶级的起源进行更多的研究），虽然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来指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但是这问题并没有特别指殖民地，那却是

我们特殊的兴趣和问题。不管回答斯威济问题的困难是什么，对我们问题(一旦提出来)的答案将在下面提出的证据和分析中找到。

最后，马克思在结束同一章时提出了以下的结论和超过亚当·斯密的理论分析指导：

> 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文版第376页)

一位作者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强调：

> 马克思仅对把市场机制视为动力、因果、或基本因素的理论，认为这太肤浅；认为市场只是一种方法，用以协调比交换远为基本的过程中的各种个别时刻，……即隐藏而重要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中心过程。(尼古劳斯，45—46)

马克思在专门批判威克菲尔德在澳大利亚的殖民计划的“现代殖民理论”一章里，讨论了美国等地移民地区的生产与积累问题。“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833页注253)这是说它是承担着殖民者一个地区。“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

个人的生产资料……因此，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正如威克菲尔德已经指出的，一位皮尔先生带了三千人到他在澳大利亚的斯旺河殖民地去，"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由于他们能自由获得土地。因此，威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计划对澳大利亚应起的作用就像土地垄断、劳役和奴隶制对新世界种植园殖民地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835—837页）

43

四、关于世界资本积累、国际交换和新世界的多种生产方式

所以，要认真研讨新世界各个地区历史经验与后来发展道路起源之差异，就必须开始研究世界范围资本积累的历史进程，因为那是新世界各种进程（世界进程的组成部分）的驱动力，并进而考虑它是如何通过新世界各个部分不同的生产方式而加以协调的——这些不同的生产方式符合于这些地区在世界范围进程中所起的不同而有关的作用。新世界殖民政策与殖民经验的不同很少由于韦伯派学者声称的所谓殖民者之间的差异（更不能以此加以解释），这种不同的原因正如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可以由殖民者在新世界发现的不同环境及其对宗主国需求的关系来加以说明。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正如格雷在他的经典性研究著作《1860年以前美国南部的农业》中所主张的，"在新世界建立殖民地的欧洲国家的经验记录，肯定了保罗·勒鲁瓦一博利厄的观察，即：殖民政策必须符合遭遇的情况。殖民政策与成就的尖锐对比部分地由于殖民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差异，但更多地由于被殖民国家自然环境和本地人口的巨大差异"（格雷，Ⅱ，

303)。

那么为什么殖民地交换关系、生产方式和工资水平会产生不同——虽然相互有关的——发展与不发达的道路呢？为什么西班牙人对墨西哥和秘鲁投以优先的剥削关注，并制造一种生产方式、工资水平以及实际上不花一点东西就取得珍宝的不平等交换、禁止本国资本积累而使之导向不发达的发展呢？因为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金、银——以及一支已经存在的、有组织的社会劳动力和技术知识；要在殖民地通过低于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对他们进行剥削，容许欧洲宗主国扩大贸易和积累资本，就需要某种生产方式以及这些殖民地在历史变化环境下的不同体制形式。为什么西班牙人不在加勒比和美洲本土某些部分这样做，不在那里实行英国人在有些殖民地所推行的剥削性的生产方式呢？因为这些地区未能提供如墨西哥和秘鲁吸引西班牙注意力的那种同样的低投资剥削可能性。为什么到北美洲去的美国人不仿效西班牙人去剥削土著劳工来生产金、银呢？正如亚当·斯密所正确地观察到的，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而是因为那里找不到这些因素。为什么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德国以及后来的西班牙和北美植入了由“低工资”奴隶劳工驱动的（虽然这种“低工资”在巴西“行之有效地”实行了大约七年，但或许还没有像在墨西哥和秘鲁那样远远低于维持生活的工资那种程度）依附性单一作物种植园出口经济，从而植入了一种生产方式与殖民地交换关系，它基本上并非不同于西属墨西哥或秘鲁的模式，却产生了巴西、加勒比以及美国南方（不是北方）的不发达的发展？因为这些地区提供了这类劳工剥削与资本积累的潜力，虽然只有初始资本投资和劳工输入，没有后来的利润和必要程度的那种剥削，那是不能和不会得到认可的。

44

那么为什么英国会对它的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殖民地“加

以忽视"并未能给以同样的"注意"呢？为什么法国对新法兰西(今天的魁北克，它是在1763年英国对其殖民以后才开始不发达的)也是这样呢？只是因为这些地区缺少吸引这类注意的所
45 有必要条件——并能通过低工资和不平等交换，实行一种独占和榨取经济盈余并产生一种生产方式来发起像新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发达。这就是基本的解释，说明为什么新世界的某些部分具备必要的充足的条件来开始不发达的发展，而其他一些部分则不具备。这或许并不能恰当地解释其具备充分的发展条件，但是在"殖民地"新英格兰的生产方式及其对加勒比和美国南方的剥削性交换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特殊体制"，无疑已经包含了解释，但那是不属本文范围的。

我们可以逐个考察这些不同的生产方式并比较详细地探讨它们的各种原因或解释。

(1)墨西哥与秘鲁的采矿业经济

西班牙人在1520年征服了墨西哥以后，首先对他们立即控制的土著人口强制实行了奴隶制。但1533年奴隶制被废止了，它被以服役与纳贡的委托征赋制作为主宰的组织形式所取代。这种体制把指定社区的印第安人分配给特定的西班牙人，他们并不拥有这些人丁、土地或其他财产，而被授权向这些印第安人征收以个人服役、实物与金钱为形式的贡赋。这种贡赋是西班牙人资本的主要来源，受委托人把这些资本投资于各种各样的采矿业、农业、商业和其他企业，这就好比进一步的征服，允许这笔贡赋兑现并运去海外以及在墨西哥作为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土著人口用来生产货物以支付对西班牙人的贡赋和自身消费的产品的生产方式，开始时是前征服时期中的小规模公社生产。1548年，虽然实物或金钱的贡赋仍然存在，以劳役形式的贡赋

被废止而由**分配劳役制**所取代，这种体制在墨西哥称为卡特基，在秘鲁称为米达制。1545 至 1548 年之间，墨西哥经历了一场瘟疫，使 1/3 得土著人口死亡（在墨西哥被征服时估计土著人口为 1100 万，更新的估计为 2500 万以上），这大大减少了劳动力供应，特别在一些特定社区或地方。与此同时，萨卡特卡斯的第一个大银矿在 1548 年发现了，这大大增加了西班牙对印第安劳工的需求。所以，**委托征赋制**不再是组织劳动力供应分配的合适体制。它就被**分配劳役制**所取代了，那是一种更加灵活的组织形式，一定数量的劳动工作日由称为**劳役分配官**的国家官员分配给特定的西班牙人。 46

而且，这种强迫劳工指派（类似于仍用于监狱劳工的做法）的受益人现在必须对劳工支付官方规定的固定工资。以**分配劳役制**榨取的印第安人工作日的数量以及支付的工资数在西属美洲各地区和各时期均有所不同，取决于西班牙的需要与当地供应。的确，例如在智利，**委托征赋制**劳役存在了两个世纪，而**分配劳役制**则从未制定过。其理由是，智利很不发达的采矿业经济（由于缺乏主要矿藏）以及较少的劳动力供应，加上智利的土著印第安人较不发达的社会组织（与印加人和阿兹台克人相比），使得**委托征赋制**成为可能而**分配劳役制**不合适。在墨西哥，**分配劳役制**一直延长到 1632 年，但 1580 年以后它在农业方面已不是主要的组织形式。在十六世纪中叶，大地主除了通过**分配劳役制**分配到一些劳工外，还开始自行雇用劳工，为此他们必须同更有利的矿山作竞争，并对这些劳工支付比**分配劳役制**官定工资高一倍的“自由市场”工资。可是，过不久，特别当西班牙农业对土著农业扩大竞争时，地主们发现支付的工资不足以保证他们获得所需要的劳工供应，他们就开始通过债务等手段把劳工拴在农场。1580 年以后，现在的传统大庄园成为墨西哥

农业中主导的劳工组织形式。1575—1578年间的又一场瘟疫再次使土著人口死亡一半。与此同时，部分地由于土著供应的下降和城市需求的增加，农业价格急剧上升，而矿业生产则由于最容易开采的矿脉枯竭以及高税收提高了生产成本而趋于下47 降。其结果，采矿业利润绝对地、相对地下降几乎达一个世纪，而大规模西班牙农业的利润率上升，把资本和劳工都吸引到该部门去，其中一部分的资本和劳工就是从矿业部门转移去的。在智利，同样形式的大庄园组织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才成为主导，即到1700年以后，当时，为智利小麦开放利马市场，刺激得劳动粗放型的牲畜牧场改变为供出口生产的劳动密集型小麦农场。

因此，在墨西哥、秘鲁以及较小程度上的智利的矿业区，以及西班牙帝国的其他部分，正是对矿藏的搜括——或者更准确地说对采矿所需的劳工的搜括——决定了主导的生产关系，不仅在矿区本身，而且在服务于采矿经济的农业与服务业部门。宗主国所需的生产金银的劳工（以及白银溶炼过程所需的水银生产的劳工）以及越来越多地用于扩大与东方贸易所需的劳工，需求起伏不定，加上当地的劳工供应不断下降，残存的前哥伦布时代的社会——政治体制组织继续供应这些劳工的能力日趋下降，提供矿业经济及其当地行政管理人员与受益者所需的食物及其他投入的能力不断缩小，就决定了这些地区主导的生产方式及其历史变革。

(2)西班牙领地的自耕农农业

但是并非新世界全都是同样的经历。很显著的，在加勒比的所有岛屿中，仍然隶属于西班牙的领地，比起法属、英属与荷属蔗糖殖民地——或者比起美洲本土的西属主要殖民地——享

受了最最宽厚的统治。西班牙人在这些岛屿上寻找并找到了黄金；并且，在墨西哥和秘鲁矿山开始大量生产财宝以前，在哥伦布到达后的五十年间，西班牙人实际上屠杀了加勒比的全体土著人口（绍尔）。但是一旦美洲本土的大量财宝开始吸引西班牙的注意力、资本和移民（包括许多来自从加勒比各岛屿的）时，当时占多数的留在岛上的西班牙人口实质上就得自行谋生了。其结果，正如格拉—桑切斯所观察的：

48

> 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期间古巴土地的分配与划分过程产生了一个大规模和小规模业主的阶级，他们是最初拓殖移民的后代，他们与本地的土地紧密相联。他们主要是贫穷、粗陋的人们，生活与外界相隔绝，因为严格的法律禁止他们与外人进行任何商贸，他们养殖牲畜，开垦小块谋生土地，偶然同一年驶抵哈瓦那一二次的船只从事兽皮、腌肉或熏肉及其他农产品交易。……但是在古巴已经奠定了一个新生国家的基础，那是三个世纪移民的结果。对土地的不同分配制度和使用制度决定了英属与西属安的列斯群岛的不同命运。一个没落了；另一个则缓慢而不断地进步了。（格拉—桑切斯，35—36）

只是到1760年以后，而且更加在1898年以后，世界以及古巴经济与政治的变化才使古巴变革成世界上主要的甘蔗种植园。其他的西属岛屿，如圣多明各和波多黎各，也有类似的历史。

因此，在1741—1745年间，西班牙领地生产的食糖不超过加勒比产糖的百分之二，不到新世界产糖的百分之一点五。在1766—1770年间，随着古巴于1760年以后食糖生产的起飞，西

班牙领地在上述份额上已分别上升到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一点五。(谢里登,22—23)直到法属圣多米尼克(海地)奴隶暴动,使加勒比和新世界这个最最大的食糖产地实际上退出市场以后,古巴才变得突出起来。

> 在整个十七与十八世纪,……西班牙又一个加勒比领地特立尼达凋谢了,成为一个名义上的殖民地。……特立尼达和西印度群岛就是这样地生活在西班牙殖民主义之下——置之不理。……没有西班牙船只来进行贸易,没有西班牙士兵来驻防,没有西班牙移民来发展经济。……那里没有金、银,西班牙对其没有深刻印象,西班牙人对其没有兴趣。……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宗主国不派船去,宗主国不派兵去,西班牙人不愿移民去特立尼达。(威廉斯,1964,11,20—21)

49

在西属美洲大陆也是这样,凡缺乏稠密而高度文明的印第安人口或贵金属的地区,或两者都缺乏的地区,至少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都有类似的经历。在哥伦比亚,"直到上世纪中叶,东部的制造业和富足的农业同西部的贫困和中部(博亚卡省和昆迪纳马卡省)的苦难形成对照。西部是采矿业。……博亚卡和昆迪纳马卡有大庄园统治……在东部,情况很不一样,那里没有大庄园,不可能有任何大庄园。没有找到金矿或银矿。所以,没有运去黑人。……制造业就兴起了。……哥伦比亚东部的经济在这期间并不是以国外市场为导向的"(涅托·阿尔特塔,79—80)。

同样在中美洲,"当时最贫穷、最隔绝的地区哥斯达黎加有着更为同质性的社会结构,几乎完全以西班牙人后裔为基础"

（托雷斯，16）。

这些地区直到在十九世纪成为世界市场咖啡生产者的时候，才步调一致地采取拉丁美洲主导的格局。对拉丁美洲主导的生产方式来说最为重要的例外，是拉美大陆最隔绝的南端，特别是拉普拉塔地区（阿根廷），那里有着相对较为多样化的生产结构和平等的社会结构，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当时欧洲对羊毛、小麦和肉类的需求，对蒸汽轮船和冷藏轮船的供应，以及运输这些物资的铁路，再加上阶级结构的变革，才决定了这个地区从那时以来的发展（不发达）。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这些地区因之并没有像主要地区那样遭受殖民剥削的同样命运，而且——除了这种命运在十九世纪严重影响过的那些地区以外——它们在今天不属于最萧条的地 50
区之列。但是，虽然这些地区中有一些在殖民地时期为本地市场和出口市场发展起一些制造业，它们在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却无法起飞成为自立的发展，相反在某些事例中却在上世纪遭受了不发达的发展。虽然，它们的殖民地历史并不标志着它们具备不发达的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也没有留给它们足够的发展条件——至少在上世纪的资本主义框架内。

其他加勒比岛屿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理论，那些岛屿开始时是移民拓殖殖民地，后来变成了甘蔗种植园。

开始时，移民特点、生产活动和组织，以及建立在一些非西属或前西属加勒比岛屿的社会，一般说来在本质上类似于西班牙岛屿的社会，而相当独立于欧洲移民的民族性、文化或“精神”。英国人和法国人——虽然由于受母国移民的压力较小而在这方面程度小一些——建立了小规模自耕农的移民殖民地，主要从事维持生计的农作，一些小型而多样的出口农业中雇佣了一些契约奴。但是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这些早期的移民殖

民地一个一个地改变成剥削殖民地并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成为专门化的甘蔗单一生产者，成为宗主国资本积累过程的资本生产者与供应者。当时世界领先的商业国家荷兰在退出巴西以后，利用了1640年英国克伦威尔革命所造成的经济与政治错位而开始其在巴巴多斯的活动进程。

(3)转型：巴巴多斯实例

哈洛在他的《巴巴多斯历史，1625—1685》(1926年出版)一书中引述并解释说，当代观察家们形象地记录了这一进程的开始：

51 在种植各种各样小作物的时期，土地被大量佃农分为许多小块地所占有。这种制度在大多数年代短暂的英国殖民地很常见(如我们在上文指出的，这种制度也存在于没有文明印第安人和矿藏的西班牙殖民地)，部分地由于原先对最初移民赠与小块土地。……因此，这个岛上有着为数众多的、坚定的"自耕农"阶级，他们确实是这块殖民地的骨干。随着蔗糖工业的兴起，这种健全的事态变化了。甘蔗种植要取得成功，就需要大片土地以及廉价劳动力的大量供应；荷兰的长期信贷制对比较富裕的人提供了取得这两个条件的手段。但是，土地少、资本小的小种植者无法应付建立蔗糖工厂的大量启动费。结果，土地就越来越多地落入一小批巨头之手。……这个进程的一个例子就是沃特曼上尉的八百英亩地产，它过去曾经分割为四十个以上的业主所有。利根也强调这同样的事实，他举例称，希利亚德少校拥有五百英亩的地产。在新的机器引进以前，这个种植园值400英镑；但在1648年，它的一半就卖了7,000英镑。很明显，

这里所有的土地都用于这种加工，都得到了类似的改善"……1667 年，用黑奴来替代白人奴仆早已加快进行。在该年，斯科特少校说，察看了所有的巴巴多斯档案以后，他发现，自 1643 年以来，12,000 多"好人"已离开这个岛屿到别地方去。他说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已从 1645 年的 11,200小业主减少到 1667 年的 745 名大地产主；在同一时期中，黑人人数已从 5,680 人增加到 82,023 人。最后，他总结这种形势称：在 1667 年，这个岛屿"力量不及 1645 年的一半，却比 1645 年富裕四十倍"。……

哈洛评论称，这种双重进程：一个坚固的英国殖民地仅仅变成了一个由少数遥领业主所拥有、由一批外籍劳工干活的蔗糖工厂，这就是巴巴多斯历史的主要特征（哈洛，10—44，306—310），也是整个加勒比历史的主要特征，只是西属各岛屿这样的历史要晚得多，而且开始时是本地的所有权。

52

（4）加勒比和巴西的种植园制度

"种植园制"开始统治巴西东北部、加勒比大部，以及随后的美国南部和新世界分散的其他地区。这些低洼的热带地区缺乏大量矿藏和稠密的人口，更谈不到高度文明，它们显然无条件实行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推行的那种剥削。但是它们的地理和气候特点的确使它们在商业革命期间有条件参与并大力贡献于资本积累进程，如果它们的自然资源能适当地和劳工、资本和组织相结合并使它们能产生利润。正是这些环境开创了那种生产方式，决定了这些地区中大部分地方直到今日的历史命运。

格雷总结说：

种植园制源自早期股份公司的经济组织。……种植园制是殖民公司的自然继承者。随着殖民地基础的准公共职能的完成，以及政府职能被公共机构所接管(在初始私人殖民投资已基本上证明为商业失败之后)，剩下的任务就是资助移民和拓殖定居了。种植园制提供了把资本与劳工联合在生产业务中的方便办法。如果欧洲资本家向每名劳工预付必要的移民费和定居费，让他自己去求得成功和随意归还债务，那是不实际的。种植园主是有效的代理人，欧洲资本可以通过他们加以使用。种植园则是殖民扩张的机构，它把三种分散的因素拉到一起，结合起来利用新世界的自然资源，这三种因素就是：工业奴仆的劳力，欧洲商人提供的资本，以及种植园主的管理活动。当然，在有些事例中，种植园主自己也提供部分或全部的资本。……(格雷，Ⅱ，312，311)

53

建立私人种植园经常是接下去的第三阶段，对其有利的情况是：新企业无需负担初始殖民的费用和责任，而且具有经历新环境的好处，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机会以低价收购不成功的殖民机构的土地、改良设施和设备。随着正常贸易的发展，后者不但能得到其产品的市场出路，而且能得到以信贷获得所需仆人、奴隶和设备的手段。(格雷，Ⅱ，341)

格雷在其他地方具体谈到：

种植园殖民地最有特点的体制就是种植园制，它的定义可正式表述如下：**种植园是一种资本主义类型的农业组织，在那里，大量非自由劳工在统一领导和管理下被用于生**

产一种主要作物。……这个定义也意味着：①劳工与雇主的职能是截然分清的；②这种制度以商业性农业为基础，除了萧条时期；③这种制度代表了农业发展的一个资本主义阶段，因为奴隶、土地和设备的价值需要货币资本的投资，而且往往为数巨大并常通过借贷取得，所以种植园主强烈地倾向于采取商人的态度，以净货币收入与资本投入之比来测算经营的成功；④存在着走向专业化的强烈倾向——为市场生产单一作物。很显著的一点是，工业革命中制造业所发展的三大特点——商业化、资本主义和专业化——早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就被南部农业通过建立种植园制而实现了。（格雷，Ⅱ，302）

虽然特别提到了加勒比，明茨总结了新世界实行种植园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后果：

加勒比地区的共同点表现在以下几大特点：①低地，亚热带，海岛生态；②本地人口迅速灭绝；③这些岛屿很早就被界定为欧洲海外农业资本主义的领域，它主要以甘蔗、非洲黑奴和种植园制为基础；④伴随发展起海岛社会结构，其中，内部分等的当地社区组织比较脆弱，而全国性的阶级集团通常采取两极分野的形式，它由海外统治作支撑，掌握的土地、财富和政权有很大差异，并以物质差异作为地位的标志；⑤种植园和小规模自耕农农业继续相互作用，并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影响。……沿海平原和崎岖高地之间的不同预示着事业的尖锐分野，这是加勒比（以及其他种植园地区）农业的典型标志：种植园集中在沿海及内地山谷，小规模经营事业和一些大庄园的形式则存在于山区。（明茨，915，

54

917)

正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已经观察到并强调的，当然也是种植园主和奴隶们自己所看到和强调的，初期情况是土地丰足（只在加勒比有一些限制，因那里有些岛屿面积较小，但从另一方面却构成了对逃跑的障碍）和劳动力缺乏，因此种植园事业只有靠有利可图的低成本劳工（如果劳工以契约奴或奴隶的形式受到强制的话）才办得下去。但最后，契约奴难以应付，因为来自欧洲的人员供应日益减少以及在殖民地实行强制日益困难——黑奴就成为种植园劳工的主要（虽然决不是唯一）来源和形式。

每个种植园和地区都有倾向实行单一作物专业化（特别在价格上升时期）和粗放农业，可是这却会耗尽地力和劳工的生命。乔治·华盛顿谈到美国时说："我国农夫的目的（如果他们能称为农夫的话）并不是就其所能从土地得到最大的收益，因为土地是廉价的或向来是廉价的，而是从劳工得到最大的收益，因为劳工是昂贵的。"他提到杰弗逊时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在土地廉价和富足而劳工昂贵的地方，同样的劳工分布到一百英亩土地上进行较少的耕作，比起集中到一小块土地上进行高度耕作，将会产生更多的利润。"（摘引自格雷，Ⅱ，449）

55 种植园事业的一大部分利润——通过奴隶贸易供应劳工以及出售蔗糖及其糖浆副产品和朗姆酒——都被欧洲宗主国（以及新英格兰——中大西洋诸州次宗主国）的商人和金融家所得，或者汇寄给身居海外的遥领业主。

（5）美国南方：奴隶种植园对农业

新世界的另一个地区没有为欧洲人提供他们在墨西哥和秘鲁所遇到的任何特点，它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南方。殖民

者找不到矿藏；人口稀少，文明程度不高。整个北美洲，包括加拿大，据估计只有不超过100万土著居民，其中只有约20万居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地区，这是美国独立前欧洲殖民的目标地（阿普特克，1959，15）。但是这个地区的南方——有别于北方以及甚至中大西洋——的确提供了近似于安的列斯群岛和巴西种植园地区的农业和气候条件，虽然与后者相比不完全一样。这些环境条件对于决定该地区的未来历史是很关键的。

格雷看到，“在气候和社会组织方面，南方殖民地介于两个极端之间……即英属西印度群岛和新英格兰这两方面的典型。”（格雷，302）

十七世纪初期，在像西印度群岛那样缓慢地开始设立殖民公司和输入契约奴以后，南方的发展就把商业性农业与自给自足农业结合起来了。

> 商业化种植园主在竞争条件下生产一种市场作物，投入资本（其中很多是贷入资本），开销很大。……自给自足的农夫并不追求利润而只是求得生计。他没有什么开销，投入很少资本，不承担经常的金融责任。但是，完完全全的自给自足是极其麻烦的……所以自足农夫也经常要有可供销售的产品……种植园地区自给自足和商业化的相对程度也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在经济演变的总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奴隶制和种植园制在有利条件下取代其他类型经济的倾向。这种进程一次次地重复。在条件有利于商业性生产主产品的地方，小农发现自己无法抵抗种植园制组织的奴隶劳工的竞争力。逐渐地，他们或者被迫成为大种植园主——很多人确实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掌握资本来做到这一点——或者被迫到不太有利于商业性农业的地区去重

56

建租随自足经济的制度。(格雷,Ⅱ,451,453)

另一方面,正如美国等地(类似今天的巴西)许多农业扩大和发展的类型,“自给自足的”小农投入资本,通过自身开创拓殖土地、“改良”土地而首次创造了资本,当他被大资本主义种植园主所取代时,他就对资本积累和集中作出了贡献,因为种植园主节省了这笔初始投资。

可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种倾向可以被视为一种地区专业化进程:种植园制在最适宜于主产品生产的地区取得胜利,而自给自足或中间类型的经济则在地理上适应于它们的地区(不利于种植园经济)生存和发展。……(格雷,Ⅱ,444)

在种植园地区,商业性农业的特点是生产单一市场作物的专业化倾向。……所以,有利于商业化的同样条件也有利于集中生产单一主产品的倾向。……在甘蔗与稻米区,专业化的倾向更大,因为想要最为有利可图地使用有限劳力的企图已被下述事实所强化:适于生产这些作物的南方地区的劳力更为有限。……然而,从基本上说,单一作物制是导向世界性专业化的经济竞争的选择性影响的结果。(格雷,Ⅱ,458—459)

布鲁切在他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源,1607—1871》一书中提到殖民地时代时总结称:

大量的专业化农场或种植园把它们的大部分资源用于

> 生产一两种作物以供应国外市场。在这类单位中，有低洼的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烟草农场和种植园，以及宾夕法尼亚、西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山谷的大谷物农场。其他熟悉的主产品是卡罗来纳的靛青和南卡罗来纳的大米，它们在十八世纪占到这个殖民地出口值的一半至三分之二。（布鲁切，28—29）

后来，当然棉花成了王牌。

但是，这种发展还有另外一种结果。格雷观察到：

> 另一方面，在南方，向西扩张给老地区带来不可避免的萧条，这种萧条有别于周期性影响新、老种植园地区繁荣的暂时性价格下跌的时期。向西扩张的不幸影响，就我们所注意到的，在革命以前就开始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感觉到了。从这个时候起，老南方的历史标志着地区不断扩大而种植业已不再有利可图。（格雷，Ⅱ，445）

这些地区有倾向成为萧条区，农业、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已衰竭，虽然南方的老区一度靠一项新的出口来维持：奴隶，在老南方的东部生长的黑人卖到远西部的新南方去。

因此，虽然契约奴在开始时比黑奴远为重要，而且有时在某些地区的人口中占到4%，奴隶制却在十八世纪发展得快得多。到1776年美国革命的时候，奴隶人口已达50万，占南方人口的几乎40%，占北美洲殖民地大约280万人口的几乎20%（阿普特克，39，41）。在1780年，13个殖民地的总人口为278万，其中57.5万是黑人，除了4万人以外全都在南方（《美国历史统计》，756）。 58

(6)美国东北部:农业对外贸

美国的东北部,特别是新英格兰以及较小程度上的中大西洋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诸州(它们与南方相比在社会——经济上和地理上处于中间地位),提供了显然不同于新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所遇到的环境——正是这个东北地区后来实现了有关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起飞。这些不同是什么呢?它们怎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呢?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广为接受的答案就是粗陋形式的"韦伯理论"或者是后期假社会科学修饰的"韦伯理论"。但是,正如现在整个分析所提出的,这种理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同意其他一些人的反对意见,他们也认为韦伯理论不能解释新英格兰的发展。例如库尔特·塞缪尔森的《宗教与经济行动》,斯图尔特·布鲁切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源》。

"在新英格兰也是这样,虽然有种相互关系肯定看来表面上很强烈,我们却始终无法找到能说明清教教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个字眼的深层意义)的事物;清教徒的南方——因为它长期以来要比北方诸州清教徒得多——在经济上是'不发达'的"(塞缪尔森,120—121);"总之,有必要得出结论,就重大程度看,商业的成功主要并不是由于清教教义,而是以它为牺牲而取得的"(布鲁切,1965,48)。

确实,即使移民中的某些文化因素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关或看来有关,仍有必要解释为什么某类人移民到特定地方而不去别处。如果新英格兰人生性很有进取心,为什么他们不到南方或加勒比去发挥他们的企业家大才(那里的出口贸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为了找到解释,任何可能的重要文化因素仍必须与移民去(不是移民来)的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有关,

59

并与这些地区如何纳入不断扩大的世界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体系有关。

解释美国东北部发展的另一种尝试，考虑了某些社会——经济因素，虽然往往并未放弃韦伯理论。这些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据以作出的所谓解释可由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生计农业的独立农夫作为代表，并总结为这样的因素，诸如：由于获得土地而有格外平等和巨大的经济机会，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两者据说产生了国内市场、坚实的政治民主和种族同质性。这些因素被一些古典观察家所强调，例如亚当·斯密（见前引）以及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1835 到 1840 年间出版），他们也得到如里贝罗（见前引）这样的当代反自由派作家的呼应。当然，在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的各种强调下，这些因素形成了意识形态结构的重要部分，被当代北美社会科学编织起来“解释”美国的发展并为其现在的反动政策作辩解（例如西摩·利普塞特著《美国：第一个新国家》）。

关于有一些这种社会——经济特点存在的证据以及它们最为集中于新英格兰地区，布鲁切对此作了小结：

> 尽管在所有的殖民地里存在着地产面积和租地使用权的广泛不平等，似乎较少有人想要土地而得不到土地的。……土地价格“对移民来说并不太高”。……从基本上说，正是有利的土地——人口比使所有的殖民地有可能广泛分配个体所有和私人经营的农场。……这里可以恰当地引述卡尔·布里登博的判断：在十七世纪，贫穷“在更为农村的社区中几乎已经绝迹”（25—26）。［布鲁切接着提问］对这类情况的考虑，提出了一个问题：殖民地的社会结构是否有利于增长呢？其阶级界线有多么僵硬呢？……［然后回

60　　答称]……然而，历史上可能没有多少社会像殖民地美洲那样，谋生手段在人民群众中如此广泛地分布。(57—59)

把东北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主要归因于这些及有关的社会——经济特点，还需要说明它们为什么和如何容许或产生该地区的发展——为什么在新世界或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特点的其他地区——诸如拉普拉塔、圣保罗以及上文谈到的其他移民地区(第47—50页)——却没有同样经历美国东北部的发展。要这样做，都会发现，在不断扩大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体系中和世界资本主义积累中，东北部的进入、参与和功能都大大不同于其他地区，而且东北部特有的其他因素也很关键地决定了它的发展。

亚当·斯密已经提出一些解释来说明北方与南方及其他殖民地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差异。北方的移民格局和土地所有权的分配以及相对高的工资水平加上这些因素提供的非工资机会(正如马克思也注意到的)，不能以是否容易取得土地来简单地加以解释，因为在南方和其他地方在开始时要容易得多。相反，正是东北部土地相对贫乏和气候不佳，以及当然没有矿藏，说明了为何取得土地相对于南方等地较少阻碍。区分这些地区的决定性因素是：在南方，从土地榨取利润的可能性(特别是通过供出口的生产)大大高于新英格兰，甚至中大西洋诸州的产粮区。但是，如同在加勒比那样，在南方，只有在最佳地区实行土地垄断，以及通过奴役制或奴隶制而进一步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从而限制了自由获得土地，这种利润才有可能，而这在北方却是无利可图的。

如亚当·斯密所注意到的，这些不同的利润可能性也说明了英国"忽视"北方的原因——相对于英国(和法国)对南方和对加

勒比甘蔗岛屿的"重视",以及西班牙对其矿业的"重视"(虽然不是它的加勒比和其他领地)。如果这种重视并没有使那些殖民地更好地"繁荣"起来,亚当·斯密说那当然是因为这种"重视"的政治与经济控制及体制正是为了更有效地剥削和发展这种利润可能性——而对北方殖民地的"忽视"正好使它们保护了自己。布鲁切说,英国资本对新英格兰"没有什么兴趣"(49);内特尔斯(见 W.A.威廉斯著作,10)认为"影响中部殖民地和新英格兰的政策在性质与结果上大大不同于用于南方的政策"。新世界的一些其他"被忽视的"地区也许情况也相同,它们如新英格兰那样,当时并未具备采矿区和种植园区域的生产方式和剥削性殖民手段,所以没有被定罪为重商主义资本主义时期的不发达。但是,这些其他地区并没有分享新英格兰在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发展中特殊的特权参与。

61

在不断扩大的世界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体系中,东北部殖民地开始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使它们能分享资本积累,在对南方、西印度群岛、非洲,间接对采矿区以及东方的剥削中充当西欧的次宗主国。这种特权地位——新世界其他地区分享不到——应被视为大大有助于东北部在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发展,有助于它成功的独立政策以及其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特权地位冲击了北方运输,冲击了南方与西部进出口贸易的商业与金融参与,冲击了东北部对西印度贸易的奴隶贸易和世界贸易的有利参与;东北部制造业的发展主要用于出口;相关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于北方城市。

在殖民地时期,北方的制造业就比南方的发达,虽然其差距远远小于后来在十九世纪的情况。这种差距有时被归因于内部市场的不同发展(北方大于南方),这又转而归因于北方相对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和南方供出口的农业专业化生产、依靠奴隶

62 劳工，等等。关于为内部市场或外部市场生产的问题及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关于十九世纪美国及其他移民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将在本书第五章中进一步研讨。这里就足以看到，不论这种论点在理论上的长处与弱点如何，美国东北部的殖民地制造业以及特别是十八世纪制造业的发展是大大依赖于外部出口市场的。

道格拉斯·诺思在他的研究著作《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一书中提到1790年时说：

> 不论农业人口在多大比例上被认为是国内市场的一部分，总不能逃脱这样的结论：这个市场狭小而不很集中，因为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构成了商业性生产的市场。所以并不奇怪，国内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并未导致人们迅速转向市场，市场也没有走到这样的规模而使家庭制造业以外的任何制造业有可能发展起来。如果1790年的美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增长的可能性确实就会是有限的。(18)

第一位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那著名的1791年《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书》中列出了划分为17类的多种制造业。然而，在1772年，几乎1/3的北美铁的生产是供出口的(布鲁切，22)，而许多并不直接出口的制造业则仍然间接依赖于出口贸易和运载业：

> 大多数商业性制造业都是密切联系对外贸易的需要的，包括海军补给品制造厂、绳索制作厂、帆布与制帆厂、炼糖与制盐厂、锚链锻造厂、制桶工场、木材厂、酿酒厂、铁匠工场、制鞋厂、木工场、货物仓库、造船厂。(布鲁切，22)

上述清单中，最后一项对新英格兰发展特别重要。1661 年英国航海法对美国的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 它刺激了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的造船业和航运业。可是，它并没有开创这些工业。但英国政府在英国航运能充分满足殖民地的需要以前就把荷兰从英属美洲的贸易中赶走了。……新英格兰船主们可以在整个英帝国的贸易中使用美国造的船只。新英格兰从荷兰被逐出英属美洲贸易一事中直接受惠。（内特尔斯，9—10）

63

据估计，到 1776 年宣布独立的时候，英国商船的 1/3 是在这些殖民地造的（哈珀，46）。

英国想禁止或限制北方诸殖民地的其他制造业的重商主义企图大部分是不成功的。英国在北方诸殖民地生产海军补给品作为殖民地向英国的出口，这一计划并未达到目的，却支持了美国的发展。有关在新世界和欧洲宗主国之间的殖民地贸易中控制某些指定产品的航运或往返航运的条例，虽然对加勒比和南方农业出口地区有不利影响，却非但未阻碍，反而以某些方式无意地帮助了北方的发展与制造业。直到 1764 年，尽管并未付诸实施 1733 年糖浆法，糖浆业确实重要地开创了北方的朗姆酒制酒厂，它转而成为北方海外贸易和本地资本积累的整个格局中的重要项目或环节。现在，比如在哈珀（见施赖伯著作，41）与比尔德以及与施莱辛格（19—20）之间，都有很大一致，认为反对制造业的法律并没有对北方殖民地造成不良影响，并认为贸易条例在 1763 年以前并没有严重影响它们的利益。只是在该年的巴黎和约以后，在于此前的 7 年战争中背负巨额债务，但消除了

法国在北美(以及在印度)的威胁以后,英国才对它的美洲殖民地施行新的沉重的创收条例。这些作者和别人都认为这种条例干扰了尤其是北方主要商人的正常好生意,迫使他们与负债的南方种植园主结成联盟,并迫使他们走向1776年的独立宣言。(关于这一时期的更充分调研,请参阅我的《世界积累,1492—1789》第五章。)

64

因此,自耕农"维持生计"的农业以及供应"内部"或国内市场的制造业都完全不是北方发展的主要动力或者它在殖民地时期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相反,正如塞缪尔森所注意到的:

> 在新英格兰,人们不得不出外搞农业来得到财源,或者实际上只是略高于平均的生计。皮毛贸易、捕鱼、海运和奴隶贸易很快成为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这种职业,由于可以产生比其他行业更大的利润,因此可以产生盈余用于新的、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哈洛,114)

除了在南方的主产品出口经济商业中越来越多地参与北部沿海甚至海外航运、商品推销和融资以外,北方也在殖民地与奴隶贸易中成为更加重要的环节,使得西印度群岛(包括法属岛屿)有可能进行有利可图的蔗糖生产。对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体系的这种参与,转而成为北方自身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 如无新英格兰人民配合一致,陛下在此处[西印度群岛]之殖民地于和平时期难以繁荣,于战争时期难以生存。(威廉·洛德·威洛比致枢密院,1667年12月18日,引自哈洛,268)

生产食糖供欧洲消费，以及由加勒比种植园经济产生资本积累，这意味着：

> 没有(美洲)大陆的帮助，英属西印度群岛没有一个岛屿能够维持生计，因为对他们来说，我们运输他们的面包、饮料和人生的一切必需品、耕种它们种植园的牛马、制造装存朗姆酒与糖浆木桶的木材等各种材料，否则他们就会一无所有。把他们的货物运到欧洲市场去的船只，没有！总之，连他们居住的屋子也是分构架带来的，还有盖屋顶的木瓦，甚至他们的生存，他们的福利，几乎全都依赖大陆。(维奇，1708，引自威廉斯，111)

65

虽然北美生产者与商人没有在加勒比贸易中取代英国，可是他们的生产能力、较低的运输成本，以及特别在战时他们能进入西印度甘蔗岛屿(英属，法属，当西班牙在十八世纪末增加了生产，于是还有西属)，使北美人取得重要的竞争优势——并使他们自己的发展依赖于这种外部市场：

> 这块殖民地[罗得岛]上生产的、适合于送去欧洲的唯一那些产品包括……，总值约每年5,000英镑……其中有很小部分为英国货签定的债务。所以，只有通过商贸我们才能支付债务。而这个殖民地没有适合于欧洲市场的商品，除了上述提到的少量商品；至于生产供出口的其他商品，则除了西印度群岛以外没有其他市场，这必然得出：那里的贸易必须是我们一切商业的基础。无疑，只有实行这种贸易以及其他有关分支的活动，才能取得支付如此数量

> 的英国货的能力。(《对贸易局的抗议书》,1764 年 1 月 24 日罗得岛立法议会通过,引自斯塔瓦里亚诺斯编,118)

不仅是罗得岛,而且整个东北部,特别是新英格兰,都大大依赖于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以及它们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市场:

> 在 1770 年,大陆各殖民地输送到西印度群岛去的有:几乎 1/3 的出口干鱼,几乎全部的腌鱼,7/8 的燕麦,7/10 的玉米,几乎所有的豆类,一半的面粉,全部的黄油与乳酪,1/4 以上的大米,几乎所有的洋葱,5/6 的松木、栎木、和雪松板材,一半以上的棒杆,几乎所有的箍圈,全部的马、羊、猪、禽,几乎所有的肥皂和蜡烛。正如皮特曼教授告诉我们的:"正是从西印度贸易中积累起来的财富首要地奠定了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的繁荣与文明。"(威廉斯,108)

66

而且,新英格兰的资本积累实际上是基于它自身所处的大三角贸易的一边(在上述第二章以及我的《世界积累,1492—1789》中作了研讨)。

> 到十八世纪中叶,新英格兰的奴隶贸易是三角形的,类似利物浦贸易,但更简单、更对称。实质上,它以三大商品为基础:朗姆酒,黑奴与糖浆。船只从新英格兰港口上货,主要或全部是朗姆酒。……在非洲,以朗姆酒交换尽可能多的黑奴,往往是 200 加仑买一名黑奴。这些黑奴被运去西印度群岛出售,部分的收入投资于购买糖浆,通常在价格较低廉的法属或西属岛屿购买。在航程的最后一段,船只

就把糖浆运回新英格兰，进行蒸馏酿制成更多的朗姆酒，以购买更多的黑奴。（曼尼克斯，159—160）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66年向英国下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进一步解释他的宾夕法尼亚何以每年从英国进口价值50万英镑的货物而向英国的出口只有价值4万英镑，当他回答提问“那么你们怎么支付差额呢？”时，富兰克林说：

支付差额，靠我们的产品运到西印度群岛去，出售给我们自己的岛屿，或者出售给法国人、西班牙人、丹麦人和荷兰人；靠同样的产品运到北美其他殖民地，例如新英格兰、新斯科舍、纽芬兰、卡罗来纳和佐治亚；靠同样的产品运到欧洲各地，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在所有那些地方，我们得到货币、汇票，或者适合于送去英国的商品；这些，加上我们的商人和海员在这样迂回航行的业务中得到的所有利润，以及他们的船只运载的货品，最终都集中到英国，清偿差额，并支付本省继续使用的，或者由我们的贸易商出售给外国人的英国制成品。（引自福克纳，80—81） 67

北美独立与自由之父之一约翰·亚当斯指出了这种重商主义资本主义体系和发展的神圣智慧与恩泽：

西印度群岛的商业是美洲商业体系的一部分。它们不能没有我们，我们也不能没有它们。造物主安放我们在地球上，使我们处在相互需要的境地。（引自威廉斯，121）

我们可以看到，造物主也关切地把黑人劳动力安放在同一

个地球上，美洲和加勒比(以及欧洲)资本家都需要黑人劳动力，舍此他们的事情都做不到，包括英国和新英格兰的发展，新世界大部分地区和非洲的不发达以及后来亚洲的不发达。

这种三角贸易的重要性，至少就特定船只的航程而言，最近被G.M.沃尔顿提出了质疑(《关于殖民地商业的新证据》)，他就如此大量的船只从事两个港口之间的简单往返航行提出争辩。而且，沃尔顿贬低北美与非洲直接贸易的重要性，他声称这种贸易量不到总数的1%。

另一方面，詹姆斯·F.谢泼德和G.M.沃尔顿强调无形收益，特别是船运收益，对北美殖民地的重要性：

> 历史学家们都普遍承认，“无形”收益在[北美]对英贸易中对支付贸易赤字可能是重要的。……船运收益毫无疑问是殖民地劳务销售中最大宗的收益。……当考虑到较大的“无形”收益时，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商品贸易的总赤字就大大降低了，南方殖民地的逆差就变成了盈余。西印度和南欧贸易对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的重要性是明显的。……从1768到1772，船运收益仅次于烟草[其后依次是面包与面粉、大米、鱼和靛青]。向海外买主提供船运服务是殖民地市场活动的主要部分，特别是新英格兰，它赚到殖民地全部船运收益的54%。这一事实常常被经济史学家所忽视，或者至少没有正确地加以强调。……对新英格兰和南方殖民地的资本流入是很小的……这些殖民地里逐渐增大的资本储存几乎全部来自殖民地的储蓄而不是外国投资。(谢泼德与沃尔顿，234，235，255—256，258，261)

68

北美殖民地的殖民地境遇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利于它们

的经济发展。但是它们的资本积累，特别在新英格兰，也不是简单地来自内部市场的扩大或者自耕农农民的有效需求与储蓄。它来自这些殖民地的特定地位以及在殖民世界中的参与！

(7)尾声——迟了两个世纪

美洲英属北方殖民地的商业环境非常特殊，从长久原因来看又如此令人困惑和难解。要研究它，提出可行的说明，让人了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或许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对这个复杂而有趣的研讨至今很少尝试，而且有所成效的就更少了。

> 这些大多数英属北方殖民地与所有其他殖民地（不论是英属的或其他国家的）最为特别和不幸的不同之处，就是它们的土地与气候不能生产几乎任何可以直接提供给母国的东西。然而，这种致命的不利条件、它们的处境与环境迫使它们起飞，并且比其他殖民地消费更大数量的英国制成品；它们漫长、寒冷的冬季要求更多的衣着，但是它们长期、深深的积雪不可能养羊、取得羊毛来供应那种需求。而且，漫长的冬季又使奴隶劳动在殖民地毫无好处；这些情况，加上广漠无垠、有待移民的乡土人丁稀少，劳力昂贵，使得任何制造业都无法在这些殖民地建立和维持；因此，一方面，这里的居民由于需要而不得不从母国取得大量货物；另一方面，大自然显然不给他们手段来直接从那里以任何东西去支付那些货物。

69

当这些独特的环境被充分了解和考虑以后，就会很容易地找到原因所在。这些殖民地的人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殖民地使用了为数多得多的大小船只；由于无法直接取得

商贸汇款，他们不得不采取其他殖民地从未实行过和不必要实行的迂回商业。他们输出的商品一般应具备这样的性质：必须在首次售出的国家消费掉而不是再装运到别处去；由于看来没有一个市场会买走很大数量，他们不得不在所能到达的世界各地寻找市场，以尚堪接受的价格出售货物，换取一些东西，以便能立即汇款回去，或者经过若干商务交换后汇款回去。（《论大不列颠在北美北方殖民地的贸易》(1764)，引自卡伦德，51—52）

第四章

70

工业革命与英国统治下的和平，1770—1870

首先在英国、后来在其他宗主国的工业革命，当然包含了宗主国经济、政体、社会与文化方面影响深远的变革，那是不属本书范围的内容。与此有关的技术革命与创新得到各方的极大关注，不能孤立地从资本积累进程和市场扩张中得到现实的了解。霍布斯鲍姆指出，"不论英国的进步原因何在，反正不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优势"(47)；威廉斯所回顾的至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正是在西印度贸易中积累的资本资助了詹姆士·瓦特和蒸汽机。博尔顿和瓦特从洛、维尔、威廉斯和詹宁斯那里得到预付款"，博尔顿给瓦特的信中说："洛，维尔公司还可能得救，如果你的西印度船队离开你的法国船队后平安到达的话……因为他们的许多证券依靠这支船队。"(102—103)

恰当地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宗主国变革的内部动力，仍然是对于殖民地不发达的发展的"外部"与"内部"动力进行真正恰当分析的前题。但是，详尽考察欧洲(以及后来其他)宗主国伴随发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变革是超越本书范围的(但可参阅我的《世界积累，1492—1789》)。所以，我们将不得不把目前的研究限于简要观察(以有别于分析)与殖民地有密切联系的宗主国经济中的某些变化，以便可以把我们的研究推进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第二、第三阶段中殖民地生产方式与交换关系的随后变革。因为宗主国的重要内部动力不属本书范围，我们 71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可以依次综观一下：殖民地对宗主国资本积累的贡献，殖民地市场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重要性；宗主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有关工业革命的政策——特别是自由贸易，国际分工与交换关系方面最重要的随后变化，以及最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第二阶段期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殖民地（与北美）经济与政治结构伴随发生的变化。

一、宗主国资本积累与欧洲工业革命

除了已经引述的马克思等人的观察以外，《剑桥欧洲经济史》承认了殖民地对资本积累、市场扩大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不是通过"平等"或"相等"交换）：

> 与工业化和增长必然有关的第三类结构变化，是关于一国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与国际经济紧密一体化相平行的，是国家一级的相应一体化。这通常包括外贸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增加。……英国的实例是以海外贸易为基础的工业革命的典型。格雷戈里·金对1688年的估计认为英国出口约占国民收入价值的5～6%。一个世纪以后，这一比重上升到15%。大约再过一个世纪，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升至最高峰，大约36%。英国商业在十八世纪的增长提供了财富积累的一大部分作为这个世纪最后25年中新兴工业的必要资助。在国外市场上购买原料和出售成品的机会大大扩展了英国工业经济机会的范围。……（Ⅳ，51）

西印度群岛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在第二章第14—17页讨

论“三角贸易”时已引述过威廉斯和索尔）早已被亚当·斯密所证明，他非常强烈地谴责和抨击这种殖民地贸易：“我们西印度群岛任何一块殖民地上的甘蔗种植园，其利润远远大于欧洲或美洲任何其他种植业的利润。”（亚当·斯密，366）威廉斯进一步考察了这件事，除了已引述过的有关三角贸易的内容以外，他总结称：

> 得到的利润成为资助工业革命的英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泉源之一。……三角贸易的发展，航运业和造船业的发展，导致了大海港城市的发展：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格拉斯哥作为海港和商贸中心在贸易时代所处的地位相当于曼彻斯特、伯明翰和设菲尔德后来在工业时代的地位。……西印度贸易对布里斯托尔的作用正如奴隶贸易对利物浦的作用。……运输黑奴的造船业对十八世纪利物浦的作用……正如购买黑奴的棉织品制造业对十八世纪曼彻斯特的作用。最早刺激棉布不断发展的是非洲和西印度的市场。……正是这种对三角贸易的极大依赖产生了曼彻斯特。（52，60，68）

但是，在十八世纪后半叶，东印度贸易，特别是印度贸易的资本贡献也在数量和质量上增加了。英国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中决定性地战胜了印度，1763年和平条约以后排除了法国，以及1776年美国独立的政治震动（或许比经济震动更大），这些因素（也许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使英国的“注意力”（用亚当·斯密的话）越来越从世界的一个“极端”转移到另一个“极端”。在这方面，布鲁克斯·亚当斯说：“在普拉西之后不久，孟加拉掠夺的消息开始传到伦敦，并且立即发生作用，因为所有的权威人士都一致同意‘工业革命’——划分十九世纪与以前所有时代的大

73 事——始于1760年。……在1759年,[英格兰]银行立即[首次]发行了10英镑与15英镑票面的钞票。"(引自曼德尔,444)

殖民地剥削对于头三百年阶段世界资本积累进程的贡献及其集中于欧洲宗主国,曼德尔对此作了估计与总结:

>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笔偷盗来的资本对于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积累的贡献是决定性的。这项积累在1500—1750年之间创造了对工业革命的有利条件。要计算有关的总额是困难的,但如果仅仅考虑最实质性的贡献,为数已极为惊人。……总额超过10亿英镑,或者说大于1800年左右欧洲所有以蒸汽运转的工业企业的资本。……可以毫不夸张地得出结论:在1760—1780年期间,仅仅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获得的利润,就比[英国]新兴工业所需的积累货币多一倍以上。(曼德尔,1970,443—445。同一主题还可参阅曼德尔,1968)

戴维·兰德斯提供给《剑桥欧洲经济史》的论文《西欧的技术变化与工业发展,1750—1914》中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另一面,而回答得却有点含糊:"需求的增加和大规模生产较低廉货品的趋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相比的扩大,可能无法说明。"但是兰德斯在同一页上继续说:"或许人们可以对羊毛业试作一下这种比较:在十七世纪末,英国的毛料出口可能有助于使该产业的产出上升30%;到1740年,这个比例显然又上升,可能超过50.%;在1771—1772年,稍低于50%。所以,在这个重要部门,主要的动力似乎来自出口贸易,以及该产业中最活跃的出口领域……然而答案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剑桥Ⅵ,第1部分,287—288)但是,后来兰德斯继续说:"英国的商

业边疆在海外——在美洲、非洲、南亚与东亚。第一个是最最重要的：西印度群岛和大陆殖民地一起，在1700—1701年购买了英国国内出口的10%，1772—1773年为37%，1797—1798年约57%。羊毛在这种收益中起重要作用：毛料在新大西洋市场（美洲与非洲）的销售从该世纪初到美国革命前夕增长了6倍。现在则轮到棉花了。……"（出处同上，313—314） 74

对于这一时期中的早期，亚当·斯密（如上文所引述）与芒图已经强调了外贸与市场的重要性；霍布斯鲍姆（52）总结他的观察，指出："棉花工业像滑翔机那样，拉动殖民地贸易这根连杆，就此发射了。"但是对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最新研究或许是迪恩与科尔的研究——他们也对上述《剑桥欧洲经济史》第Ⅵ卷中的第一章《国民收入的增长》供稿——《英国的经济增长，1688—1959》。他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简要地列表总结如下（迪恩与科尔，78；帕卢瓦，1969a，186，复制时加其他年份）：

年　份	出口工业	国内市场工业	农业生产	国民收入
1700	100	100	100	100
1760	222	114	115	147
1780	246	123	126	167
1800	544	152	143	251

帕卢瓦根据这些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得出结论：

从这些事实可以得出的基本教训之一是，从1780年到1800年增长率的显著加快——出口增长4.6%，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1%——正当英国出口的70%输向第三世界（这指的是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统治的地方）。……我们可以注意……1780—1880年间特别高的年增长率是：棉布14.1%，钢铁5.1%，其他金属平均5%。如果只依靠国内

市场——当时是农业——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生产力发展。表3[局部列表如上]中可以看出国内市场形成的限制，农业生产增长率有效地制约了只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工业增长率。(帕卢瓦，1969b，183)

75

二、资产阶级的工业政策和新的国际分工

对于我们分析不发达问题特别重要的，是宗主国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认可这种改变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是由于日益壮大的工业利益在反对相对衰落的农业和重商主义利益的经济——政治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而工业利益正是由后者所产生和养育壮大的。虽然英国长时期来一直在再出口亚洲的棉织品——著名的印花布——这些棉布却在英国禁销以保护毛料工业和供应其原料的"圈"地地主。但是在1774年，在亚当·斯密的书出版前两年，这项禁令废除了。这是代表日益壮大的新生工业利益的重要一步，走向最终实现自由贸易政策的方向。1807年，西印度种植园主阶级、东印度公司和黑奴贩子这神圣三位一体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英国的奴隶贸易正式被禁止，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受到严重削减。1846年，保护英国地主而牺牲新工业家的玉米法被废除；1849年，十七世纪的航海法案受到最后的打击，这个法案曾经在英国资本主义幼年时期大力促进英国资本积累和保护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英国的工业家赢得了把自由贸易体制化并尊奉它为天然的科学规律的斗争。这一解释由两位德国当代人士所推进，他们是弗里德里希·利斯特和卡尔·马克思。一位现实主义的美国当代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后来认可了他们的判断并预言，等到准备就绪，他的国家也要从保护贸易转到自由贸易。

马克思在1848年"论自由贸易"中说：

> 例如，我们被告知：自由贸易将促成一种国际分工，分配给每个国家一项与其自然优势相协调的生产。先生们，你们可能认为咖啡和食糖生产是西印度群岛的天然命运。两个世纪以前，对商业毫不知情的大自然并没有把咖啡树或甘蔗放到那里去。或许过不了半个世纪你在那里将找不到咖啡或食糖了，因为东印度群岛已经靠成本更低的生产成功地抗去了这种据说是西印度群岛的天然命运。这些有自然天赋的西印度人已经像达卡的织工那样成为英国人的沉重负担，达卡的织工从一开始也曾命定靠手工织布。还有一件事绝对不应忽视，那就是即使一切都成了垄断，今天还有一些工业部门统治其他部门，它保证开发这些工业最多的人掌握全球市场的王国。因此，在国际贸易中，棉花本身比起所有其他用以制作衣服的原料加到一起，具有更大的商业价值。看到那些自由贸易鼓吹者在每个工业部门突出某些专业，使之与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更低廉地生产的常用商品相比，那是确实很荒谬的。如果自由贸易鼓吹者不能懂得一国如何牺牲他国而使自己致富，我们并不吃惊，因为这些先生们也并不想懂得在一国内一个阶级可以牺牲另一阶级而致富。《哲学的贫困》) 76

在世界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中，世界贸易大大地扩大，国际分工有重大变化，宗主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生产方式发生深远和深刻的变化。费勒认为(83)，国际贸易在1700至1820年之间翻了三番，在1820至1870年之间翻了五番，后来增加更多。沃伊廷斯基估计世界出

口在1820年为5亿至6亿美元，1867—1868年约为50亿美元，1913年约为200亿美元，1929年世界大萧条以前为350亿美元。“十九世纪七十与八十年代，世界贸易增长放慢，但到十九世纪末再次加快，特别是在1900年以后。1865—1900年增长率平均为1.3%，1805至1912—13年增长率平均为5%。世界贸易价的不均衡增长，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价格波动。……大体校正价格变化以后，以1913年的世界贸易量为100，1867—1868的指数为20—25，1880年为35—40。”（沃伊廷斯基，38—39）但是根据这些数据的计算，世界贸易值及其波动不但是由于价格“波动”而且还由于价格的类别。只要“世界市场”的价格把殖民地初级产品生产者的出口品定值过低而把宗主国制造业出口品定值过高，这就容许了等值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第五章已作了论述），世界贸易实际价值的增长则不同于可能大于它按照世界市场价格的测算。

77

十九世纪主要贸易国英国的外贸数据更为准确，虽然由于他们参照市场价格以有别于实际价值而同样有局限。施洛特认为（42—43），在1700至1800年之间，英国外贸年增长大约1.8%，但是1800至1913年之间年增长为3.4%。但是增长率不均衡。1781至1801年之间，进口增加2.5倍，国内出口增加2.8倍，再出口增加3.4倍（《剑桥欧洲经济史》第Ⅵ卷，1，8）。在1825—1870年这半个世纪中，增长率年平均为4%，在1840—1860年之间，增长率达到每年5%。（施洛特，42—43）

与这种世界贸易的扩大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的基本变化以及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生产方式的变革，在下文将加以更密切的关注。简言之，国际分工的变化已如上述，并由沃伊廷斯基部分地作了总结，他注意到这种变化在更早时期即已开始，但强调它在十九世纪加快了：“……强调点从寻找外国产品变为……寻找

国内制造业产品的出路。……欧洲开始出口制成品，主要是纺织品(开始时)，以交换殖民地种植园提供的热带与亚热带产品。"(沃伊廷斯基，8)但是这种分工的变化也包括贸易"伙伴"之间交换关系的重要变化：贸易条件的变化(先是对英国，然后对各殖民地)，以及不等价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通过不等价基础 78 上的平等交换，通过等价基础上的平等交换，进而为等价基础上的不平等交换(曼德尔前引语)。这些交换依次涉及宗主国经济的垄断资本主义变化，帝国主义变化，日益以对外投资及其海外移民社会的发展来补充国际贸易，以及亚非拉生产方式——生产不发达的方式——的变革(没有它，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不可能达到后来的程度)。

然而，特别在这种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期间，同样的变化并不是到处同时发生。相反，某些地区的先期变化(及其与第三地区关系的改变)决定并加速了第二批地区随后的类似变化。英国的工业革命先于大陆欧洲与美国。十八世纪末，拉丁美洲原料出口增长，制造品进口也同时增加，而拉丁美洲供本地市场与地区市场的制造业则随后毁灭；与此同时，印度仍在大量出口纺织品，其部分原因是英国把这些东方纺织品再出口到拉丁美洲——还再出口到非洲，用以支付购买黑奴来增加美洲的原料出口生产——(见下文西班牙驻墨西哥总督的引语)。另一方面，这时期中由于英国排挤了西班牙和法国及其自身的工业发展，导致了印度的非工业化并成为制造品进口国，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又成为原料出口国。与此同时，拉丁美洲——还有北美——经历了英国纺织品(当然还有东方纺织品)进攻的相对放松，英国以前把东方纺织品再出口，而现在则在摧毁东方的纺织业。英国棉纺织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发展(主要以牺牲印度棉纺织业而取得，这将在下文讨论)依次刺激了

(或允许)英国炼铁工业、炼钢工业和机器工业。

79 这种宗主国经济发展引起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宗主国的再度攻势，殖民地原料供应国生产方式的相关变化使得拉丁美洲、亚洲、中东和非洲肯定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于当前或未来取得自生、自立的经济发展。

三、北　美

虽然对北美作理论、历史分析不属本书范围，我们却可以简要综观它在这段时期中的经历的若干方面，那是特别有关我们对美洲其他部分和别的地方不发达问题的研究的。布鲁切认为(86—87)，“关于南北战争前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学术观点可以简要总结如下：马丁强调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高尔曼强调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诺思强调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福格尔强调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但是为什么到此为止呢？……更早时期的制造业的重要性由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在1810年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强调了。……”诺思(53)总结了这个时期的更早部分：“当代的情况充分证实了这个时期的繁荣。这从道理上说归因于：1，出口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2，这个部门在这期间扩大了5倍(或更多)；3，进口消费品以有利的进口价格有同等的大增长；4，由于出口部门收入增加的影响而使国内经济扩增。”诺思继续指出：“在这整个时期中，贸易条件的长期运动变得越来越有利”(70)，“当贸易条件变得更为有利时，资本流入就增加；当贸易条件变得相对不太有利时，资本流入就减少或者出现实际的资本流出。”(94)

制造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出口百分数略有下降，此

> 后稍有上升。棉织品当然主宰了出口贸易。从1816至1820年棉织品占总出口值的39%，从1836至1840年增加到63%。此后有所下降，但仍继续保持高水平——其后年份到南北战争前，占出口值的一半以上。……当第一次移民大浪潮发生时，移民所携带的资金是正在研究的这个时期中最后十五年的一项重要信贷。（诺思，75—77）

80

正如研究美国史的所有学者所注意到的，这些发展根本不是一致的。迹象表明它们有重要的地区差别和关系。布鲁切总结称（159）：

> 那里确实要发展显著的地区专业化，西北部集中资源进行粮食生产（主要是家庭农场），西南部集中于棉花生产（主要是奴隶种植园），东北部集中于制造业。出口棉花取得的收入（主要通过纽约市）对于使地区间可以相互依存，起了主导的作用。这项收入使南方有能力向东北部支付其各种销售服务和制造品，它还使该地区有能力支付西部向南方的粮食出口；最后，它使得西部能支付东北部的制造品。人口的大增，西部的拓殖，运输的显著改善，以及人均收入的增加，使得地区专业化成为可能，这使得整个经济相互依存的运作效率提高到新的水平。

但是这种"整个经济"的"效率"，且不谈其奴隶生产的棉花出口在英国纺织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没有为各地区产生相似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简要地依次观察东北部和南方的经历。先谈前者（包括中大西洋诸州），"整个地区在1815至1860年期间从商贸区转变成制造业区，东北部占美国制造业的比重

在1850年为75%，1860年为71%，纺织业占主导地位”。（诺思，156，159—160）在新英格兰，如同在英国本土，纺织制造业刺81 激了“后向联系”，即纺织机器的生产，从而又带动了机器制造、铁路、钢铁，以及一般的重工业。（诺思，162）诺思等人试图对这种发展的说明，将在本书第五章H节“关于发展内部市场”中加以讨论。

在不寻求对美国北方的发展和南方的不发达作充分分析的同时，又有必要对与这些发展有联系的政治经济学补充几句话。布鲁切在他的尾声中指出：

> 如果增长依靠工业化，而工业化依靠全国市场，全国市场又依靠大量资本改善运输。如果这些都是有效的估计，那么政府的作用应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的中心位置，因为它有助于全国性市场和全国性信贷的形成。……这是我强调“美国革命”的一个理由，美国革命使得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发展起来从而推进全国性资本主义发展。（布鲁切，1965，213）

但是美国资产阶级，特别是东北部资产阶级对于政权的成就与使用的重要性及作用——布鲁切会同意——是超越这些的。该政权通过美国革命取得的成就，以及1812年对英战争以后得到的巩固，已经涉及到（即便不是决定于）美国革命以前生产方式与阶级结构的独特性以及在拿破仑时代利用国际政治策略手段的暂时机会和外贸盈余，这些在新世界的其他部分却并不同样存在或具备。而且，北方金融、商业和制造业，南方棉花业，与西部农业之间的“有效率的”关系允许北方发展，而以南方不发达作为牺牲，这本身就由于北方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了日

益增大的危机:南北战争。制造业北方和棉花业南方之间的这场战争的近因是两家中哪一家在向西扩张的竞争中占上风。北方的胜利,虽然得来不易,却应归因于它们业已发展的更大经济力量,特别是工业力量。这一军事上的胜利打开了继续或重振向西扩张和发展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道路。保护主义北方与自由贸易南方(及其英国盟友)之间的长期"关税问题"得到了肯定的答案,那就是:由不断提高的关税所保护的、有利于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的。而"南方却并非更少地而是更多地大大依赖于外界资本……它比南北战争以前更加成为北方的殖民地"(道格拉斯·多德,1956,见伍德曼所编书第 251 页)。 82

四、拉丁美洲

在拉丁美洲,当代的历史发展则大人不同,虽然发生矛盾冲突的生产力和利益并无多大不同,但是它们相对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却与北美适成反比。1824 年,英国外交部长坎宁写道:"钉子已经打好。西属美洲自由了,如果我们没有大错铸成,它就归英国了。"四年以后,拉丁美洲的解放者西蒙·博利瓦尔预言道:"美国似乎天意注定会以自由之名来痛苦地折磨[拉丁]美洲。"上一句话并不仅仅是空想,下一句话也不是凭空吓唬。坎宁和博利瓦尔都在表达这种历史进程: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即使不是天意,也是拉丁美洲命定的道路,在拉美,上述两个预言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都实现了,虽然存在地区变化和时序先后。而且,为拉丁美洲脱离西班牙和葡萄牙并取得正式政治独立而斗争的那个社会集团,及其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后代子孙,为了经济自身利益的充分理由而充当了这些预言所示意的巩固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发展的心甘情愿的工具。

在十八世纪期间，英国以及较小程度上法国的制造业发展已越来越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拉丁美洲的出口品以及拉丁美洲本地的制造品。这种渗透的达成，部分通过走私贸易，部分通过从伊比利亚诸国取得的合法贸易特权，部分通过两者的结合。西班牙在波旁王朝期间的经济与政治复兴以及英国贸易所代表的日益增大的威胁和税收的损失，促使西班牙放松了它的殖民地的贸易特权，特别在1778年以后，并（在英法战争期间）进一步扩大为有利于英国。这些发展对于十八世纪末拉丁美洲制造业和原料生产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代的西班牙驻新西班牙（墨西哥）总督在1794年对这两方面均有记载：

83

> 即使没有任何帮助，没有政府的任何直接保护，某类制造品（主要是棉织品）也已发展太多，引起赞美。粗羊毛也为许多工厂提供原料。……要禁止这些国家中制造的主要产品是很困难的。……摧毁那些国家的工厂的唯一办法是来自欧洲的更为价廉的同样或同类商品。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这种商业在情势变化中衰落是非常自然的；欧洲工厂进步快，亚洲纺织品一般价格低廉。……情况是这样的，自从1789年以来，引进的纺织品和商品不断增加。（雷维拉·吉盖多，191—192，200，203）

可以顺便指出，该总督特别提到了由英国再出口到墨西哥去的印度纺织品，他发现这种纺织品越来越被英国产品所取代，虽然现代的一些研究者们认为当时即使是亚洲纺织品的进口也仍在上升。（例如，弗洛雷斯卡诺）

智利历史学家埃尔南·拉米雷斯观察称："[他在智利]分析的[同样]现象也出现于各个[拉丁]美洲国家，强调这一类是十

分重要的。秘鲁历史学家德乌斯图亚·皮门特尔写道：‘贸易自由化靠完全倾销商品到[拉丁]美洲市场来摧毁繁荣的新工厂。’……里卡多·莱维内在提到普拉塔河诸省中出现的形势时指出：‘实际上正是1778年条例所开创的贸易造成了第一次民族工业的衰落。’”(拉米雷斯,85)

驻墨西哥总督在他的同一份1794年报告中还指出原料生产与原料出口的互补性变化： 84

> 在贸易自由化的年代里，进口货的数量远非衰落，而有很大增加，继而农产品及其他产品的出口也有很大增长……几乎翻了三番。……近些年来，矿业产出增长很大。……这种增长的原因并非发现了富矿或优矿，而是由于更多人到矿山来干活。……许多原先的商人……为了更大的利润而[把资金]转向农业和矿业。(雷维拉·吉盖多，198,202,205,209,210)

十八世纪末(拉美独立前)拉美从制造业生产相对转移到原料出口，这具有影响深远的经济与政治后果，实际上这对于推动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以及使其独立后经济纳入特定方向，即进一步扩大原料生产出口，具有决定性作用。农矿业的大生产者和大出口商在十九世纪之交以前因贸易自由化而在经济与政治上都增强了力量，这种事态发展还刺激了他们的胃口，他们当时正对残存的西班牙干预其业务和抽取捐税日益感到恼火。这些生产者和商人成了争取从西班牙独立的政治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资助者，其目的在于获得政权并能自由扩大原料出口业务——从而增加拉美对欧洲(虽然现在是英国)宗主国的更大经济依附。(参见瓦伊塔尔，卡普兰，霍尔珀林·唐伊，和弗兰克

1972)

然而，正如阿根廷历史特别清楚地表明的，拉美进一步转变为原料出口经济的进程并非即时的、自动的或者在政治上轻易的，尽管有英国外交部长的愿望和预测。因为吉佐特曾向法国议会说："在南美洲有两大党：欧洲党和美洲党。欧洲党较小，包括了最明智的人士，他们最为熟悉欧洲文明的思想。另一个党与土地有更多联系，充满了纯美洲思想，是个乡村[各省]党。这个党希望社会以自己的方式自行发展，不借债，不同欧洲发生关系。……"(引自阿斯特萨诺，15)当代阿根廷政治家萨米恩托显然是"欧洲"党的明智成员，他把这种矛盾冲突总结得更为简明，虽非如此形象(至少就他自己的意识形态而言)：这是一个"文明"或"野蛮"的问题。拉丁"美洲人"或省里的"野蛮人"设法保卫和发展残存的制造业并推进拉美自身的发展而不要贷款及其他对欧洲的从属性依附关系，而欧洲人则认为这种关系是"明智的"，他们在原料出口生产利益中的拉美经济伙伴与政治盟友认为那是"文明"的要素。当英国有计划地使印度非工业化时，这些敌对的经济与政治力量还进行了几十年的一系列流血内战，为这一问题和其他问题而斗争。与美国不同，在拉丁美洲，这些内战总是以两党中的强者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这个强者——由于先前拉美原料生产力与利益的发展以及后来宗主国制造业的发展——始终是原料生产者和出口商。

结果，这些工业方面的努力后来都被面向出口的利益及其宗主国盟友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冲击所消灭。例如，这发生在墨西哥，最现代化的纺织机器在那里被安装在一个过去没有工业经验的地区；在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以及阿根廷的门多萨、图库曼等地的内陆城市(例如，据阿斯特萨诺与罗莎回忆)；最最特殊的是，在内陆国家巴拉圭进行了俾斯麦式的或日本式

的民族发展的努力，正如博克斯和卡多佐所报道的，那里的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及一条供国内使用的铁路得到民族资本的资助，与此同时还实行了几乎普遍的初等教育。

十九世纪中期所有这些拉美的民族发展努力后来均被出口利益及英国的不发达问题的政策所取代，其中最主要的是自由贸易政策。 86

因此，虽然许多拉美人知道自由贸易会加快不发达的发展，正如许多议会辩论和文件中都已提出过证明，例如墨西哥的《支持纺纱商与织布商简报》，但初级产品的生产者与出口者都主张自由贸易，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正如费雷尔向阿根廷所表明的："商人与畜牧主是发展海岸区的主力，他们主要对扩大出口感兴趣。因此，自由贸易成了这些集团的哲学和实践政策。……自由出口也意味着自由进口。"（费雷尔，56）因为这些出口商赚的是英镑或美元，费雷尔认为，他们同样的兴趣是，除了自由贸易政策以外，还主张本国货币不断贬值的不发达政策，这使他们可以用赚来的外汇在国内得到更大的购买力，而使得别人的进口更为昂贵，以此使国民收入累退再分配有利于他们，并更加限制国内市场、以进一步加速不发达的发展。

在拉丁美洲，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第二）工业阶段中的第一部分促进了制造业数量的下降和出口原料生产数量的上升。虽然这些并不牵涉到生产方式立即发生质的变革，却结合了欧洲宗主国的政治危机，它们导致了巴西以及实际上所有西属美洲殖民地（除了古巴和波多黎各）的正式独立。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第二阶段的第二部分期间，拉丁美洲争取政权的斗争，及其促进民族工业化政策或进一步扩大原料出口部门，再加上英国棉纺工业的扩张并集中于原料需求（特别是棉花，这只在拉丁美洲很少地方生产），似乎在

十九世纪中叶之前阻碍了原料生产和出口(特别在墨西哥和波利维亚的矿业,它们发生了收缩)。然而,拉丁美洲的制造业在这一期间已经受到影响,尽管进行了各种保护和发展的尝试(总是受到挑战,因此进行得并不稳定)。而且,以前的西班牙商人,甚至许多拉美商人,都被英国(以及更小程度上的法国与美国)航运业、金融业、批发业,以及在许多情况下甚至零售业所取代,这就使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方变成了英国的商业新殖民地,并为十九世纪后半叶在拉丁美洲促成完全新殖民地生产方式的出现,局部地铺平道路。早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期间,宗主国的金融和商业控制,联合着拉美原料出口利益,限制了民族主义政策和国家发展的进展。而且,这些外国运输、金融和商业的"无形"服务却是从拉美抽取资金的工具,而当时正是商品贸易条件显然趋于有利的时候;正如霍尔珀林·唐伊指出的(151—152),服务项目上的这些外国收益的一些"无形"再投资可能在世界资本主义和拉美发展阶段已经资助了宗主国制造品向拉丁美洲的进口(或者,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宗主国向拉美的出口渗透),而当时拉丁美洲的原料出口并未扩大。

87

五、印　度

在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期间,殖民地生产方式以及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交换关系的最重要变革,无疑发生在北美(北美与南美),或许在印度尼西亚,特别在印度。这里我们只可能简要谈一下与我们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达的第二阶段的研究之最为重要的印度史诸方面。正如上文所观察的,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期间,印度的参与并未涉及生产方式的重大质变,它的生产方式是在莫卧儿国王时期

发展起来的（他们逐个向印度榨取贡赋而对先前存在的生产方式未加多大修改）。然而，与英国有联系的印度贸易利益的增长（特别是在孟加拉）以及与此局部有关的印度统治者中间的政治 88 不稳定和敌对的增大，为英国在 1757 年普拉赛战役的胜利以及随后迅速统治和改变印度铺平了道路，而当时，例如中国仍在中国皇朝的坚固统治之下，相对而言欧洲宗主国无法渗人。

在普拉赛战役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业务迅速从贸易变为掠夺。在世界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第一部分（有别于第二部分）期间，1813 年的《关于东印度公司的议会报告》称："该巨大帝国对我国的重要性，要依据它对本王国财富与资本的每年巨大增加来估计，而不是我国制造品从印度人消费中取得的任何突出利益。"（引自克莱尔蒙特，80）然而，我们可以回忆，英国制造品从印度制造品得到间接好处，英国通过再出口，利用后者来摧毁当地的制造业，然后到处在世界上建立英国制造品的市场。在若干年份中，光是印度通过东印度公司提供的直接贡赋，每年就使英国的财富与资本增加约 100 万英镑（穆克吉，193）；迪格比估计，在普拉赛战役（1757）与滑铁卢战役（1815）之间，英国掠夺印度的总额为 10 亿英镑，他以此与英国 1815 年的国债 8.61 亿英镑相对照（那毕竟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克莱尔蒙特，79—80）

在拿破仑战争以后，那是在世界资本积累与（尤其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第二部分期间，与印度的"交换"关系以及后者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且更为急剧的变革。

关于印度的不发达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工业的摧毁和制造业与乡村农业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后者保证印度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均等，不单是在英国统治以前的时期，甚至也在东印度公司时期。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处都破

坏了这种均等，在英国也是一样，它以那些生计和生活方式被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所取代了的人们的巨大人类苦难为代价。所以，后来导致印度等地不发达的发展，不能归因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简单破坏。当英国要求印度等殖民地国家之不发达的发展的时候，一种实质上类似的破坏进程也允许在英国以及其他宗主国出现不发达的发展。这种不同在于：这种破坏进程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进程之相互有关的部分而出现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殖民结构的情况下，正如我们早先所观察的，正是英国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印度的不发达和非工业化。在那里，以前的生计被资本主义发展所破坏的工匠们和农民们，没有也无法被相伴出现的工业发展进程再度吸收。在印度，以前高度发达的乡村手工业被消灭，这些劳动力只有转移到乡村农业，而这个时候却正是由于宗主国的同一资本主义发展且农业本身也被迫变革，使农业更无力承受这种新的负担(过去是可以接受的)。因此，马克思错误地预测说英国的工业化是印度未来的镜子，那是不可能的。

这种同样的不发达进程由于印度工业经济的非工业化和非城市化而进一步大大加强了。杜德报告说(114)：

在1815至1832年间，印度棉织品出口值从130万英镑降至10万英镑以下，或者说这项贸易在十六年间损失了12/13。在同一时期内，进口到印度的英国棉织品总值从26,000英镑上升至40万英镑，增加了16倍。到1850年，多少世纪以来一向出口棉织品到全世界的印度却进口了英国出口棉布的1/4。……查尔斯·特里维廉在1840年在回答议会提问时宣告："达卡(印度的曼彻斯特)的人口已从15万降至3万或4万，丛林和疟疾正迅速蚕食该城。"……

不但是印度的纺织工业，它的钢铁工业也同样被摧毁。怎么摧毁的？现在统治着印度的英国工业“自由贸易者”开始对输入英国的印度进口品征收比输入印度的英国进口品（以自由贸易为名）高出5倍至20倍的赋税，结果，他们只要认为必要就从形体上把印度工业一扫而光。 90

1793年孟加拉以北土地问题的“永久移民”，早在东印度公司统治下就开始了（穆克吉）。这里，英国资本主义利用了印度过去存在的一种体制——“柴明达地主大庄园”制，把它以前的主要功能改变为替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担任收税人。此外还引进了许多层次的租赁人、高利贷者和收税人，把农村的社会结构实质上转变为至今尚存的依附于资本主义的结构，而把旧日的地主变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后来在孟加拉南部地区，又实行了一种小土地所有者制度，虽然形态上不同，却把榨取农村经济盈余的主要功能延伸到那个方向。对原料和食品的日益增大的需求，把印度次大陆的南部变成了与拉美并无二致的种植园经济。杜德报告说(119)，原棉出口从1813年的900万磅上升到1833年的3,200万磅，1844年为8,800万磅，然后到1914年为9.63亿磅。在食品中，不光出口茶叶，还出口粮食，主要是大米和小麦，从1849年的85.8万英镑上升到1914年的1930万英镑。如索纳所指出的，这种供出口的生产增长牺牲了供本地消费的基本食品的生产，明显造成了饥荒频度与深度的惊人增加，而据杜德和巴蒂亚报道，这造成在1800—1850年的半个世纪中估计死亡140万人，1875—1900年的25年中死亡1500万人。（杜德，119）但这已超越了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将在后面的第六章里再来谈印度的转变和不发达。

正是这个改变了的英属印度，在国际多边贸易不平衡与结

算体系中特别起了关键角色的作用，而这种国际体系是帝国主义时期宗主国积累与投资以及殖民地负积累的特点，我们将在第七章中看到这些情况。

91　　印度及亚洲其他地方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内市场和其他经济发展有限，其原因将在第五章里加以研讨，这将通过对"内部"生产关系与"外部"交换关系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特别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第二)阶段期间，但它在重商主义(第一)阶段期间已经开始，而在帝国主义(第三)阶段和当代新帝国主义时期(第四阶段?)仍然继续。

第五章

国内市场的范围受国际分工与生产关系的限制

92

本章研讨古典派与新古典派分析所提出的若干理论问题，而现代资产阶级则试图寻找更为进步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由来自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派与新古典派理论所提出的，它主张一种国际分工并通过自由贸易和比较利益来扩大市场，而导致一些国家为外部市场专门生产与出口主原料以交换他国生产的制造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与弗里德里希·利斯特、贡纳·缪达尔、劳尔·普雷维什和后来的阿基里·伊曼纽尔相关的理论，他们设法对古典派理论提出挑战，指出贸易条件不断下降的长期趋势以及或者不利于低工资的原料生产者的长期不平等交换，他们建议实行保护幼小工业和进口替代的其他政策以期发展内部市场。

本书作者虽然反对前者并对后者立场持批判态度，在早些时候的著作中，甚至在本书的以前几稿中，也曾对后者立场的某些推测抱有同感。虽然这些问题在世界范围资本积累的整个历史周期进程中一再出现，可在分析该进程时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将会干扰这种分析的连续性并确实会使之偏离正轨。因此这些问题就放在这一章里分开处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对分工问题和市场范围问题脱离世界资本积累历史进程的具体现实而进行抽象处理——这在新古典派和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是传统的做法，而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这必然阻碍了它们

93

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同样的，与这种抽象有关的唯意志论发展政策而不是听命于客观现实的理论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些局限在本章中讨论这些问题时是很明显的。为了试图克服这些和其他局限，读者们必须参阅本书后部对资本积累的历史与周期进程的分析，对于重商主义时期请参阅《世界积累，1492—1789》。

一、关于贸易

(1)关于古典派与改良派

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建筑师亚当·斯密与李嘉图，把他们的理论架构建造在与工业革命所同时筑起的大厦之旁——或之内——并与新生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世界性利益相一致。亚当·斯密认为“工业分工特别受国内市场范围所限制”，尤其受从事于效率低下的农业的人口所限制。利用英国已经存在的制造业和出口工业产品的绝对利益，来交换原料而不受重商主义对贸易的限制，就可以扩大这种局限。40年以后，即在英国于1780年起飞到工业革命以后几十年，却又正值拿破仑战争以后制造品需求有限而高膨胀的商品与食品价格危机时期，李嘉图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与税收原理》一书中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并提出了比较利益和自由贸易说，这直到今天一直统治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并在理论上——或意识形态上——确认宗主国贸易与发展政策的合理性。李嘉图不相信分工、工业发展与利润率的下降可以通过向外国市场出口而消除或减缓。他认为，农业生产收益递减，从而使食品或商品成本提高，最终导致工业利润低下，这些可以通过求助于国外高收成的农

业来得到缓解，外国农产品应交换英国的制造品，从而使有关各方相互得利。李嘉图相应地设法废除“玉米法”，它保护高成本的英国农业，允许地主不劳而获地收取地租，保持工资成本不必要的高昂和工业家利润不合意的低下，这样就限制了工业投资和经济发展。工业利益依靠自身日益增大的经济力量，使土地与商业利益不断遭到政治打击，直至 1847 年英国废除“玉米法”并在 1849 年撤销了商业垄断的“航海法”。正如利斯特指出的，英国把自由贸易说奉为神圣，把它作为对世界各地的主要输出品。

可是国外受打击的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中出现了对英国自由贸易说以及英国贸易政策的异议。

(2)关于比较利益与自由贸易

这不是概述比较成本或比较利益说 150 年间所经历的修改和批判的场合，也不是制订我们自己的理论批判的场合。(我们在一篇从未结束或从未发表的分析比较成本“法则”或学说的理论基础的文章中，指出了三十多条基本设想，每一条在历史上和经验中都是没有根据的，有若干条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使得比较利益“法则”在经验上和逻辑上都站不住脚。)对比较利益最严厉的批判以及最认真地试图制订一个替代理论的，到目前为止就是 A. 伊曼纽尔的《不平等的交换》，对他的部分论点在下文将作一批评性的讨论。

然而，注意一下受到英国自由贸易说及其有关贸易政策不利影响的资产阶级利益及其在世界各地的代言人所表达的一些反对和抵制言论，可能是有用的。首先，与比较利益“法则”有关联的国际分工从来不是“自然的”，而是那些英国工业利益及其海外盟友所人为造成的，正是他们把这种分工奉为所谓自然法

95

则。其次,自由贸易从来就不是“自由”市场力量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去那里去那里——虽然不可否认市场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大力行使政治与军事力量,依靠强迫劳动,以及总的通过生产方式的强力转变而强制推行的(正如本书中概述的)。遭受这种“法则”之苦的人们自然要反对,一有可能就要抵制。

李嘉图说明其法则时使用的著名例子:葡萄牙酒交换英国纺织品,事实上是在1817年以前的重商主义贸易而不是“自由”贸易的150年间,把这种分工强加到葡萄牙使其受损而不是受益的一个例子。

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利斯特早已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回顾称:

> 在航海法最出色的结果中,我们可以主要提出……与葡萄牙在1703年签订了梅休因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荷兰与德国完全失去了同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大量贸易。葡萄牙完全屈从于英国,而英国靠它与该国商贸中得来的金银,能大大增加它与东印度群岛和中国的贸易,并在后来的时期确立了它在印度的巨大帝国,而把荷兰从它们主要阵地上挤走。(利斯特,115)

的确,这个条约只是一系列条约中的最后一个,开始是1654年的伦敦条约,通过这个条约,葡萄牙给与英国商业特权,以换取英国对它的政治保护来防范西班牙。其结果早已被葡萄牙总理、庞巴尔侯爵在1755年总结出来:

> 葡萄牙王室是奄奄一息了。英国已把这个国家紧紧地

> 捆在依附状态。英国无需费力征伐就征服了它。……葡萄牙软弱无力，没有活力，它的一切活动都按英国的愿望调整。……在1754年，葡萄牙靠自己生产不出任何东西。它的政治必需品有2/3由英国供给。……英国成了葡萄牙整个商业的女主人；这个国家的所有贸易由她的代理人进行。同时，英国担任该国需要的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商和零售商。在垄断一切的情况下，任何商业都经过他们的手来进行。……英国人甚至到里斯本来垄断巴西的商业。……（引自夏彻斯特，39）

96

同一位庞巴尔后来在葡萄牙发动了一场新的工业化运动，并为巴西的利益而不是英国的利益来开发巴西，以图扭转葡萄牙经济的这种依附和恶化的局面，但未能成功。一切已为时过晚。国际分工和葡萄牙的依附已走得太远。而且，庞巴尔和他的后继者的政策因法国进犯（像整个拿破仑政策一样，这实质上是一种反动）以及因伴随世界资本积累进程的针对国际分工变化所作的调整，而中途停止。

最近一项研究详细调查了葡萄牙对比较利益"法则"的经验，并作了如下总结：

> 英国与葡萄牙之间在1642、1654、1661年，以及最后在1703年（梅林因条约）订立的商务条约中确立并编定两国间的一种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根据的是后来李嘉图所确立的比较利益原理。可是，这种国际分工对葡萄牙经济的负面影响却与亚当·斯密对梅休因条约"明显有利于葡萄牙"的肯定相矛盾，也与李嘉图所称基于比较利益说的外贸有利于所有贸易伙伴的信条相矛盾。……对葡萄牙经济的

> 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那种"类型"的国际分工的结果("未加工品"即初级产品对"加工品"即制成品),这种分工是在十七世纪末由于葡萄牙政治与军事虚弱加上其殖民野心,而强加给生产酒与棉布的该国的。从这种经济安排中涌现的英葡关系是葡萄牙高度依附于英国的一种关系,虽然它加强了布拉干萨王室和土地利益,从而加强了贵族和教会。……通过保证葡萄牙土地利益的至高地位,梅休因条约就在这种利益与英国之间建立了永久的联系,联系的核心就是葡萄牙的依附。……葡萄牙的国际收支因这种国际分工所造成的巨大而长期的赤字使巴西黄金(大约在1700至1760年之间)全部从葡萄牙外流,且大部分流向英国,并在不同条件下,对英国工业化的贡献大大高于过去对葡萄牙的贡献,后者的制造业部门已经牺牲于酒类生产了。(西德利,4—5,13)

97

对自由贸易说的理论基础的主要挑战之一并反对其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南的,来自弗里德里希·利斯特——关税同盟之父。关税同盟旨在通过保护并扩大国内市场以推进德国工业化。利斯特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写道:"英国的历史还展示了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利斯特在回顾了多少世纪中保护英国航运业与工业的航海法实行以来所取得的垄断利益以后,接着说:

> 所以,英国禁止那些与它本国工厂竞争的商品:东方的丝绸和棉布。这种禁令是绝对的,有严厉处罚规定的,它不消费印度的一根线。……英国这样做是否不明智?根据亚当·斯密和J.B.赛伊及其价值理论,是无疑的。……我们

> 持不同的理论，我们称之为**生产权力理论**；英国部长们服从这项理论，但是当他们决定工业政策时并不完全理解它：买原料，卖制成品。……他们的政策大获成功。英国现在生产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达到价值 7,000 万英镑；它主要供应欧洲市场而全世界甚至印度现在也收到英国工人的产品。它本国的生产现在比它原来以印度制成品经商增大了 50 至 100 倍。如果它在过去 100 年中购买这些便宜的印度产品，那么它的情况会怎样呢？……我们已经表明英国如何靠它的政策取得了政治权力；有了权力，就有生产力；有了生产力，就有财富；我们现在接着看它如何靠这种政策达到权力上加权力、生产力上加生产力。……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比它的所有竞争者都大大先进的国家，有了不受任何拘束的贸易就能更好地维持和扩大它的制造业和商业。对这样的国家，世界原则和本国原则都是一回事。这就说明为什么大部分明智的英国经济学家都赞成自由贸易，而其他国家中的聪明和谨慎之士在世界现实状况下接受这种原则抱犹豫态度。……如果本作者是个英国人，他也许对亚当·斯密理论的基本原则永远不会有怀疑。正是他本国的情况使他从那时起的二十多年中第一次对该理论的正确性起了怀疑。……（利斯特，114，117—118，120，79，69—70）

98

利斯特是德国人，他的国家有能力反对自由贸易，而不像印度之类的国家在政治上被英国控制；也不像拉丁美洲，那里的殖民地阶级结构必然使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得到自由出口原料和自由进口制成品的经济自我利益。

另外一个国家能够比德国更早地拒绝自由贸易说，甚至在李嘉图写作以前，那就是美国（理由已在第三章讨论过）。它的

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891年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写道：

> 不但一个国家的财富，而且它的独立与安全，看来都实质上和制造业的繁荣有联系。看到这些伟大目标的国家，应当努力在国内具有所有重要的本国供应。……美国没法同欧洲进行平等条件的交换；缺乏对等将使它屈从于不得不局限于农业而少搞制造业。它对欧洲商品经常的和不断增加的需要，反过来欧洲对美国商品只有局部的偶然的需求，这只能使它处于贫困状态，然而它的政治与自然优势使它有权得到繁荣富足。（汉密尔顿，138）

在汉密尔顿政策实行半个多世纪以后——并在演进中的国际分工中有了特权的参与（这在第二章中作了观察）——另一位美国政治家、美国总统尤利塞斯·S.格兰特说：

> 很多世纪以来英国一直依靠贸易保护并把它用到极致，从中取得满意的结果。毫无疑问，它目前的力量来自于这种制度。过了两个世纪，英国发现采用自由贸易很方便，因为它认为保护不再能够提供什么东西了。那么，很好，先生们，我对我国的了解使我相信在200年之内，当美国从贸易保护中获得它所要的一切以后，它也会采用自由贸易。（引自佩德罗·桑托斯·M.的西班牙语版，125，以此译为英文。格兰特唯一的误差是时间问题。）

自由贸易学说和政策也在十九世纪遇到来自现存不发达国家中受其不利影响的利益的重大反对。比潘·钱德拉在《印度经

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书中总结称：

> 对早期印度民族领袖来说，印度的主要经济问题是它的工业状况；他们共同提出的对印度贫困的解释是印度的工业衰竭，这是由于本土工业被毁以及现代机器工业未能迅速发展以充分弥补这种毁损的缘故。印度的时事评论员日复一日地不断谈论这一主题，不断哀叹这个或那个工业的衰落。他们指出，回顾这种衰落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印度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制造业国家，它的工业产品多少世纪以来供应着广大亚洲市场与欧洲市场的需求。……50 年以前，印度的衣着全由本国制造，而现在则靠遥远的高手。……这就是我们的状况，当我们一眼看到整个形势时，我们感觉如临深渊，稍一不慎就会堕落悬崖，绝难解救。（钱德拉，56—57。关于这一进程历史背景的讨论，请参阅钱德拉 4 与 6。）

100

> 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对于这个一度如此繁荣的国家的工业恶化，也并非漫不经心的。……它的工业化运动史还没有被人写出来。而且尚无充分的研究。（萨克，52，55）

同样地，在各个拉丁美洲国家，英国制造品的加速侵入遭到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抵抗。（弗兰克，1972，第四章）

但是，由于十九世纪国际分工的发展，由于印度等殖民地和显然独立的一些拉美国家中直接受益于这种分工的集团的阶级利益，所有上述这些努力都归于失败。因为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中这种阶级利益和政策的发展已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作了分析，这里我们只联系一个国家智利作一简单总结：

这个国家北方的矿业出口商是自由贸易者。这项政策基本上并非由于其学说——虽然他们也用——而是由于这些先生们具有常识的缘故。他们出口铜、银、硝酸盐，以及其他一些对欧洲与美国不太重要的矿产品，他们得到英镑或美元。他们用这些钱以很低的价格购买设备、机器、制成品或者高质量的消费品。很难想象这些出口商会由于利他主义或者因远见或预见而着眼于该国可能的工业化因之支付进出口税。……南方的农畜业出口商也是强烈的自由贸易者。他们把小麦和面粉输出到欧洲、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去。[在那里出现淘金热以后]……对这些得到英镑的大庄园主来说，支付小麦出口税或征收进口品保护关税简直是神经病。……瓦尔帕莱索和圣地亚哥的大进口商号也是自由贸易者。谁能想象一家进口公司(更不用说一家常见的宗主国进口公司)会支持设立高额进口税以保护民族工业？这里就有势力强大的利益的有力联盟，它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的一部分期间主宰了智利的经济政策。(贝利兹，237—242)

101

(3)关于贸易条件的恶化

十九世纪期间宗主国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根据边际生产率理论，应使宗主国内工资有所增加，而根据比较利益理论，这种进步的好处应通过价格下降或贸易条件改善而扩大到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前，宗主国的工资事实上并未增加；而在此时期的初期，贸易条件在英国下降而在其他国家改善，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英国的贸易条件

上升而原料生产国的却下降。

然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在整个十九世纪则大大改变为不利于现在的不发达国家并主要以它们为牺牲；在它们的贸易条件改善时以及再度下降时情况都是那样。这有若干原因。首先，如施洛特所指出的(46—47)，当英国的贸易条件在这时期的初期下降时，它的出口增长快于其进口以便支付其进口，而总贸易量充分增加，超过贸易条件的下降，以使英国的贸易总收益即使按市场价格计算仍有增加。即使在英国贸易条件最低的时候，只要交换是不平等的，那么在这些年的国际贸易中它的实际收益和现在的不发达国家的实际亏损相应地都更大。可是这种国际分工带给宗主国的最大收益以及带给殖民地国家的最大亏损并非实现于这些年份，而是后来当贸易条件转为不利于殖民 102 地原料出口国的时候实现的。的确，宗主国贸易条件的先下降、后改善，并非彼此无关，施洛特、索尔等人似乎是这样看的。相反，这些变化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在这个时期的初期，英国的贸易条件下降，它的出口增加，当时英国为自己的工业品出口(尤其是棉纺产品出口)通过低价征服了海外市场，并摧毁了拉美、非洲和亚洲(最突出的是印度)的制造业和工业(见第四章和第五章)。当这一过程成功地阻碍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发展后(即使其中有一些后来能再次增加纺织生产)，英国就日益依靠技术更为复杂的金属产品和机器的出口；它的贸易条件在十九世纪末开始改善，即使到那时，除了棉布以外，英国第一次变得为了不断的发展而真正依靠原料、特别是粮食进口。(索尔，12，29)那就是说，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运行得就像是宗主国英国"有意地"降低其价格以便在自由贸易扩张期间摧毁当地制造业的竞争，然后，一旦把这种竞争在殖民地国家有效地消灭以后，就再度提高它的价格。于是，到该世纪末，宗主国帝国主义垄断资本

主义就日益取代了自由贸易，工业上残缺破败的殖民地国家就通过贸易条件的下降而更加遭受剥削。这些国家过去没有、后来也一直没有力量来成功地抗击这种下降，尽管宗主国日益依赖它们的原料(人们可能设想这会提高原料供应国的讨价还价力)，而且殖民地国家再次开始生产工业产品。但是它们总是比宗主国落后一至两个技术阶段，所以，尽管有殖民地的工业生产，技术差距仍不断扩大并总是帮助宗主国维持和提高其价格以及对现在的不发达国家的其他控制。

103 对自由贸易政策以及对比较利益法则的挑战，强调了初级产品出口的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这一挑战是和普雷维什、辛格和缪达尔有关的)，因此是具有重大局限的。这种局限主要不是右翼资产阶级批评者所说的经验问题，他们声称统计数字并不表明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在过去世纪中出现无可争辩的恶化。(金德尔伯格，迈耶)也不是否认贸易条件的变化来设法挽救古典派学说和政策(如迈耶那样)的理论或意识形态问题。十九世纪的国际分工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帮助了不发达的发展，不论贸易条件朝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发展。而且，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增长加速了，这正值大萧条期间它们的贸易条件恶化最严重的时候，而且恰逢大战期间战争阻碍了它们赚得的外汇流入国内。(弗兰克，1967，1969，1972)那就是说，贸易条件像这里讨论的其他考虑一样，只在资本积累进程、分工和生产方式变化的背景下才有意义，贸易条件首先反映了它们，其次才帮助加强它们。

(4)关于不平等交换

除了通过贸易条件的变化来衡量比较利益外，有必要考虑

贸易条件或交换条件本身。它们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为什么？有时设想，原料与制成品之间的交换，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对原料生产国是不利的。但是伊曼纽尔和阿明否认原料生产本身造成了低工资和不平等的交换，伊曼纽尔还提出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持他的否认。伊曼纽尔认为，在美国、英国自治领和南非的高工资自动吸引了企业家去进行资本密集型投资与生产以降低成本(伊曼纽尔，161—162)。可能这种情况在现在的不发达国家中要少得多，在那里，不但工资低下，而且工资水平关系到一种基于对劳工进行超额剥削的不同类的单一出口生产方式。而且，伊曼纽尔认为(174—178)，除了资本有机构成外，不发达还联系到他称之为"劳动力有机构成"或者有关低技术/低工资部门或产品(有别于高技术/高工资生产过程)的经济结构。前者的专业化妨碍发展，因为这意味着不但生产低价产品，而且是以低工资生产的。为了克服这一障碍，伊曼纽尔建议，只有两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更多实行闭关自守，这阻碍通过不平等交换的价值转移；或者实行多样化，包括高技术/高工资的资本密集型部门。伊曼纽尔认为前者是不发达国家有把握的政策，而后者则是它们更容易的政策(185，292)。(前者实际上要求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苏联/中国式的外贸政策，而后者则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改革而开始实行。) 104

伊曼纽尔在他的书里提供了许多图表。木材与石油都是原料，而石油生产需要比木材生产更多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可是石油生产国的产品价格低(伊曼纽尔认为，在1973年以前比统计数字初看的更低)，而木材则相对价高(除了最稀缺的最奇特的热带木材)；石油由低工资国家生产，而木材(除了热带木材)则由斯堪的纳维亚和北美高工资国家生产(20—23)。英国把印度和澳大利亚分别变成英国纺织业的棉花供应国和羊毛供应

国，但是在一个国家这种原料出口生产导向了不发达而另一个却导向了发展(293)。现在，不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生产纺织品以及某些其他制成品。英国则转向其他产品；纺织品出口就成为低价出口品，因为它现在是低工资产品。

在原料出口与不发达或相对贫困之间，以及在工业与发展之间，并无决定性的联系：出口原料的英国自治领和丹麦是富裕的，而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则相对较穷(290)。的确，伊曼纽尔没有把多样化也作为一种实际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如果不发达国家转向高价格商品(先是纺织品，现在是钢以及进口替代的制成品)，这些就成为低价格商品，因为是低工资的不发达国家在生产它们，而高工资的发达国家就把它们的生产转向新的、更为精密的(甚至是老的、手工艺的)高价格商品。伊曼纽尔认为，并非产品界定了生产者，而是生产者界定了产品；而"肮脏的"不发达生产国一碰到任何东西就把它"弄脏了"。特定的国际分工变化了，但是原则仍然是同样的(伊曼纽尔，183—189)。那么，从理论上讲，对不发达国家的解决办法似乎只要提高它们的工资。但是伊曼纽尔明白承认，除了在极狭窄的限度以内，这也不是解决办法，因为"这种公式只是一种简单的理论纲要……没有考虑应用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实际可能性。……"(伊曼纽尔，170)

105

对世界资本积累第三阶段中不平等交换所作的第一个严肃而开拓性的分析是由伊曼纽尔提出的，他的分析对于问世150年之久的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了另一种选择，而并非仅仅是批评：

> 我们颠倒了李嘉图关于国际贸易原理的基本假设。不是平等工资和不平等利润率，我们采取了不平等工资和利

> 润有待标准化而趋于平等的假设。这些前提使我们在各方面采取与国际贸易官方理论相反的路线。……拒绝了它的基本假设——资本不流动——以后，在国际贸易中决定均衡价格的不是比较成本而是绝对成本。……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定义包含了原则问题。它把工资作为系统中的自变量。……工资因地理区域而不同，并独立于商业交换的起伏。……一国与另一国工资之差可以是 1:2 或者甚至 1:3 或 1:4，设想商品市场的波动可能是这些差别的原因，或许是合法的。但是一旦工资差别达到 1:20 或 1:30，而且它们只在地域上有差别，相反在时间上很僵硬(这只在缓慢的线性趋势上才看得见)……那么它们的确构成了系统中的自变量。(291,286,111,113,118)

伊曼纽尔认为，某些国家同其他国家之间工资水平的这种巨大差异(主要是宗主国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或新殖民地)与劳动生产率的类似差异并无关联，后者是截然不同的次序或量值，而且要小得多。所以，伊曼纽尔认为，前者与后者之间以世界市场价格进行的国际交换必定导致有利于宗主国和牺牲殖民地的“不平等的交换”。而且，一旦不平等交换开始，它的后果便是积累性的：它把可投资的剩余从穷人手中转移出来(因为他们不能投资)，而转移到能投资的富人手中。这就扩大了工资差距，更增加了不平等交换，而且它影响了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伊曼纽尔，167 等处)。而且，由于它很少受到特别是德国、瑞典和澳大利亚(以及最近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名望的白手起家的人士的注意，也许值得特别提一下看来没有从殖民地世界剥削关系中得利的第三国。然而，亚当·斯密在两个世纪以前已经观察过，他在“关于欧 106

洲得到的利益……"一章中说："美洲的发现与殖民地化，可以首先加强与它直接贸易的国家的工业。……其次可以加强不与它直接贸易的国家的工业，通过其他国家作媒介把它们自己生产的商品送去；诸如奥地利佛兰德省以及德国的一些省。……但是，那些伟大的事件也应有助于鼓励诸如匈牙利和波兰等国[亚当·斯密也在这方面提到了瑞典]的工业，它们可能从未送过自己生产的一件商品到美洲去，所以可能根本不明显。然而，那些事件促成了这一点，那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带到了那里，[匈牙利和波兰的]那些剩余产品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市场。它们提高了它的价格，从而有助于鼓励它的增产。虽然它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带到美洲去，……但通过最初由美洲剩余产品所推动的贸易周转，它可以找到市场。"（亚当·斯密，557—558）亚当·斯密认为"无可怀疑"的事，却被标榜亚当·斯密名字的人们全然忽视或否认了；只在最近，一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作家（虽然贝特尔海姆甚至否认他这一点）伊曼纽尔才分析并强调了国内生产关系（甚至在第三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平等交换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虽然切·格瓦拉（贝特尔海姆在这方面把他与伊曼纽尔相比较，可能也会否认他的马克思主义称号）在1964年阿尔及尔亚非经济讨论会的讲话中已经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以资本主义垄断"世界"市场价格进行的贸易中取得的不平等交换的垄断部分（这种"世界"市场价格一部分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一部分由垄断所决定，过去已经由卡洛斯·罗米欧所撰写的格瓦拉的古巴工业部的一份内部油印文件《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经济发展》中作过分析）。

107

萨米尔·阿明对于近年来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而使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资金的数额，作过一些估计。不发达国家

1966年的总出口值(按"世界市场")约为350亿美元。其中,"最现代化的"石油、采矿、种植园等出口部门占75%或260亿美元。如果同样的产品由发达国家以同样的技术和同样的生产率生产(占投资资本15%的利润,7年期的折旧,资本系数为3.5,剩余价值率为100%),这些产品的价格还将高出80亿美元。不发达国家其余的出口品为90亿美元(即总额350亿美元减去"现代"部门的260亿美元),这将定值为230亿美元——根据阿明的估计,工资差距约为20:1,如果使用(或可能使用)宗主国的技术的话,生产率差距最多为2:1——或者比"世界市场"分配给它们的价值高出140亿美元。不发达国家生产的价值所得到的这两项被压低价格的支付总共为220亿美元(80亿加140亿)。如果价格与工资相应于生产率,那么它们得到的总支付应为570亿美元而不是它们实际得到的350亿美元。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机制所转移到发达国家去的估计220亿美元, 108 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净值的大约1.5%,但相当于不发达国家国内生产净值的大约15%。(阿明,1/23—25)这大约相等于不发达国家的总投资额(所以大大多于它们的净投资额)。除了这个事实以外,这种资金转移的经济与政治意义,还在于转移到发达国家去的这1.5%不是使它们的人民受益,而是使它们的少数垄断势力和老板受益(如麦格道夫所谈美国的情况),还在于即使不发达国家产值的这个15%,其受益者也是在不发达国家中拥有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手段或控制其商业的这些或其他宗主国的垄断势力。(巴伦,1957)

伊曼纽尔的著作在一些人中引起了严重的辩论,有人(包括他自己)同意这种不平等交换是存在的,但不同意它缘于相关的生产方式,也不认为它导致了发展和不发达的后果,并导致了(新)殖民地和宗主国中的政治力量及战略或可能性。如果明白

地参与这一辩论，那就超越本书范围了，虽然我们的部分分析必定已经包含了辩论中的若干问题。

虽然伊曼纽尔的分析主要关注工资水平与不平等交换之间的关系，他也承认工资水平密切相关于、甚至决定于生产方式甚至生产类型。伊曼纽尔写道：

显然，决定均衡工资的体制性因素首先对人类社会是外源性的，这并非偶然。……工资水平直接作用于经济因素：**它决定加强资本有机构成的必要性，它通过扩大市场来吸引投资**。……挑选一个在许多方面有可能为未来作储备而吸收固定资本的部门，［以及］挑选一个允许雇佣并培训更大比重合格工人的部门，也有助于决定工资水平和国际交换是否平等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伊曼纽尔，161—163）

109

伊曼纽尔还写道：

我们相信，正是这一部门和那一部门劳动力"有机构成"的这种不同，至少在最大程度上解释了一国内不同地区发展的差异。（伊曼纽尔，177）

阿明在他的《世界规模的积累》一书的第二章里强调了这些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要在这里总结这些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将简要摘引贝特尔海姆和帕卢瓦在这方面的意见。贝特尔海姆在他的导论"理论评述"中论及伊曼纽尔时写道：

"不平等交换"不能只用"要素酬报率"来加以解释，因为这是一个客观基础，而且是重要之点。……帝国主义剥

削同时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进被统治国并且联系到资本运动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心激发的结构变化这一重要事实。……正是穷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关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特殊结合和性质构成了某些被统治国"贫困"的客观基础，这也解释了由此导致的低工资和"不平等交换"。为了肯定地逃脱"不平等交换"，除了转变这种客观基础并从而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别无他法。……（贝特尔海姆，引自伊曼纽尔 318，327，314）

帕卢瓦在评论贝特尔海姆与伊曼纽尔之间的辩论（不在这里转载）时总结称：

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就是在全过程中对不同生产部门各有不同地产生不同积累率的影响：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个事实。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不平等发展的规律（其本身决定于劳动力价值的进程），强调不同部门发展不平衡的生产价格才表现出来。伊曼纽尔的生产价格看起来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然而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产物。因此不平等交换不是目的，不像该文作者［伊曼纽尔］就此所商讨的，而成为只是加深发展差距的一种手段。……不平等交换确实是工资不平等的结果，但后者本身却决定于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在一个以发展不平等为特点的世界上，不可能有交换平等。（帕卢瓦，无日期，132，135，136）

110

我们同意，我们在这里吸收这些意见只是为了澄清我们自己分析中的一些因素，而不是要转载各辩论者的全部论点，我们

对他们没法评个谁是谁非。

二、关于市场

讨论的另一个方面更加集中于原料生产——或者实际上只是原料销售——某些地区据说在这方面具有比较利益并产生了对“外部”市场而不是“国内”市场的依赖，以此作为工业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将依次提出对二元结构和飞地经济、主产品经济增长理论、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内部市场、新生工业与进口替代等若干方面的讨论。

(5)关于二元结构

在资产阶级的分析与政策中，时而明显却往往含蓄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内容是，据称在不发达国家内（波克、刘易斯、费和拉尼斯等的观点）以及在这些国家和宗主国之间（辛格的观点）存在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二元结构”。这种理论认为，发展发生或产生于二元结构中的主导部门而实际上排除了落后部门，发展将会和必须从主导部门扩散到落后部门去。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弗兰克 1967，1969）指出，除了据称来自二元结构的政策以外，有关存在二元结构的理论本身在理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此外，第三章中对新世界的讨论以及第四章和第六章中对亚洲和非洲历史经验的回顾也提出：重商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排除了这些资产阶级理论家所设想的二元社会或二元经济。而且，本书以及全世界对世界资本积累和有关生产方式转变进程的任何严肃分析都指出，国际分工及其理论分

111

析长期以来始终与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的理论不相容。

与二元社会理论相关的有一种——最反动的——政策被人以下列常见的表述来总结，如基普林所说的“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这一对儿永远碰不上”，要么说印度尼西亚这一部分是“热带荷兰”要么说“英国挑选诸如此类的地方来种植其（甘蔗，等等）”。这种二元主义理论认为宗主国发展和其他发展都局限于少数地区，包括一些宗主国的海外“飞地”，并认为这就足够了，且只会有好处——例如波克就这样认为。

另一种政策以同样的二元主义假定为前提，它认为发展必须从“先进的”“资本主义的”部门向“落后的”“传统的”部门扩散，认为后者正在或必须逐渐被“现代化”并“结合”进世界社会与经济的主导部门。这种概念与政策实际上强调了国际上工业国与“第三世界”之间的一切“进步的”和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和政策，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二元”社会（以及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众与“边缘”人口之间，正如美国约翰逊总统的国内“向贫穷开战”和“伟大社会”计划所表现的）。我们也已经在以前（弗兰克，1969，第二章）批评过这种观点，认为它在理论上没有根据，在实践上不真实，在政策上不可行。这种观点的一个变种是“主产品增长理论”，它推荐主要原料的生产与出口作为增长的动力，认为它将会或能够影响到其他工业部门并产生国内市场后来的发展或基础。 112

(6)关于主产品理论

主产品增长理论是由哈罗德·莫尼斯和他的追随者根据加拿大经验为基础而提出的，梅尔文·沃特金斯总结如下：

主产品理论的基本设想是：主产品出口是经济的主导

部门，为经济增长定下了步调。有限的——起初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国内市场，以及生产要素比例——土地多而劳动力和资本少——对资源密集型出口品或主产品产生了一种比较利益。经济发展将是围绕一种出口基地的多样化过程。所以，主产品理论的中心概念就是出口部门的扩散效应，是出口活动对国内经济与社会的影响。那么，要构建一种主产品理论就必须区分这些扩散效应并指出它们的决定因素。……区分了这些收入源流，我们就能以一种分散的乘数——加速器机制的形式来说明主产品理论。用赫希曼的话来说，因出口部门增加活动而导致的国内投资可以分为三种联系效应：后向联系，前向联系，以及我们将其称为最终需求的联系。因此，主产品理论变成了一种资本形成理论，……强调了资本密集型农业对于向本国农机生产提供联系效应的重要性。理论与历史指出最重要的后向联系的例子是为集中主产品而建造运输系统，因为这会具有进一步的、强有力的扩散效应。前向联系是利用出口工业的产出作为投入来衡量引向工业的投资。最明显的、以及典型地最为重要的例子是……[原料的]进一步加工。……最终需求联系是引导为出口部门要素生产消费品的国内工业而投资衡量尺度。它的最大决定因素是国内市场规模，后者又取决于总收入与平均收入的水平——及其分配。（沃特金斯，53—55）

沃特金斯在其他地方接着金德尔伯格提到了主产品生产的"转变能力"以及避免"陷入'主产品陷阱'"的能力；沃特金斯坚称："我们始终力求强调主产品理论的特殊性质。"（沃特金斯，60，63，64）

显然，在主原料生产与出口达一个世纪至四个世纪以后，并没有为大部分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产生"转变"为生产品与消费品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国的"能力"，却使它们（也许不是全部）陷入一种"主产品陷阱"，至少陷入了一种"低水平（不）平衡陷阱"，它们已越来越无力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来逃脱这种陷阱。那么有哪些环境使加拿大和类似经验以及主产品理论本身如此"特殊"呢？

(7)关于联系效应

且不谈国内积累中部分盈余因为转移去国外而无法用于投资的问题（本章第一节已讨论过），我们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在不发达世界里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通常没有——或只是缓慢地——导致以国内生产品部门为基础的发展呢？

事实上，在世界资本积累第一阶段中，供出口的矿业和种植园原料生产的确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提供了一些后向联系——采矿、熔炼和蔗糖加工设备，以及运输这些原料的设施。虽然其中有些无疑是在欧洲宗主国以及北美新宗主国生产的或者从那里进口的，但其中不少也是就地生产的，只是因为运输这些资本货是不可能的或者太昂贵了，所以把它们用低工资的劳动力就地生产与进口相比就有竞争力。或许这些后向联系没有许多或重要的进一步扩散效应是因为它们只涉及技术简单的劳动而不是技术上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的资本货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 114 的那个阶段，在宗主国本身生产这些殖民地的资本货不会牵涉到质量上很不同的技术复杂性或劳动力/资本密集性。所以，尚不完全清楚，为什么宗主国在这方面已经具有或得到对其殖民地的比较利益——而不是导致发展的利益。可能有两个重要的例外，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在甘蔗岛屿上，缺乏资源

(矿物和木材,因为后者是用作燃料的)以及缺少劳工可能使得许多这样的后向联系与岛上的甘蔗生产相比以及与欧洲和北美的生产资料生产相比,相对地没有竞争力(如我们提到过的,北美具有特殊的比较利益)。另一方面,欧洲和新英格兰可能在造船业方面具有优势(虽然部分地是由"航海法"所加强的,即使不是由它产生的);而且这方面特殊地后向联系到生产资料,而具有很广泛的效应,不太依靠其他生产性活动,例如通过商业垄断力通过船运来剥削他国的生产。另一方面,简单地用宗主国重商主义垄断条例来解释不同的发展道路,回顾起来是较少具有说服力的。因为在原则上,所有的重商主义宗主国都可以求助于同样的条例;虽然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在实践中它们相当不同。这些同样的条例也不许(但不是阻止)当地生产各种制成品消费品供应狭小的本国市场甚至供出口,尤其在西属采矿殖民地(在十八世纪,在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矿区和前矿区)。的确,这种供消费市场的制造业发展以及西属殖民地的一些资本货生产,也代表了对加工当地原料的某些前向联系,诸如棉花(它甚至没有为出口而种植)。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观察的,这种发展在独立后的拉丁美洲的一些部分产生了新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核心。在印度,同样的情况更为突出,虽然它的纺织制造业的一部分发展(或许有讽刺意味地)是在十八世纪由出口所吸引的并由掠夺印度的那个东印度公司所刺激起来的。

115 在十九世纪,我们这个问题的各种内外方面都不断变化。英国的工业化,通过前向联系到无产化农民的生产和为他们生产,通过后向联系从纺织业生产到纺织机器的生产,并由此发展到机器制造、钢铁和铁路,改变了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所有殖民地部分联系的长度、强度和方向。英国纺织业的生产规模

以及由此推测的纺织机器及其他机器的生产规模，据我们观察，要求印度特意强制实行非工业化，并使印度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割裂开来，或者把这种联系转移到宗主国经济。如果英国经济有可能（以很大的社会成本）吸收它的工业劳动力（以及原料、煤矿的劳动力），那至少部分是因为印度农业被迫——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歧视性关税和粗暴的武力——吸收以前从事制造业和手工业的劳动力。可是，印度农业与制造业的这种割裂——按照列宁或赫希曼的看法——无法促进前向联系到进一步的加工或后向联系到机器制造和生产品生产（除了在英国）。在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期间，非工业化和非联系的过程不太剧烈，但当时英国和法国不太必要这样做。与此同时，宗主国的商人渗透到拉美的批发业和零售业，这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来割断与拉美制造业的现存联系，或者使它们重新定向为进口宗主国的机器（这已越来越有竞争力），以供幸存下来的小小的拉美工业使用。同样情况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在那里，北方的资本日益能够利用北方和南部的潜在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来积累资本并投资于导致发展的工业（在北方）以及南方的棉花生产。

这使我们又回到了原料生产的问题。为什么原料生产的迅速扩大——先是美国南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棉花，西非的菜籽油，加勒比的糖（和棉花），所有三大洲的饮料（咖啡、可可、茶），南亚和东南亚、美洲和大洋洲的粮食，大洋洲的羊毛与肉类，以及最后在十九世纪末（除了一些小的例外）除贵金属以外的矿物以及供宗主国发展的其他原料——却未能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产生起飞而进入后向联系生产国的自力的本国生产，或者进入前向联系的加工品，而唯独在英国的白人自治领以及美国才这样？ 116

关于这部分的探讨，我们为了此后的研究仍将试图把外部交换的效应保留到处理资本流失问题时(并借此澄清)。但是把"外部"关系同"内部"生产方式孤立开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问题正是要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不发达部分的多种生产过程及方式中确立这种关系的模式。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在这里研讨这些，因为它们将在我们对十九世纪末期世界资本积累第三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生产方式之转变的讨论中加以处理(在第六章)。这里我们只抽象出原料生产和资本积累的若干方面(或者对某些我们无法抽象的方面加以概括)。

我们可以一开始就问：大规模的原料生产是否本身并不构成如列宁所说的那种专供生产性消费的生产资料生产？我们敢作肯定的回答：它们是构成生产资料生产的，只要这些原料并不以自然形态消费而构成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间阶段的一种投入。虽然这对于工业自然原料更为明显(如矿物和一些有机原料，诸如到十九世纪末的橡胶，以及从一开始就属于此列的棉花，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沙漠作物"的生产也是这样，诸如甘蔗与咖啡，而粮食与肉类就更加如此了，这些原料都是进口的以便使其他资源在各处可自由用于生产进程。而且，像"正统的"工业资本货工业一样，殖民地的原料生产(它的生产并不比工业资本货生产更"传统"或"正常")自十九世纪以来就越来越资本密集、技术创新和部分使用熟练劳工。(虽然大规模矿业与农业可能使用许多非熟练劳工，它也需要相当多的熟练人员；大规模纺织或装配线工业生产并非特别以熟练劳工投入为特点的。)

117 阿明认为，今天不发达国家原料出口中的大约75%并非来自"传统的"低生产率生产进程和部门，而是来自"现代的"高生产率生产进程和部门，如采矿、种植园农业，更不用说当代的石油了(阿明，导论44—45，第1章23—25)。在这个意义上说，自

然生产品的生产本身无需与工业生产品的生产有多大不同。而且，如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工业国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也生产很大数量的原料并出口这些原料——前者为煤，后者为棉花与小麦）。

但是，在国内生产原料主要供出口国外的情况下（不是单一的主要原料，而是若干种原料同时生产），长期联系效应和短期循环加速效应，也就主要延伸到国外或转移到国外了。这似乎与出口部门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否由本国所有及其商业营运是否由外国人控制（主要情况一直如此）没有多大关系。至于这些经济社会中是否存在任何国内乘数效应（阿明对此加以否认），外国因控制着这些原料的商业营运而增加的收入以及因拥有这些原料的生产手段而额外增加的收入，当然把由此产生的扩大乘数效应中的很大部分转移到国外。（可是，万一发生紧缩，这种乘数效应就主要留在本国了。）因此，十九世纪及更早时期，供出口的原料生产专业化及其进口制成品交易严重阻碍了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资本积累与生产性消费——与制造业产品生产国的情况相比，即使不考虑前者向后者通过不平等交换的资本流失也是如此。只有很少数非宗主国的原料生产国能克服这种阻碍，而且它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每一个都是在相当"特殊"的环境下这样做的，这种环境是很少的，甚至阿根廷或乌拉圭也不具备，更不用说让所有的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都这样做了。

这种原料生产的前向联系在殖民地国家相对缺乏，它们的扩散效应也很有限，因为它们的原料加工仍然是进口这些原料的宗主国的一项主要营业。惠及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及其他消费品工业的这种前向联系（不论对本国市场或外国市场）对原料生产国而言却一直无法"得到"，直到后来宗主国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它们在国际分工中进入了更先进的生产过程，因而能越　118

来越多地把比较简单的加工活动(或过程)留给不发达国家。即使到那时,在后者国家里的这种"进口替代"过程,通常也只在宗主国发生危机时——两次世界大战和其间的大萧条——才会加快,那种危机阻碍了宗主国供应那些已加工的消费品(虽然在过去15年中,这一过程已经被宗主国的对外投资吸引到不发达国家去)。

到了不发达国家也能把它们的原料生产前向联系到原料加工或后向联系到必要的设备生产的时候,这种联系就不再能如此推动国内发展和/或国际竞争力而促进国内资本积累或避免对外资本流失了(除了在我们将在以下看到的隔绝于世界市场的"特殊"环境下)。

与此同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一部分时期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几乎没有前向联系或者其扩散效应极为有限,这有若干原因。外国对原料商业营运的控制,尤其是外国对主要的原料生产手段的拥有,(1)通过把加工业转移到宗主国去(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转移到其他依附性经济社会),从而限制了可取得的前向联系的潜在扩散效应;(2)它们限制国内加工业的扩张,如果该加工业与宗主国的经济、金融或政治利益相矛盾的话;(3)它们使资本投资和基础结构供应转向出口生产而不是可能取得的前向联系;(4)它们通过价格竞争或者通过关税与汇率特权来吸引那些同前向联系的本国生产相竞争的产品进口。在某些原料加工业于当地出现的地方,宗主国往往在金融上或商业上加以控制或者在设备上完全拥有,从而对这种加工业对本国的潜在扩散效应施加类似的限制。进口外国产品的市场竞争或者(在非洲)本国生产——过去是,现在还是——凡有必要都由外国(或移民)政权在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国家加以补充或甚至取代。最最极端的实例或许是对印度工业的歧视性关税及具体

119

拆毁、在中国的特权通商口岸，以及在中东、北非和黑非洲实行的十六世纪式的殖民主义方法(在第四章和第六章讨论)。但是拉丁美洲主权国家中外国人所得到的特权也有助于打破或扭转前向联系。这些特权之过去和现在的来源不但应从国内私人出口利益同外国利益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盟中去寻找，而且应从这些据称独立的国家对宗主大国的巨大依附中去寻找。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提到国家依赖原料进出口税而取得财政收入以及对宗主国的金融屈从(不但通过直接外债而且通过宗主国管理世界资本主义货币机构与机制)。

前向联系(虽然还有后向联系)还受阻于出口经济的一种需求结构及其国家官僚主义，这已产生了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迅速发展和膨胀，这既有国内生产加工效应，又有出口“替代”效应。宗主国经济也经历了第三产业部门的扩大。但是它不但增长相对地缓慢于收入水平和生产能力，而且在某些事例中甚至绝对地滞后于不发达国家。据科尔多瓦(Ⅷ,41)的对比，1950年德国在第三产业部门中的劳动力占33%，而1936年委内瑞拉则是45.9%！此外，发达国家中第三产业部门的发展主要是节省劳工和资本密集型的。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供应巨大而有弹性，那里的第三产业部门的增长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非常不熟练的劳工)，并有先占的潜在生产性联系。(这里，第三产业部门在白人移民出口经济中的相对较早增长是另一码事，因为移民国家更严重的劳动力缺乏和更高的工资，它比老的宗主国经济更加节省劳动力和资本使用。

现在来看后向联系到作为主导原料部门的投入问题，我们可以回忆，沃特金斯认为最重要的在于出口部门的运输和其他基础结构。在十九世纪末期，这种后向联系无疑的确发生在原料出口经济中，但是它们往往并无足够的扩散效应使之能起飞， 120

飞出它们的主产品陷阱，并取得能在当时或以后改变和发展其经济的生产性消费。在大多数的这些出口经济中，国内运输系统(不用说港口设施和对外航运线路了)只便于宗主国榨取原料以及从宗主国引进制成品和其他产品。因此，后向联系的扩散效应，不论是直接生产铁轨、铁道车轮，有时甚至是铁路和其他设施所用的燃料，以及间接生产进一步后向联系的金工机器产品和用于推动出口经济的设备及通过船只——港口——铁路的联系而周转的消费品，全都扩散到宗主国经济，无论(实际上是由于)这种生产性消费在殖民地占据何种具体位置，宗主国都从中得到这部分生产需求。(这种往往由欧洲资助的铁路建设，也在美国和英国自治领地发生，比现在不发达国家更甚。)但是在美国，这种后向联系并不是简单地扩向欧洲，而是注入了美国经济内部的资本积累进程和生产性工业投资。这种联系一度也较少地发生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国似乎都已在十九世纪最后20年间遭受了一次发展的重大停滞。(关于加拿大，请参阅伯特伦，见伊斯特布鲁克与沃特金斯合编；关于澳大利亚，请参阅惠尔赖特编。)

日本在它发展的早期阶段发展了消费品工业和生产品工业，由于它隔绝于世界市场竞争之外，所以它的这些工业与世界市场没有竞争。直到日本完成了发展的某个阶段，它才设法发展有竞争力的、甚至在技术上领先的工业。但是，没有对生产品121 工业进行早期保护以防止这种竞争，日本就不可能发展生产性(虽然并非世界市场的竞争性)消费，后来成为其起飞的基础。苏联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隔绝状态取得了同样的结果，但技术上差距大；或者换句话说，隔绝状态促成发展，不论差距如何。这种发展道路对于现在的任何不发达国家肯定是没有了，它们通过民族资本主义(即使那是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相联系。东欧经济是否能在具有这种差距的情况下取得起飞和持久增长，尚有待观察，而不利于它们的证据却在很快积累起来。

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能够取得资本主义发展，不但没有隔绝于世界市场，而且还出口原料到世界市场。虽然这里根本不是一个充分的答案，却可以提出部分理由：这两国都善于利用世界大战造成的本国市场危机，当时它们都已经实现了在特殊生产方式内的生产权力，这使得它们利用危机造成的机会（它们与一些现在的不发达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这种机会）进行一些资本积累和持久的发展，而那是现在的不发达国家所得不到的。甚至由于这一理由，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还有西欧——的外国投资已被吸引到、并已提供资本和技术给技术上先进的、推动发展的部门（供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而不会流向不发达国家。

(8)关于发展国内市场

主原料生产专业化与出口事实上并未导致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看法在发展问题上产生了一种与主产品增长理论颇为相反的理论。这一理论与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美经委会）有关，也与一些北美人对美国历史发展的解释有一致之处。根据这一理论，供出口的主产品生产带来的是不发达而不是发展；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却取决于国内市场的发展。费雷尔总结了这一观点，本书作者在过去的著作中加以摘引并表示赞同： 122

毫无疑问，除了当局对于同宗主国有竞争的殖民地活动施加限制以外，出口部门的结构，以及财富的集中，是对

于国内生产结构多样化的基本障碍，所以也是对人民技术水平与文化水平随后的提高、与国内市场演变有关的社会团体的发展，以及寻求不受宗主国当局约束的新的出口方面的基本障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这种狭窄场面说明了殖民地美洲世界以及臭名昭著的西葡属地的很大部分经验。（费雷尔，31—32，摘引于弗兰克 1967，26，弗兰克 1969，376，弗兰克 1972，38）

虽然我仍然不能接受相反的资产阶级理论，可是从那时以来我开始越来越发现费雷尔总结的这一理论有严重局限，而不能再同意他所说的“毫无疑问”。

我在本书的第一稿里（1969 年）仍然写道：

那么，这些生产方式、由它们所造成的阶级结构、由它们所导致的不发达政策中的共同因素是什么呢？生产往往集中在主宰经济与社会的单一出口产品。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极大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其他生产资料被同一批人以及/或者有关的其他人所垄断，致使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取得与出口生产工业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而不得不以极低的工资（即使不是赤裸裸的奴隶制）在这种出口生产工业里干活。所有权的这种垄断式集中产生了极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它反过来又阻碍了一个坚实的国内市场的发展。殖民地经济所生产的很大部分经济剩余都被宗主国所占有。如果基本的生产资料、矿山、设备、种植园等等都由宗主国或其他外国人所拥有，情况就尤其如此。他们要么用其收入在国外消费或投资，要么在殖民地发了大财以后回到宗主国或者退休。通过不平等交换，殖民地的宗

主国机制和其他机制对出口产品的商业营运进行垄断性控制，殖民地经济所产生的一大部分剩余也被汇回宗主国，在主要生产资料大部分甚或全部由非本国人或殖民地经济的非居民所拥有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这种殖民地经济结构(后面会提到某些较小的例外)给予殖民地资产阶级(不论是宗主国的或本地的)以下的经济与阶级利益：不发展供本国市场的很大的当地制造业生产，因为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使本国市场的规模没有理由这样发展；把一切适当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用于出口商品的生产，即使以限制农业生产多样化为代价；从国外进口制成品甚至基本食品以支持职工；进口奢侈消费品供他们自身的高级消费或者用于长期出国或国外寓所的消费；把最大限度的可投资盈余或资本(除了汇出国外的以外)用于扩大产生这些盈余的同样的出口品生产机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从国外进口出口工业可能需要的很大部分生产设备；尽量生产其余设备，并从对国内低工资劳工的超额剥削中产生所有的营运资本。总之，扩大单一生产出口经济而牺牲能导致自力经济发展的生产结构。(弗兰克，本书第一稿，1969)

一些北美经济史学者中也有类似的解释，它对比了南部的不发达和北方的发展。尤金·吉诺维斯在《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这样写道：

南部发现自身处在今天许多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类似困境。一方面，它为外部的工业提供市场。另一方面，那个市场太小，不足以支撑有足够规模的工业来与外人相竞争，他们能吸收更广大的市场。……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农村 124

大多数人的贫困，他们由奴隶、谋求生计的农民和白人贫民所组成。……奴隶制导致了土地与财富的迅速集中并阻碍南部本地市场的扩大。……经济上被少数几个大地主所统治的南部农村不能提供工业发展的基础，只能对工业提供一个有限的市场。……现在让我们集中于另一个因素，它本身提供了充分的解释，说明南部无法使落后的本地工、农业商品市场工业化。(165,162,24,158)

美国北方的发展往往被归因于据说在发展之初就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内部市场。道格拉斯·诺思在他的重要研究著作《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中写道：

美国内战以前制造业发展的时机、速度与特点是由以下因素导致的：(1)最为重要的影响是国内市场规模的增长。……纺织品、衣着、靴鞋以及其他消费品的市场都是全国范围的，反映出自给自足的没落和专业化与分工的增长。由此派生出对机器和铁产品的需求扩大，以响应消费品工业……(2)制造业之集中于东北部，是由于若干因素造成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因是1815年以前的发展，特别是在法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当时已打了基础。大城市中心的增长，资本市场的发展——起先围绕着对外贸易，后来则为了棉花贸易，还有对运输设施的社会经常性投资，以及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供应——先从农业，然后从移民。……新英格兰纺织工业的发展是由于资本从航运业转移到纺织业而实现的。……爱尔兰人(移民)一文不名，他们形成了东北部不熟练劳工的储存库。……(166—170)

125

在南部，情况完全不同。诺思指出："东北部和南部的扩张相互形成突出的对比。……棉花栽培很快扩大到整个[南部]……关于棉花的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南部的收入直接外流了，其形式为：(1)经营这项贸易的服务和运输；(2)进口粮食以养育奴隶和种植园主；(3) 进口制成品。……南部既不提供销售其出口品的服务，又不提供消费和服务以供应其自身的需求，而且进口倾向很高。"(52,57)

诺思还在其他地方(128—130)继续说：

> 南部经济结构的突出特点是：(1)具有为着少数几种主产品(区外)市场的集中生产，最最重要的是棉花。(2)大规模的……棉花、甘蔗与大米的种植园系统。……提供最低单位成本的大量劳动力与土地。(3)为种植园系统供应劳动力的当然是奴隶。……(4)[西南部]有土地供大量扩展棉花种植，优质土地激增，清楚地反映出西部土地棉花生产利润率增大的影响力。棉花价格在这方面是最有决定性的因素。……(5)棉花价格的上涨加速了种植园主及其奴隶向西南部新土地再次迁移。……(6)南部白人中拥有奴隶及从事南部主产品生产的只是少数。……白人人口中很大比例只有很少的现金收入。……(7)该地区的特点是明显地缺乏城市化，除了只发展起几个港口以进行棉花贸易。……(8)毫不奇怪，南部以本地为取向的工业和服务业，按人均计算，明显少于其他地区。……(10)南部的人力资本投资明显地低于其他两个地区。……文盲……

在有关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发展差异的问题上，也有人试图同样通过强调财产分配与收入决定以及解释一个内部市场的兴 126

衰，来加以说明。

> 这些差异的原因来自有关国家经济结构的基本因素。……澳大利亚的经济从来没有像1900年以后的阿根廷那样完全维系于出口贸易上，更大的重点放在促进工业产出。尽管有长时期的投资，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到本世纪之交，英国从澳大利亚的进口比它从阿根廷的进口增加得慢。1900年以后，这种差别变得极为明显：到1913年，阿根廷的出口增加达澳大利亚的两倍。（索尔，84—85）

澳大利亚的资源基础（更不用说加拿大了）比阿根廷的更为多样化。这使得后者不得不以外汇进口煤，而前者则可以善为利用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小麦繁荣中得到收益（盖勒，18，21）。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澳大利亚的收入水平就比阿根廷更高（盖勒，18），而且分配更为平等（索尔，81，盖勒）。索尔说：

> 可能给澳大利亚的贷款较少被直接用于购买国外货品，其结果是次要的投资（联系）效应比在阿根廷更大。也可能辩称，进口构成的变化取决于人民群众由于实际收入增加而从外国投资中到底得到了多大好处。阿根廷的收入分配失当肯定导致奢侈品进口的急剧上升。……澳大利亚收入分配的扩大却导致了较不新奇的进口品上升。（81）

这些差异的原因或许还没有完全澄清。一个原因肯定是土地所有权或占有权分配的差异。阿根廷由于过去殖民地的地位而出现较高程度的先前的土地垄断化以及政治权力垄断化，在澳大利亚却并非如此，这肯定导致收入分配与国内市场结构方

面的差异，这是盖勒(8)等人所观察到的。这也导致移民政策与 127
格局的重大差距。结果，在阿根廷，移民更多地集中于城市，或许刺激了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部门比在澳大利亚有更早、更大的发展。进而还有不同的移民政策和土地拓殖政策：阿根廷比澳大利亚更赞成大型的土地占有者，而在澳大利亚却更多地容许并实行土地占耕，即便并不总是家庭规模的土地所有权。还有一个因素（由我以前的学生戴维·西摩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强调并引起我的注意）加强了这种不同的倾向：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澳大利亚发现黄金并生产黄金，引起了一股移民潮，这有助于形成一支有足够自身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劳动力和劳工运动，迫使澳大利亚政府采取关税与其他政策来保护他们较高的工资水平并且——同时地，虽然可能并不太有意地——保护其国内市场。这一政治行动的结果及时地保护了澳大利亚的国内市场，使它把从1880年以后世界性小麦繁荣中得到的外汇收入纳入了比在阿根廷更具生产性的用途。而且，澳大利亚可以用黄金来支付一部分进口，从而使其他资源用于国内的生产性投资。（金、银生产对美国的发展也有类似好处，它用黄金作为外汇来支付欠英国的债务——这转而送去印度。十八世纪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地区的黄金生产也刺激了若干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后来又通过皇家命令和英国的竞争而被摧毁——至少这部分地由于金砂矿与深井银矿相比有更大的收入分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为什么金矿生产在这些特定时间和地点而不是在其他时间和地点促进了而不是阻碍了其他生产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恰值它们各自历史的这一紧要阶段，阿根廷却经历了相反的政治发展：省一级的“发展主义”力量在1860年遭受重大挫败，当时“欧洲人”党接管了米特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而后一种力量在1880年被完全击败，当时罗加和佩莱格里 128

尼政府在阿根廷全国肯定地确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目光向外和促进出口的领导权。

到现在，我们关于国内市场发展的讨论，一直通过沃特金斯所谓的最终需求联系，来考虑刺激工业发展的问题。

在这一讨论中，国内市场的存在基本上被视为独立地决定于发展本身，虽然有些作者（包括目前这位）也曾努力把国内市场的存在与否追溯到生产方式、国际交换关系和国际分工。事实上，这种国内市场的事先存在，不但就前文讨论过的一些实例而言，而且（如第四章）就像英国这样的宗主国经济实例而言，都是有问题的。

这种理论被马克思和列宁基于以下讨论的理论根据加以严厉的质疑。但是，不论国内市场的局限何在，以及有关国内市场自主存在或发展的最终消费需求理论的局限何在，若把相同的分析推广开来，打算通过保护新兴工业、进口替代或最新的出口替代来导致市场形成，这些局限就会显得更甚。

(9)关于新兴工业和进口替代

新兴工业的论点是和工业资本主义以及甚至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具有同样悠久的年代：许多重商主义政策意在保护并发展新兴工业，这种政策和分析在十九世纪经济与政治环境允许的地方被发现可以再度应用。但是在历史证据面前，要支持这种论点，认为这种新兴工业发展刺激了或者甚至伴随着财产收入分配更大的平等或均等化，那是困难的——例如上面讨论的"自主"国内市场发展的例子，或者如1950年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主张者所明白推荐的，如普雷维什向拉美经委会所提议的以及许多其他人所提议的（见下文）。相反，财产与收入分配却变得更加不平等了。

而且，虽不否认所导致的新兴工业发展或进口替代可能具 129 有边际重要性，任何这种发展政策或分析总是肯定会在实质上受到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自工业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发展了国际分工和生产方式转变以来。第四章曾提出英国、新英格兰、德国和日本能在不同情况下成功地推进新兴工业的发展，是因为在每一实例中客观条件均已成熟，而不是简单地因为它们的人民更具事业心、有意志力或聪明些。同样地，庞巴尔的葡萄牙、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以及洛佩斯的巴拉圭搞的“俾斯麦式的”工业发展政策则是不成功的(上文及第四章讨论过)，因为世界资本积累过程、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分工、更不用说军事力量在当时当地不容许这种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若没有这种发展努力——它当时被英国所谴责，今天仍不被帝国主义正统派所接受——这些国家在世界历史上必定会日子好过些。)

在过去20年中，进口替代——在过去几年中还有出口替代——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发言人欢呼为几乎是不发达问题的万应灵丹。在国内市场上以本国生产工业品来真实地或想象地替代进口品，成为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和它的大多数会员国政府的官方战略，虽然在实践上，这种政策更早地始于和实行于印度。通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不发达会员国政府最近设法进一步推进它们的“工业化”，出口制成品到工业国去，并要求工业国给予免税进关。

作为一项发展政策，进口替代已经失败；作为一项发展进程的分析，它对主要因素(帝国主义和阶级结构)不加考虑。甚至拉美经委会已通过它的一名职员马里亚·德康塞桑·塔瓦雷斯在 130 拉美经委会的《拉丁美洲经济公报》上发表重要文章，被迫承认进口替代的“没落”。很清楚，进口替代并不是进步工业家与政府的开明政策，而是资产阶级(包括以前依赖原料出口的那部分

资产阶级)对于在大战期间和国际资本主义大萧条危机期间不能继续生产、投资和赚取利润的反应。

近些年来,同一批资产阶级已成为多国垄断势力在新兴国际分工中的热情小伙伴,这些多国垄断势力正像老的征服者、海盗和种植园主那样在全世界宣扬这种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的发展要求不发达国家以一种进口替代另一种进口,和宗主国经济以生产品与技术出口取代消费品出口相一致。因此,现在一些外围国家在本国生产某些工业品,首先供应国内市场,然后供出口到邻近市场,最后供出口到宗主国,因宗主国生产这些产品已不再有利可图。可以预测,目前宗主国增加对于来自亚洲的纺织品和有关进口品的抵制只是一种暂时的周期性措施。这种进程远远不是减少不发达国家对宗主国的依附,而只会加强依附,并不能解决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之国内市场发展这一中心问题。

(10)关于分工与技术差距

不发达国家中国内市场发展与进口替代的问题,由于技术的发展及投资成本增大即所谓的"技术差距",变得更为复杂,而且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无法解决。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前,制造业与农业技术在欧洲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并不是大大不同的。在许多方面,印度和中国长期以来在技术上比欧洲更先进。工业革命把这一切全改变了(第四章对此有讨论)。工业与运输技术领域的革命(或者有些作者所称的演变)使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发生了革命。它破坏了全世界传统的制造业和手工业,并以本国或外国的工业加以取代。在现在的发达国家里,传统制造业被本国工业所取代。(在一些新近垦殖的地区,根本没有旧工业,就发展了新工业。)在现在的不发达

131

国家里，传统制造业及其与其他经济部门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也被破坏了；但它不是像欧洲那样被本国的工业发展所取代，而是被同一个欧洲工业（特别是英国工业）所取代或替代。这个工业通过工业革命在技术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所产生的成本与价格降低，通过运输成本的急剧下降而消灭了天然保护，通过实施或接受"自由贸易"以符合出口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从而获得了国外消费者（见上文及第四章）。

工业革命首先典型地开始于消费品工业，尤其是纺织与食品加工，然后通过金属机械工业而扩展到资本货（霍夫曼）。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棉纺业，接着是冶金工业及供运输与纺织生产的机器制造业。在十九世纪中，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开始步其后尘，而世界的其他大部分地方转向自由贸易，实行食品与原料生产专业化来供应欧洲的工业与工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个阶段从事工业化的国家或工业中心，即使它们落后于英国，也都大力依靠本国来生产如纺织机械这样的必要生产手段。那就是说，它们以英国为榜样但用本国的技术来制造它们的机器（霍夫曼，42—57；拜罗奇，第八章第 B_3 节；欣克勒默特 90，91）。另一方面，索尔（141—144）则强调英国出口纺织机器及其他机器到其他欧洲国家去，可是它们并未依赖这种进口而排除本国的制造业。在霍夫曼研究的所有经济社会中，从消费品生产转变到资本货生产确实在这些后起国家中显得越来越快——以至到十九世纪末英国已失去它的领头地位（霍夫曼，第七章）。

132 自从二十世纪之交——在霍夫曼所谓的工业化第四时期中，或者自从 1896 年以后的周期性上升以来——技术与工业革命以及国际分工似乎已经历了进一步的急剧质变。从那时以来，随着英国已失去其先导而让位给新的主导的、强有力的其他

工业，资本生产品已不再由传统制造技术或方法来生产而是由工业本身来生产——机器制造机器。消费品工业和其他工业从那时以来已在若干其他国家中确立（或者如印度那样重新确立）。但它们大部分在技术上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靠进口生产品，而不是在本国生产，以支撑它们的“进口替代”消费品生产。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只有一个国家——日本避免了这一命运。特殊的环境使日本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虽然它的消费品和生产品与世界市场相比质次价贵，但长时间后终于能启动其自身的生产品工业并发展一些技术上先进和经济上有竞争力的工业。苏联后来也有类似进展。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进口替代或其他措施都未能消灭不发达，除了在一些移民地区。

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宗主国内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使得像印度、巴西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中的供本国市场的工业增长变得有利可图，它们开始依赖于更多地利用已经装备的过剩工业能力。这些国家，以及更晚近的其他国家如墨西哥和埃及，已经进展到为本国市场生产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在某些国家，诸如巴西和南非，在不同情况下，它们的工业增长现在甚至已经面向外国市场，包括宗主国市场。但是这种没有经济发展的工业增长实质上只是新近出现的国际分工的一部分，在这种分工中，最强有力的、研究密集型的工业如电子电脑和石油化工都集中于美国。其他不那么强有力的工业则在西欧和日本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和一些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则更多接手生产不再居于主导地位的或利润优厚的资本货和某些消费品。（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从资本主义工业国进口先进技术，而出口消费品和低技术的生产品到不发达国家去，后者则转而出口轻消费品到资本主义工业国去。）但是许多不发达国家继续在原料方面搞专业化（有时甚至搞得更多），这些原料对帝

国主义宗主国的工业发展越来越重要。(关于这种新兴分工的证据,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与,请参阅例如《远东经济评论》1971—1972 各期,以及阿明[108]和帕卢瓦[Ⅱ,174—176 以及Ⅰ,111—115]更加假设性的讨论。在马里尼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对这种国际分工中的次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

因此,供国内市场的工业生产,即使是一些资本货生产,也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保证,除了在工业方面已经先进的一些经济社会,在资本主义分工下,不增加对他国生产的生产品和技术的依附,这种生产发展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些不发达国家以本地生产的生产品来生产消费品,这种生产品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先阶段属于技术上先进的。可是现在,这些国家却不得不进口许多额外的生产品和技术(或者体现后者的"原料"和半制成品),这些东西现在对本地生产其他消费品和生产品很重要。由本地生产这些技术上先进的生产品或进行投入(且不说本国生产基础技术研究)对于这些不发达国家则已昂贵得不敢问津;只要对其他部门的投资更大为有利可图,那么这在世界和本国资本主义框架内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要求更密切地调研帝国主义时代不发达国家之内、外市场的阶级结构与部门结构。

三、关于生产与积累

134

(11)关于经济部门与阶级

介绍这个问题,可以指出亚当·斯密与马克思或列宁之间的断裂。我们可以回忆,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分工是由市场范围所限定的"。而另一方面,马克思把他的《资本论》第一卷

定名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在马克思以后,列宁把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副标题称为"大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列宁在理论论述的第一章里写道:

> 形成国内市场(即发展商品生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本身造成的,资本主义加深了社会分工,把直接生产者分为资本家和工人。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范围问题(像民粹派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马克思的实践论对我们所关心的国内市场问题做出的主要结论如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的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的消费。……[列宁在最后一章中继续说]在第一章里我们指出错误的理论章节把资本主义的国外市场问题同产品的实现问题联系起来。资本主义对国外市场的需要,决不是由于国内市场不可能实现产品,而是由于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正如在前资本主义政权下的事例中)资本主义无法在以前规模上继续重复同样的生产过程,而且它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的无限增长,冲破了早先经济单位旧有的狭窄范围。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发展不平衡性,生产的一个部分超过了其他部分,并努力超越旧有经济关系的界限。(《列宁选集》)第一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第176,190等页。这个问题曾被帕卢瓦加以分析,并联系到罗莎·卢森堡的理

论,1970年)

在谈论国内市场的时候,列宁(应当记得他也写过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的书)并不否认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着外部市场及其重要性。他只是否认缺乏有效需求(正如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主义者所陈述的)以及实现问题(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设想的)。列宁否认这个(不存在的)问题需要或可以依靠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前即存在的需求或者依靠资本主义"以外"的前资本主义市场来加以解决。

列宁写《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批评民粹派声称的由于缺乏"国内"市场而不能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列宁辩称,国内或国外市场的发展并不取决于或要求前资本主义部门或非资本主义部门的需求。(所以,列宁也会反对我们在上文讨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美国的发展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是它们各自收入分配和前工业国内市场的结果。)如同在他以前的马克思,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国内外市场的发展和进步的本国分工和国际分工有关,和生产品相对于消费品的优势有关,和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发生变化有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得收入与财产分配——尤其是生产资料——不太平等和不再平等),和本国经济及国际经济的相关不平等发展(这使得主导部门出口它们的部分产出)有关。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表现为若干阶段,列宁在后来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研讨了其中的一个阶段。

但是这个过程,以及特别是生产品的生产,在现在的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并不是均等地发生的。为什么不是呢?为了扭转感觉到的利润下降,为了避开担心的"停顿状态",我们可以记得,李嘉图设法扩大英国制成品交换海外食品。(我们不谈停

136

顿状态是否真的造成了威胁、利润率是否必然下降、实现问题是否存在这些理论问题。这里我们只讨论真正发生了什么而不管在理论上它是否发生。)李嘉图设法降低英国工资、增加剩余价值率、减少可变资本以维持利润率。李嘉图的政策允许英国有较高的利润率而并无对劳工剥削的伴随增加——后来又有所减少,其办法是提高英国和海外的农业生产率并增加对海外农业工人的剥削率。

马克思观察到,英国的贸易政策与实践通过降低以进口原料制造的生产品成本而支持了利润率,抵销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由于有形资本/劳工比的增加),降低了资本值(有些资本成分是以低价进口的)。这些原料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对劳工的剥削而在海外生产的。英国的制成品出口,先是消费品,然后还有生产品,乃是促成这种过程的联系或交换,不管这些出口是否为通过外部需求的"实现"所必需,而有别于殖民地参与宗主国的生产进程。

宗主国及新的移民国中供国内市场的生产品的有利发展并非特别基于外部需求,更不是基于由维持生计的生产转为市场生产所产生的任何需求。但是这种发展确实需要对劳工进行超额剥削,特别在生产关系被强制转变的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并需要通过不平等交换把这些价值转移到宗主国。(第六章讨论了转变,第七章讨论了交换。)因此,殖民地超额剥削及劳动生产率的增加以及把由此产生的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换转移到宗主国,对宗主国制成品的内外市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对解决"实现问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所以,现在的不发达国家对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提供了许多"抵消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四章谈到了这一点。不发达国家通过提供低廉工资而对宗主国有利可图地生产一切制成品作出了贡献,通过提供廉价原

137

料而对宗主国的生产品生产作出了贡献。这种宗主国生产是通过宗主国与外围国家的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生产性消费”）而实现的，除了宗主国工业生产与能力及殖民地原料生产与能力的过度扩张带来了周期性危机，外围国家对此也起了局部减震器的作用。

在外围国家，供出口的原料生产供养着人口的一小部分，并通过国家的媒介，有时也供养着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若干部分，他们把收入花费于进口消费品和奢侈品。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口则以他们的低收入所许可购买的能力消费少量当地产品，或者在生存水平线以下消费不足。由于殖民地生产的市场位于海外，它们的购买力对于实现殖民地生产就并非必需。从国际和国家整个资本的观点来看，它们的工资并不代表要增加的购买力，而是代表要降低的劳动成本。情况确是如此。

这种形势的要素在二十世纪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中依然如此。当非洲的一些区域重新进入国际分工时，同样的关系也开始在那里流行（见第六章）。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进口替代一开始似乎使工资也具有作为国内需求的重要性。但结果表明这种改变只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我们在上面看到，进口替代是在帝国主义经济危机时启动的，这种危机阻碍了以低工资劳动生产的原料去交换供应高收入市场的制成品。这种困境使一些国家生产消费品来供应本地的高收入市场而不是进口这些产品。那就是说，进口替代开始时是为了一个已经存在的“国内”市场，而俄国的民粹派认为这类市场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对手列宁则认为这类市场是不必要的。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产生自己的国内市场。但是这种进口替代的发展并不产生自己的国内市场。至多，进口替代产生一个外国生产品与外国投资的“国内”市场。这种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导致工资的上

138

升——如同在宗主国和新移民国那样扩大了国内市场购买力——而只是极小地、暂时地提高了工资，然后又开始压低工资。当国际收支危机阻碍了国内工业运行所必需的外国资本设备的进口，这些依附性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就发动了又一场增加出口的运动——首先是由不断受到超额剥削的农业工人和矿业工人所生产的原料，然后还有受到超额剥削的工业工人所生产的制成品。这种外围生产得以从中实现的市场再次证明是位于海外的宗主国，而外围国家的工资（现在不仅是初级产品生产的工资，而且是工业生产的工资）也再次证明并不是要增加的购买力来源，而是必须降低的一个成本因素；情况正是这样，如有必要就通过压制手段。本国对"国内"市场的实现仍然通过上层与上中层阶级的最终消费需求以及通过生产性消费。但这两者都依次最终取决于对外部门的收益以及越来越取决于通过国家协调的分配。因此，"国内"市场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或不发达）越来越取决于原料生产与出口，最近也取决于工业产品的生产与出口，此种生产依赖于对雇佣工人的超额剥削，后者来自贫困工人的日益增加的工业后备军，他们远不能对国内市场构成有效需求的来源，而是通过工资成本的降低而成为有利可图的生产、实现和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关于进一步分析，请参阅马里尼。）

在帝国主义宗主国——或者在整个帝国主义体系——与"现代化"条件下的这种不发达的继续发展相对应的，是国际分工与资本积累的继续发展。技术的最新发展和某些工业（包括宗主国的农业工业及某些原料的合成代用品或者低品位矿石的经济加工）中跨国公司的最新发展，对不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资本积累过程中指派了变化的任务，虽然地位并不太变化。（对这些发展，我已在1977年出版的西班牙文论文集《对经济危机

139

的回顾》一书中作了讨论，并且是撰写中的《当代世界危机》一书中进一步分析的题目。）今天同过去一样，在事实上以及在理论（或分析）上，国际分工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内、外市场的扩大没有、也不能以抽象的、非历史的比较利益条件或其他方式来加以解决。它们也没有受制于超越客观物质和政治现实的唯意志论。这并不是要咨询宿命论，而是要寻求自由，要承认现在和过去，历史仍然是决定因素，正如马克思和列宁所观察到的，自由就是在可能的条件内获得必要的成果。

140

第六章

帝国主义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生产方式的转变，1870—1930

我们对世界资本积累三个阶段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发展的分析，试图有助于澄清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使资本从殖民地国家流向宗主国的交换关系与机制，跟殖民地国家生产方式的转变（这允许了这种资本流失，但与此同时发展了它们自身的结构性不发达）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这一过程，不光要提供答案，往往也必须提出问题。

在下面讨论世界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中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生产方式的转变时，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世界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第三阶段期间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不发达的发展，只是少量历史（或当代）研讨的对象，而且罕有（1970年以前）理论分析。宗主国的经济学家已经忘记了亚当·斯密关于殖民地苦难的观察与警告，而且几乎一致采取一种"白人的负担"的态度，认为增加接触、加强整合、资本和技术和体制的扩散等等，只会导致这些地区的发

141 展（关于批判意见，请参阅阿吉拉尔与科茨沃思）。"专门"研究海外"土著人"的人类学家们则认为，他们所研究的社会，在被他们发现时一直是"传统地"静止不变的：例如，阅读拉德克利夫—布朗及其追随者对非洲的研究时，人们决不会怀疑他的本国同胞塞西尔·罗兹和洛德·卢格德是否真有其人或者帝国主义是否

存在过。（关于批判意见，请参阅高夫《人类学：帝国主义的产物》以及弗兰克1968年著作。）殖民地与新殖民地国家中的许多知识分子自己在文化上受到宗主国的殖民化和洗脑，以致只以宗主国的形象来研究他们自己的社会——文明或野蛮：这是萨米恩托谈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阿根廷时的用语。（只是在最近10年间，非洲人才开始[重]写自己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做得稍好一点。马克思本人生前没有见到世界资本积累第三阶段中殖民地世界的转变。列宁对此事给与重视，但主要只联系到与当前政治战略有关的问题。从那时起直到最近，苏联的学者们也集中注意与当前有关的问题，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因此，只是到了最近（当1970年写作此书时，往往是在尚未发表的著作中），研究不发达国家的学者，以及常常是阿明这样来自不发达国家的学者，才开始对上个世纪不发达世界的生产方式转变问题进行实际的研究与理论分析。这种情况只有一个突出的例外：罗莎·卢森堡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对这个问题加以很大关注并试图进行理论综合。（她这样做，是因为她关注剩余价值实现，以及宗主国资本主义继续发展这一理论问题，她在这方面的理论论点被列宁以来的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斥为没有根据，但这并不能贬低她关于殖民地转变的结论分析的重要性和有用性，因为在随后的50年中并没有更好的分析。）

一、罗莎·卢森堡论帝国主义对自然经济与农民经济的斗争

142

所以，我们可以概观一下卢森堡在二十世纪初所作的关于中东、北非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黑非洲在十九世纪的不发达的发展的理论综合：

资本在它对自然经济社会的斗争中，详细说来，追求以下的目的：(1)立即取得对重要生产力资源的所有权，诸如土地、原始森林中的猎物、矿产、宝石与矿石、珍稀植物产物如橡胶，等。(2)“解放”劳动力并强制其进行劳务。(3)引进商品经济。(4)把贸易与农业分开。……由于土著人的原始联系是他们的社会组织与生存的物质基础的最强保护，资本必须一开始就计划系统地摧毁和消灭阻碍其发展的一切非资本主义社会单位。……每一次新殖民地的扩张必然伴随着资本对土著人社会与经济联系的无情斗争，他们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受到暴力掠夺。

任何希望把资本积累专门限制于诸如资本主义生产国之间的那种和平竞争、即正常的商品交换，均有赖于虔诚地相信资本积累无需借助于生产力，无需更原始组织的需求，它可以依赖一个解体经济的缓慢内部过程。……暴力是资本掌握的唯一解决办法；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资本积累使用暴力作为永久的武器，不但在它诞生的时候，而且一直到今天。从涉及的原始社会的观点看来，这是个生死问题；对它们来说，除了竭尽全力拼死反对和斗争到底，不可能有其他态度。因此，当殖民地被军队永久占领时，土著人起义和讨伐就成为殖民政权的议事日程。……尽管法国国内政治兴衰起伏，法国殖民政策中有计划地、蓄意地摧毁和破坏公社所有的内容却保留了50年之久。这为了两大明显的目的：打破公社所有权首先是要破坏阿拉伯家族联系的社会力量并镇压他们反对法国奴役的顽强抵抗。……其次，必须破坏公社所有权以便取得被征服国家的经济资产；那就是说，阿拉伯人拥有了几千年的土地必须被剥夺，以便使法

国资本家得到它。……这就是1864年4月22日参议院法令的双重意义。阿拉尔将军在参议院宣告：‘政府并没有无视这个事实：它的政策的总目标是要削弱部落首长的影响和解除家族联系。通过这一手段，就将扫除政府法案反对者所捍卫的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原文如此]。……加速解除家族联系的最可靠办法就是使私人所有制体制化并使欧洲移民移居到阿拉伯家族中间去。’……取得生产资料和提高剩余价值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一俟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丧失了独立或者处在这种分崩离析过程中时，就应引进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在原先自然经济盛行的地区，引进运输手段——铁路、航运、运河——对于扩大商品经济至为重要。……在反对自然经济运动的最后重要阶段是把工业与农业分开，把乡村工业完全从农民经济中根除。……资本必须使农民购买其商品，因此一开始就把农民经济限制在单一领域——即农业领域。……

从一切外貌来看，这一进程是相当和平的。……可是实际上，把农业与工业分开的过程决定于以下的因素，诸如：压迫性的税收，战争，或者滥用和独占本国的土地，因此，这属于政权与刑法的领域，而不仅是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积累的帝国主义阶段意味着……对外放贷、铁路建设、革命以及战争。……目前，内地与落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自主是在战争与革命中间取得的。资本主义解放进程的 144 一个要素是革命。落后的社会必须扬弃它们过时的政治组织以及自然经济与简单商品经济的遗留物，建立一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现代国家机器。土耳其、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属于这一类。……资本的前锋大体反映在铁路网的发展上。……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之间，铁

路建设以及供给它的必要贷款主要地起了排除自然经济和扩大商品经济的作用——例如六十年代对俄国铁路的贷款，或者以欧洲资本建设起来的美国铁路。另一方面，最近20年中非洲和亚洲的铁路建设几乎完全服务于帝国主义政策对落后社会进行经济垄断和经济奴役的目的。……外国贷款……仍然是老资本主义国家对年轻资本主义国家维持其影响，行使金融控制，在海关、外交与商业政策方面施加压力的最可靠的联系。……首先，每一笔贷款中都有高利贷的成分，大约在公开借出钱数的1/5到1/3之间，都掌握在欧洲银行家之手。最终，高额的利息必须设法支付，但怎么付？——办法从哪里来？埃及要自己支付；他们的来源是埃及的农民经济，归根到底要提供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最重要成分。他提供土地。……作为强迫劳工，他验证了劳动力，而且他是无偿地受剥削的，甚至必须在工作时提供自己的生计工具。……但它不仅供应土地与劳动力，农民经济还提供金钱。在资本主义经济影响下，赋税对农民加紧了钳制。……大欧洲资本的债越多，就必须从农民身上榨取得越多。……

现在应很清楚，欧洲借贷资本与欧洲工业资本之间的交易基于一些对资本积累极为合理和'健全'的关系，虽然对偶然的观察者来说这显得很荒谬。……剔除了一切含糊的关联以后，这些关系包含一个简单的事实：欧洲资本已大部侵吞了埃及的农民经济。大片土地、劳力、和无数的劳动产品被国家以赋税积聚起来，最终转入欧洲资本并积累起来。……一方面是资本的惊人增加，另一方面的经济结果则是农民经济的垮台，伴随着商品交换的增长，这植根于竭力使用该国的生产力。……因此，小亚西亚、叙利亚和美索

145

不达米亚的农民与德国资本之间的经济新陈代谢是以以下方式进行的：在科尼亚、巴格达、巴兹拉等地，粮食是作为原始农民经济的简单使用产品出现的。它对什一税农民立即成为一种国家赋税。只是到了那时，它在国家手里才成为一种商品，成为国家收入的钱财。这种钱财不过是变化了的农民粮食；它甚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现在，作为一种国家保证品，它可用于支付铁路建设与运行，那就是说，既实现其生产资料的价值，又实现在建设和运行铁路时对亚细亚农民与无产者榨取的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更多使用了德国生产的生产资料，所以，转换成金钱的亚洲农民的粮食也用来把榨取德国工人的剩余价值变成现金。……这就是欧洲资本与亚细亚农民经济之间粗略而简明的新陈代谢，土耳其国家起到了为资本主义目的而剥削农民经济的一种政治机器的真正作用——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中所有东方国家的真正功能。（卢森堡，369—371，380—382，386，395—396，419—421，434—438，444—445）

虽然卢森堡主要根据中东的经验来撰写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并从中提炼她的分析，她也发现了我们已经在十六世纪以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见到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地资本主义之不发达的发展的一些同样的基本进程，诸如：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它的殖民结构；殖民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根据它们与宗主国的殖民地关系以及根据宗主国的发展利益而发生转变和作出决定；阶级结构与社会组织发生自愿与不自愿的转变，以适应于若干体制形式，并作为殖民地关系及新的生产必要性的代理机构而活动，摧毁那些不适应

146

的体制或者成为当地民众抵制这一进程的力量源泉的体制——首先是公社所有权及其社会——文化表现与支持；吸收——或者必要时创造——一个本地阶级及其从属代理机构，其经济与政治利益拴在宗主国方面，它根据自身利益所追求的经济与政治政策也有利于宗主国的利益，虽然会对它的国家与人民产生不发达的发展。

我们将根据这些"卢森堡式"的条件来依次观察十九世纪期间亚洲、中东与北非、黑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不发达的发展，在那里，"自由贸易"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根据宗主国的发展利益再次改变了生产方式。

二、帝国主义在亚洲

亚洲今日不发达的程度实质上相当于它在十九世纪的殖民地化的程度。今天，最不发达的——最悲惨的——人民在印度和东南亚大部，那里过去遭受了最野蛮的资本主义殖民地剥削。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国家，受苦较少而且有所不同；当然，自从1949年中国挣脱资本主义而解放以来，它真正取得了无可比拟的进步。亚洲的另一个主要地区日本从1868年以来设法取得了很大的工业发展；而且，这一发展之所以可能，必须归因于日本具有独立的非殖民地地位，以及它在发展中没有外国投资。

147 最严重的不发达的发展的实例无疑是印度。因为我们已经在上文第四章第五节研讨了印度的经历，因为世界资本积累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也许在印度要大于(或者第三阶段开始早于)其他殖民地及新殖民地国家，我们可以在这里把我们对印度经历的进一步研讨只限于几个方面的观察。但或许值得强调一下，在上文第四章里对印度经历的概述以及在下文马上

要观察的情况,同罗莎·卢森堡首先对中东经历的分析中所综合的生产方式的转变要素,显得惊人的接近。

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英国在印度的所有政策均千方百计地加强不发达的发展。英国用来抽取印度资本的主要手段中的两个就是铁路和债务。铁路不光是跟着筑路权用来重组经济以便抽出原料和抽进制成品的物质手段。印度人还必须为在他们的土地上铺设这种剥削机器而支付费用。而通过“印度债务”,英国的印度殖民地政府收取形形色色可以想像的和无法想像的费用,这在印度的特定环境下成为宗主国向殖民地榨取经济剩余的主要财政手段之一——在功能上相当于其他地方的大量其他手段。

经济结构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的阶级性质和政治性质不是由别人,而是由一位权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察者贾瓦哈尔拉尔·尼赫鲁在他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指出的:

> 早已根深蒂固的英国统治技巧,现在[1857年以后]被澄清了,确认了,并且大肆进行了。实质上就是:制造和保护与英国统治相联系的既得利益;对不同成分实行纵横捭阖的政策,在它们中间鼓励分裂倾向与分歧。王公和大地主正是这样产生和鼓励的基本既得利益。但是现在一个与英国统治联结得更紧的新阶级的重要性日益增大。这包括印度的公务员,通常是下级公务员。……如此受雇的印度人依附于英国行政当局与统治,所以可以依靠他们并当作英国统治的代理人。……因此开始了下级行政机器的印度化进程,然而,一切真正的权力和倡议仍然集中在英国人之手。……把印度各邦的重要性提到空前高度,鼓励反动分子并寻求他们的支持,煽动分歧和鼓动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

148

> 团的斗争,鼓动宗教分子的分裂倾向,组织怕变革而失势的卖国贼阶级。这一切都是外国帝国主义奉行的自然而可以了解的政策,对此感到惊奇未免是太天真了,从印度民族主义观点来看是有害的,虽然它……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其后的发展,就必须记住事实就是这样。……[英国势力同印度反动派——包括我们还可以加上的甘地和尼赫鲁本人的政治发展与行为,虽然他们似乎很"民族主义",可是也并非不代表这些"反动分子"——的这种天然联盟]……我们今天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是在英国人统治期间生成的,而且是英国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王公,少数民族问题,各种外国的和印度的既得利益,工业缺乏、农业荒废,社会服务的极端落后,以及首先是人民悲惨的贫困。……一个突出的事实是:印度受英国统治最长的地区在今天是最贫困的。的确可以画出一个图表,说明英国统治长度与贫困日益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无可怀疑,印度最贫困的地区是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以及马德拉斯辖区的一些部分;群众水平与生活水准最高的是旁遮普。(尼赫鲁,240—244,221,208)

因此,印度不发达的发展的最经典的实例历史,说明了我们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也碰到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发展中的所149 有重大的结构性因素:出口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极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经济剩余流向宗主国,全国与地方经济和阶级结构转变为符合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宗主国发展需要的职能,宗主国殖民势力与本地反动利益之间的天然联盟及其不发达政策,资本主义殖民地化的长度与强度同极度不发达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在新世界对此作了地区的观察,在印度对此作了国内的观

察，对亚洲的进一步调研也将在国际上表明这些情况。

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也是这样，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体系，由于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而被摧毁，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同中国的传统贸易关系中断了，代之以同欧洲宗主国的资本主义贸易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东南亚也被迫进行其原料与欧洲制成品的不平等交换。在东南亚的某些部分，特别是马来半岛和爪哇，强制发展供宗主国发展的出口作物取代了供当地或地区消费的食品生产，情况比印度南部更甚。如同在印度以及在拉丁美洲与加勒比，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决定了东南亚一个阶级的成长，这个阶级的利益联系着宗主国的发展和它们自身经济的不发达。布坎南(80)写道：

> 最具灾难性的是，资本主义的影响产生了一个新阶级——殖民地中产阶级；它的功能主要是行政性的和商业性的，它积极与殖民势力在附属国土上的政府与经济剥削相勾结。……它对经济进步没有多大兴趣而主要只是一个寄生集团。

格尔茨总结了东南亚不发达的发展的进程：

> 东印度殖民地的历史以一系列政治——经济手段为标志(东印度公司，文化体系，公司种植园体系)，根据这些手段，二元经济中的欧洲"商业资本主义"方面更有效地组织起来以生产与销售出口作物，而印尼的"农民家庭"方面可以更好地得到保护，来防御大规模商业性农业的破坏性影响。荷兰人受日益增加的资本要求所驱使，从十八世纪冒险资本主义的体制性策划，转到十九世纪国家资本主义的策划，

150

再转到二十世纪官僚资本主义的策划。但是，由于每一种策划或手段都建立在前人废墟之上，需要西方企业更深地渗入乡村经济，实际上更难于使当地生活孤立于这些企业所从事的经济力量之外。……正如赖因斯马很好地辩称的：……“就资本供应而言，母国的私人企业在支持文化体系的继承人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文献中一般提出的作用小得多。”……印尼二元经济中资本密集型的方面并非仅仅由荷兰输入。……而是大约1830年以后殖民地体系生产的一个直接产物。……所以，从发展观点看来，文化体系代表着一种企图，要由农民靠自身力量建起一个产业经济；在这方面它是非常成功的。……农民农业在印度群岛出口经济中成为一种功能性因素，而不仅仅是它的支撑；农民农业至少部分地发展成一种商业营生，而不是一种室外调剂活动。……正是那种荷兰经济中公认为高度自治的部门坐落在印度群岛，有时被称为“热带荷兰”；而自治的印尼经济也紧紧地坐落在那里。虽然，两者不断互相影响并基本形成各自的路子，却主要由于这种相互影响而不断分歧，以致它们之间的结构对比极为巨大。波克(“二元社会理论”之父)所认为的印尼(或“东方”)经济生活中内在的、永久的性质，“一种首要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历史产生的情况：它不是来自于东方灵魂接触西方动力化身精神时的那种不可改变的要素，而是来自于殖民地政策对印尼农业传统格局产生影响时的那种并非命定的形象。……荷兰人与爪哇人之间“经济心理”的差异被波克认为是二元论的原因，而事实上大部分是它的后果。爪哇人不是因为“沉默”而变得贫困，而是因为贫困而变得“沉默”。……

食糖——租借制，以及较小程度上的同其他作物有关

的类似做法，并没有把商业资本主义打破平衡的力量从乡村生活中排除出去；他们把它引进，公司和文化体系沿着这一途径进入腹地。……爪哇的甘蔗工人仍然是农民，同时又成了一名苦力。人们得出如荷兰农学家特加斯特同样的结论："……在1900年左右，人均年消费量大约是：110公斤大米、30公斤薯类和3公斤的豆子。到1940年左右，改变成85公斤大米、40公斤小米、180公斤薯类，以及大约10公斤豆子。这种改变在当地往往严重地降低了饮食质量。……事实上，看来在1900至1940年之间很可能卡路里摄入量真正下降了。……1830年以后爪哇殖民地历史上真正的悲剧不是农民的受苦。……悲剧在于它没有受苦。……但是这种发展之成为悲剧而不仅仅是颓废，在于1830年前后爪哇经济（因此也是印尼经济）本可以比今天更加安稳地向现代化过渡，虽说绝不是无痛苦的经历。"

弗尼瓦尔讲得对，"真正衡量范登博什之伟大的就是荷兰的复兴。"可是，真正衡量范登博什之恶毒的则是使印尼愚蠢。（格尔茨 50，65—66，60—62，89，96，143，82，69）

印尼本可以在一个半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前比在那以后更加容易地走向发展，还有什么可以更清楚地标志不发达的发展呢？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在所谓的二元经济内留下一个所谓的传统部分不加触动，而是因为相反地资本主义渗透进了农村生活的中心。这不但是印尼，而且是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原因。

中国从来没有成为殖民地，也没有像印度和东南亚许多部 152 分所遭受的殖民地化的程度。所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从来没有像在其他地方那么深入渗透进农村生活的中心，他们

真正那样渗透的是在华南，正如陈所分析的，那里最最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然而，资本主义发展并未使中国免遭不发达的发展，宗主大国以及为它们服务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发明了适合于他们需要及中国在世界上特殊环境的新手段：鸦片贸易；通商口岸与法庭；以及条约本身，它们给外国人以特权，但不给中国国民；"最惠国"条款；以及最后就是"门户开放"政策。

巴林顿·穆尔总结称：

> 现在让我们来设法了解，现代世界的来临给农民即这种结构的基础做了些什么。在十九世纪期间，农民的经济状况出现了零星而确实无误的下降迹象：放弃耕作，灌溉系统恶化，农业失业增加。……农民手工业作为农民菲薄资源的重要补充以及在农业周期困难期间使用剩余劳力的一种方法，在廉价的西方纺织品那里遭受严重的打击。……与此同时，靠近海岸城市和沿着大河，当地乡村市场让位于大的城区市场，市场经济的影响日益深入地渗透进农业地区。……随着市场向着更有效率和集中组织的机构发展，农民被拉下了，他们讨价还价的力量削弱了。农民没有储备，仅为糊口而活动，往往在收获后农产品价格下降时不得不立即出售产品。……农民的苦境有利于商人与投机者，他们总是同地主勾结在一起。……当农民负债时，他们不得不借贷，往往利息极高。当他们没法还债时，他们不得不把地契让给地主，自身则多少无限期地留在土地上干活。……根据财产与社会凝聚力之间的联系，讨论中的变化的重要方面或许是在乡村社会阶层的底层出现了一批贫困农民。当地的现代研究说明他们为数约占居民的一半或更多。这个数额比十九世纪增加了多少，现在我们尚无法

知道。……所有这些进程对海边省份影响最大。……（穆尔，218—219）

亚洲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纪或以前不遭受不发达的发展却反而自己进行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主要地区是日本。巴伦总结称：

历史星座中怎么留下了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位置，从而建立一个由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并从一开始就成为日本资本主义有力而坚韧的火车头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特别复杂，同时又特别简单。之所以简单，是因为说到底，事实在于日本是亚洲（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唯一逃脱沦为西欧或美国资本主义殖民地或附属国的国家，是有独立的本国发展变化的国家。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只是由于大量多少独立的因素的恰当汇合而使日本得到其好运气。其中基本的……是日本人民的落后和贫困以及国家自然资源的贫乏。“无论作为外国制成品的市场或者作为西方工业原料的粮仓，日本都贡献不出什么。”结果，日本对西欧资本家和政府的诱惑力远远比不上拉丁美洲的黄金，非洲的植物、动物和矿物，印度群岛惊人的财富，或者据说中国的无穷市场。（巴伦，158—159。关于更详细的实质上同样的论点，请参阅托马斯·史密斯、洛克伍德以及特别是诺曼。）

就这个最基本的情况而言，日本类似于北美和大洋洲，就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它们由于同样的理由而相似地躲开了殖民主义。因此，日本的实例也肯定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显然无情的规律：财富招致了剥削，产生了不发达的发展；而前资本

154

主义的贫困却容纳了经济发展，因为它使得同样的殖民主义剥削不可能施展。日本人隔海看到了现已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如何使中国处于不发达；而日本统治阶级意图避免同样的命运。日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某些国内因素（诸如存在着一个相对强大的封建政权）以外，一方面是由于它的贫穷，这首先使它对世界资本主义没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内部的敌对竞争，这阻止了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日本。值得注意的是，不但日本因此而避免被殖民地化，而且它的本国资本主义阶级也避免了因为外国投资于生产性资源所产生的不发达后果。宗主国的帝国主义发展在亚、非、拉多地扩大并加强了投资，我们将在下文加以观察。

二、帝国主义与阿拉伯世界

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民族在中世纪期间不但取得了高度的文明与发展，而且与中国一起作出了重要的技术与文化贡献，而使西欧有能力取得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但他们却未能幸免作为这一历史进程重要后果的不发达的发展。正如萨克指出的，在英国于1815年战胜拿破仑以后，首先是奥斯曼的工业，然后是它的乡村手工业，都被英国制成品所摧毁。而且，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这种非工业化只是控制农民经济，并使土耳其国家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之需要的第一步。

把一个中东经济社会吸纳进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最最惊人之举发生在埃及，这可以与不发达的发展史上吸纳印度经济社会的经典式事例相提并论。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设法把他的国家结合进这一历史进程，同时保持本国控制并刺激国家发展，包括工业发展。但是他做到的只

是为埃及被吸纳进外国控制下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有效地铺平道路。他的工业化政策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埃及在土耳其工国内缺乏足够的政治自主性，这就使必要的关税保护无法进行。这种情况还使阿里的其他(棉花)发展努力毫无结果——事实上把它变成了一项不发达政策——因为他的主要努力是建立为生产棉花以供出口去欧洲所必需的生产和社会结构。在他的统治下，埃及棉花出口从1823年的大约150万英镑上升到1850年的500万英镑。接着，在阿里的统治之后，当欧洲对埃及的控制变得有效时，棉花出口更快地上升到1880年的2,200万英镑和1913年的6,000万英镑，虽然实际价值要比这些垄断定价的官方价值增长得快得多。(伊萨维,8)与此同时，正如1883—1907年间统治埃及的英国总领事洛德·克罗默所宣称："政府的政策可以这样总结:(1)向出口欧洲的棉花征收1%的出口税;(2)对进口国外制造的纺织产品征收8%的进口税;它不保护埃及的棉织业，因为这种措施引起危险与罪恶。……由于埃及天生是个农业国，它逻辑上认为工业训练只会导致忽视农业，使埃及人脱离土地，这两方面对国家来说都是灾难。"25年以后，洛德·克罗默在回顾并总结其政策成就时说:"任何人回顾10年或15年以前，差别都十分明显。开罗的有些区以前是名符其实的多种工业中心——纺线，织布，制带，印染，制帐篷，刺绣，制鞋，珠宝，香料，制桶，兽皮制瓶，制马具，制锁，木锁与金属锁，等等——现已大大衰微或消失。现在，原先一度是繁荣作坊的地方成了咖啡馆和欧洲饰品店。"(引自阿布代尔—马利克,7—8)关于农村地区的相应后果，伊萨维、卢森堡、里亚德等人作了综述。

阿布代尔·马利克接着指出(8): 156

城乡的悲惨境遇与大地主的富庶形成了对应，后者最

> 后在占领国方面找到了经常的主顾。它能保证他们不断增加财富，因为埃及全国已成为兰开夏工厂的巨大棉花种植园。正是这样产生了英国与埃及王族为首的大地主之间的政治联盟，这将统治埃及政治生活达七八十年之久。

因此，不发达的发展的同样进程——经济与阶级结构的殖民地转变以及殖民地统治阶级（不论是外国的或"本国的"）随后的不发达政策——也被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强加到埃及。

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同样进程实质上也发生在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身上，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它在1830年以后不但被法国资本主义所殖民，而且被殖民地化。对整个马格里布，阿明综观了这个进程；阿尔及利亚的不发达的发展由拉科斯特等人作了分析，如其小标题所示：

> 城市经济的衰落。这开始于城镇的被毁和传统城市社会的肯定衰败。……农村经济的衰落。……农业与牧业活动的式微。……人口下降并非无关紧要。……社会倒退与封建主义的重起。……政权的不平等不但保持，而且加剧。……经济均衡被摧毁以利于殖民地化。……传统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农业危机与饥荒（1866—1870）。……私人对部落土地投机。……农业殖民地化的新结构：遥领地主与集中。……大殖民地化的胜利（1881—1900）与撒哈拉的征服。……葡萄园繁荣。……葡萄酒增长危机的后果：大殖民地化的土地集中与政治主宰。……殖民地账单的另一面：阿尔及利亚农民的贫困化。农民被排挤出森林。……穆斯林农民被迫出售土地。……投机殖民地化的扩张。……农民境况的恶化与穆斯林农业的恶化。无产阶

> 级化。……[农业]技术的停滞与土壤的恶化。……有利于[欧洲]殖民者而不利于[阿尔及利亚]土著农民的政策。……阿尔及利亚不发达的面貌。……(拉科斯特,315—444)

所以,不发达的同样格局和进程也大体上在阿尔及利亚和马格里布重现。

四、帝国主义与非洲

正如我们在上文(第四章)所观察的,非洲奴隶贸易的废除并非简单地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也呼应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在宗主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变化,在英国尤其如此。(如果后者很长时期未能"废除"这项贸易,那首先是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样进程中,他国——特别是法国——还没有具有同样的"人道主义"兴趣,虽然法国大革命确实导致了拿破仑放弃重新对海地实行控制的尝试)而且,非洲奴隶贸易的废除也无法恢复非洲两个世纪以前的原来状态。单一产品出口经济的经济与阶级结构的基本内容必然免于废除,它们现在在西非许多地方实行,以取代棕榈油贸易的经济与阶级结构,这是戴克与锡克等人所指出的。虽然十九世纪中叶的这一发展并不相等地影响所有的前奴隶贸易地区,可到了十九世纪末,西非的许多地方已大力重新转向到单一作物出口经济,包括花生及其他油类作物、椰仁、可可,等等。矿业只起相对较小的作用,因为矿山稀少。

比利时在刚果最大程度地通过种植园体系来组织出口农业;法国在赤道非洲也这样做,但程度较小,在北非程度则更小;英国在西非的程度最小。

158 然而，在其他出口经济中产生不发达的许多因素也出现在种植园那里的相对不重要的地方。出口经济中的批发贸易很快被主要的欧洲贸易公司所垄断，诸如联合非洲公司（尤尼莱佛）和西非法兰西公司，它们也控制进口商品销售的批发以及往往很大程度的零售业务。它们的主要力量提供效率高的机制，来榨取非洲地区的经济盈余，供它们控制。当它们对出口产品的控制后来被销售部门的控制所补充或取代时（这些销售部门原先是在殖民地政府手中，后来则在独立政府手中），这种买主垄断的因素并未减少，而且与以前一样地服务于宗主国的利益，因为销售部门对农人的支付大大低于世界市场价格，其差额就成为伦敦的英镑盈余，这在过去（和现在）都用来供宗主国发展。在国内，出口作物的生产、融资和商业经营越来越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两极分化。虽然一般都声称西非农村经济是以小农为基础的，出口农业的发展却已产生了一个农村资产阶级和一个农村无产阶级，对此我们可以从两类证据中推测出来。如波利·希尔所表明的，加纳可可农民中不超过 20% 的人真正自己干活，而 80% 的人雇用其他劳力。其次，与此相关，供出口的生产发展已导致西非的大量流动劳工在部落间和国际间流动，或许这并未得到应有的注意，因为它与中南非洲矿区更大规模的流动工人相比显得不多，对后者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观察。确实，出现了一个农村资产阶级或至少一个富农阶级，也为发展一个非洲人的阶级打下了社会——经济基础——正如阿明已经指出的，从农村出现，而不是通常在其他地方那样从城市出现——这可以指引非洲潜在的资本主义发展。但是正如殖民地与新殖民地世界的其他地方，以及正如法农、阿里吉和阿明所指出那样——这在非洲更甚，这种潜力反过来受到宗主国占压倒优势的利益的限159 制，或者在移民非洲，受到当地移民后裔的限制。确实如阿明与

阿里吉指出的，在世纪之交发生的这种非洲资本主义发展，一旦与宗主国及/或白人移民的新利益发生竞争，后来就被他们蓄意地转为不发达。

宗主国用以促使非洲社会按照宗主国发展利益而进一步转变的体制性手段根据当地的可能性而有不同。在“双重委托制”及卢格德的政策下，英国人制订了只要有可能就通过非洲人“间接统治”非洲人的办法。这意味着保留——有时甚至扩大——非洲部落酋长的权力以及为了新的目的而利用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当酋长们越来越把他们过去管理的部落财产变成私有财产（他们把它用来生产出口作物以赚取自己的利润）时，酋长统治的功能意义当然就大大变化了。非洲体制的这种功能性变化（由于其“合法性”的价值，所以保留着形式）益发增加了，从而使其他土地的私有化也更加扩大。这里，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非洲只是重新发明了西班牙人早在十六世纪的墨西哥和秘鲁就已也是迫于形势而发明并实行的做法。情况不同的是——正如贝努瓦指出的，他们主要是在法属西非这样做——宗主国及其在非洲的代表已求助于其他体制政策，包括制造一个以前不存在的“传统的”、“非洲的”酋长制。当英国人在南亚次大陆公务员中推行“印度化”时，法国人则在殖民地政府和诸如达喀尔、阿比让等港口城市的买办资产阶级中“同化”非洲人。这是絮勒—卡纳尔所分析的。

在东非、中非与南非的矿区和白人移民地区，供宗主国发展的非洲经济盈余的主要来源来自欧洲人及其后裔经营的矿业和大规模商业性农业。不像那些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欧洲移民，去非洲的欧洲移民没有灭绝土著居民。而且在非洲也不大可能这样做，除非欧洲人准备消灭比大洋洲相对多得多和密集得多的居民并且缺乏到矿山和农场干活的劳工或者必须引进更 160

多的白人或业商劳工。这样，欧洲人不但在非洲的这部分进行殖民，如同他们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样，也对这里进行殖民地化，如同他们在亚洲和拉丁美洲那样。因此，东—中—南非的土著居民还遭受到比西非显然更加严重的不发达的发展（虽然并不比北美和大洋洲土著居民所遭受的严重多少）。

欧洲人在这部分非洲设法建立一个出口经济——或任何一类经济——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保证他们得到劳工的供应和消灭或控制土著竞争对手的雇用来源和竞争性的农业产物。欧洲人在东非到南非所采用的主要解决办法实质上是西班牙人已经在十六世纪拉丁美洲所依靠的同样办法，他们的后裔在十九世纪中期和后期的拉丁美洲又再次应用：那就是剥夺土著人民的土地。通过不许非洲人在自己的土著经济中控制主要的生产资料，宗主国和移民们自然就强使土著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进行整体改变，并责成其成员参与建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移民与宗主国在其中是主要的受益者。沃迪斯(7—9)解释称：

> **欧洲人保有的土地中只有极小部分实际上是使用的。**这种明显的神秘做法原因何在？……其原因——以及在非洲许多地方大量掠取土地的原因——是双重的：为了阻止非洲农民成为对欧洲农民或种植园主的竞争者；并为了使非洲农民贫困得以致大多数成人男子被迫替欧洲人在矿井或农场干活。……总而言之，欧洲人在非洲的土地政策是为了保证欧洲人的矿井和农场有廉价劳力供应。……**因此，不但使欧洲人富裕、而且使非洲人贫困成了这项官方政策的基石。**（重点是原有的）

虽然这也是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它有机会开始发展的话)，可无数的官方文件无疑说明宗主国和移民们有意识地、蓄意地使用过——而且仍然在使用——强制性的政治手段，诸如最近他们通过法律来保证这种不发达的发展先是启始、然后加快和保持。另外两种手段由罗莎·卢森堡在她的理论综合中指出并由许多非洲学者所报道，例如：沃迪斯、帕德莫尔、沙佩拉以及各个皇家委员会。这另外两种手段不但行使其本身的功能，而且在适当情况下还用以加强第一种手段：赋税以及使经济货币化的其他方法。人头税只能以现金支付——如无力交税，就以强迫劳动——而金钱只能通过当欧洲人的雇佣劳动者才能赚到。欧洲商品的引进使这一趋势得到了额外的推动。 161

这些措施是相互促进的，尤其由于欧洲人有计划地夺取最佳土地而把大量非洲人赶到贫瘠土地上去，那里无法支持那么多人口，而且土地由于过度种植而很快恶化。不可避免的结果是：通过若干额外的因素而使不发达的发展加速了，这些因素中主要的是流动工人，其规模是在其他时间和地点从未听说过的，也许除了奴隶贸易本身，但甚至包括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流动到墨西哥和秘鲁矿井去的分配劳役制强迫劳工。凯斯卡马霍克农村调查报告称：

> 这个区的人民……依靠流动工人的收益来生存，而贫困则迫使他们外出打工。而正是这种大批流亡成为家乡永久贫困的有力原因，因为失去那么多的壮年人丁阻碍了经济进展，而且确实严重造成了该区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在许多事例中，土地闲置不耕的简单原因就是没有人手去耕作。……对其他25个区的经济状况进行粗略的分析……

162 说明凯斯卡马霍克的这项经济调查中发现的情况：人口过多，存货过多，贫困，大批外流，农作效能低下，牧场与土壤毁坏，在许多地区都存在，只有小小不同而已。（引自沃迪斯，26—28）

一份联合国报告总结了这个总的进程："在流动劳工从土著农业经济中大量流出的地方，这往往对农业产出和农作活动产生有害影响，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劳工的流出降低了生产率，而生产率的降低进一步增大了人们寻求雇佣就业的压力。"（引自沃迪斯，24）莫桑比克的主要"初级产品"出口，和葡萄牙的重要外汇来源，仍然是每年流向南非共和国的50万流动劳工。巴兹尔·戴维森作出的结论（85）很难说是过分的："这项多方面的运动年复一年地重复，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后果，而且没有一点可以说是好的。"

不发达的这种加速发展当然并不均等地影响所有地区。然而，东非或中非的非洲人却抵制了这种"发展"，这确实增了光。但是，在他们确实抵制并成功的地方，却也成了他们自己的祸根；因为他们对付欧洲人强加到他们头上的压力所取得的成功却使欧洲人使用额外的力量来迫使非洲人陷于不发达。例如，在1902年《罗得西亚矿业会第七次年度报告》中，会长说："土著人掌握了[家庭]劳动的廉价形式，加上如果他住在土著人保留地而无需支付租金，他的赋税便降到最低限度，所以他们能年复一年地生产大量粮食在适当时间出售给商人，而且最终还由矿主去高价收购，这样他们不大想去做其他工作，而且在粮食这一最重要的产品上可以胜利地同白人竞争。我建议采取两方面的补救办法，即税收和使矿主结成合作耕种制。"（引自阿里吉，45）
163 弗兰克尔指出，非洲人不但作为农民而且作为技术工人也会对

欧洲人进行成功的竞争，他最后说(26)："换句话说，如果欧洲人的收入水准继续受到威胁，欧洲工人有了充分政治权力后就会坚持以人为手段维持其水准，即使这样做可能会放慢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同样地，阿里吉也报告称(30)，为了对付罗得西亚非洲生产者的挑战，"在谈到的整个时期中，政府继续起重要的作用来破坏非洲农民参与产品市场的能力……"其结果是：

> 虽然出售的产品占本世纪初非洲土著人民现金收入总额的70%左右，它却只占1932年这类收入的不足20%。……随着非洲农民开始受到土地缺乏的影响，他们要生产可供市场销售的剩余产品成为"不可能"了，不仅仅是"不经济"，而且回复到以前状况的相对产品价格也无法恢复他们过去通过出售产品而参与货币经济的能力。主要由于这个原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现金收益重要性的增加应被视为"无法逆转"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我们现在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非洲人对雇佣就业机会的兴趣不断增加，不管实际工资上升、下降或保持不变。我们的分析表明，这种倾向必须追溯到非洲人参与货币经济的日益"必要"的性质，以及参与产品市场的相对艰难代价的不断增加(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部门吸收盈余的格局所致。(阿里吉，30，26—27，32)

宗主国的萧条造成非洲矿业就业的下降，这当然迫使许多非洲人失业并再次依附于土地。但是在这时，农业生产资源的缺乏以及土著农村社会中社会结构的改变，已经不再能对这种 164

劳力进行生产性的吸收或者生产充分的生活水平。因此，阿里吉对非洲不发达的发展的分析迫使他得出(33)与我们就殖民地拉丁美洲所得出的同样结论，那也是格尔茨对印度尼西亚的分析中得出的同样结论。“用历史角度来分析非洲劳工的供应，就否定了……以[二元论]……来解释罗得西亚非洲雇佣劳动力的发展。就一点来说，罗得西亚的二元论(即两个种族之间在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差距)，并不是因市场力量而逐渐减少的‘原有状况’，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结果。”阿里吉还接着强调另一点结论，它和卢森堡及我们对其他民族不发达的发展的经验的分析是一致的：“市场力量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工资保持在促进资本主义积累的水平，并不是由于供求力量，而是由于政治——经济机制保证了‘合意’工资额的‘合意’供应。在工资额和积累率的决定权可以‘安全地’交给市场力量以前，罗得西亚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进行‘原始积累’的过程。……”(阿里吉，33)因此，世界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发展的基本因素(我们在拉丁美洲、亚洲和中东都有发现)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同样在非洲发生作用。

五、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

在这个时期中，与大部分的亚洲和非洲相比，拉丁美洲的突出之处在于它只是新近赢得了——而不是失去了——正式的独立，并在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发展的整个第三阶段里保持了这种独立。尽管与其他各洲有这些和其他的重要差异，或者在拉丁美洲内部有重要差异，突出的情况却是：拉丁美洲生产方式的构成和不发达的发展与亚洲及非洲的这些进程在基本上竟如此相似。所以，我们在综观拉丁美洲经历的时候，特

别注意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大大地、日益增加地在经济、政治与意 165
识形态上对宗主国的依附以及他们的“独立”状况，是有教益的。我们在综观世界资本积累第二阶段时，已经观察了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在击败了他们自己阶级与其他阶级内部的敌人以后，如何自动地、热情地采取了自由贸易的理论与政策，而这在其他地方，宗主国都往往不得不以武力推行。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在世界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这类勾结的另一个事例是社会变革的政治措施——以及深远的经济后果——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许多民族社会内部发动的这种社会变革就是自由派改革。

十九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自由派改革一般被自由派及其意识形态后辈们自己解释为国内社会的重大转变，它是由来自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启蒙浪潮所激发的。宗主国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并非只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方面。而拉丁美洲之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就像早些时候的自由贸易思想一样，并非简单地由于自由派思想逻辑的或固有的吸引力。相反，这种自由派改革仍然是拉丁美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转变的又一个重要事例，也是为了呼应与宗主国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关系之变化而改变政治政策的又一个重要事例。正当宗主国的新需求大大加速了拉丁美洲粮食与原料的生产和向宗主国的出口的时候，自由派改革并非偶然地发生于拉丁美洲，而不是发生在自由派思想早些时候初从海外传入的时候。自由派改革不是简单地针对天主教会的保守影响及其最虔诚的信徒。自由派改革接管了教会的土地，也接管了印第安人社区的土地。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优于教会集体财产和印第安社区共有财产，后两者都被剥夺了土地，其程度大大超过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情况；而土地很快被集中到少数私人及外国与本国“私营”公司之手。大量丧

166 失土地——如同不久以后在白人移民的非洲——迫使土著居民去充当迅速扩大的农矿出口企业的雇农。

自由派改革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进行。我们可以冒险作出或许有点过于简单化的假设：在任何特定的国家，自由派夺取政权和实施他们的自由派政治——经济政策的自由派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在自由派思想传入时发生的，而是当新的单一出口产品——咖啡、糖、肉类、小麦、棉花、锡、等等——充分扩大为占到全国总出口的50%以上的时候。虽然有些人由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可能希望自由派改革持续一个长时期，但正是宗主国所刺激起来的拉丁美洲出口生产的这种扩大使得某些部分的资产阶级得到经济与政治理由以及权力来推行自由派改革。现在，自由派把"封建主义"这个字眼变成了一面红旗，以此来抗击他们的保守派敌手。据我所知，这一假设并未经过测试，因为以前没有提出来过。但是审看一下中美洲的历史经验似乎可以暂时对它作出肯定。

例如，在危地马拉，咖啡生产开始于1856年；到了1875年，咖啡已经是主要的出口产品；而自由派革命发生在1871—1873年。在厄瓜多尔，咖啡在1880年成为主要出口产品，而自由派革命发生在1885年。然而在哥斯达黎加，咖啡在1860年以前就已经是主要的出口产品，自由派专政则开始于1858年，一直延续到1868年。与之相对照，洪都拉斯从来没有成为重要的咖啡出口国；那里自由派革命的尝试完全失败了，而自由派改革在1876年引进时，也只是在很有限的规模上。在尼加拉瓜，它从未成为一个出口大国，但在上世纪末提供了最可能建造越洋运河的线路（后来是在巴拿马建造的），其自由派革命发生于1892年。在墨西哥，最最著名的自由派改革于1857年开始以前，而出口和地价已经在1851年开始上升。（托雷斯，21—50）

当然，在每一个这些事例中，自由派改革都加速了促成它的经济进程。一旦掌权，以前的自由派就更多地跟发展中的帝国主义宗主国的贸易和外资发生联系，后者正是自由派的天然盟友。如果这种殖民地联盟和国内政策产生了不发达的严重经济问题而在国内发生政治紧张局面，并且需要通过独裁政治压制来加以统治的话，正是那些自由派们自己——他们只在不久前还以自由的名义向保守派作斗争——现在首先求助于这种压制以服务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墨西哥波菲里奥·迪亚斯，以及中美洲与加勒比的咖啡共和国、甘蔗共和国和香蕉共和国。（更多详情请参阅弗兰克，1972，第五章）

宗主国对原料生产与出口的新需求以及拉丁美洲在原料生产与出口方面的利润吸引着拉美公共资本投入扩大出口生产所必需的基础结构。在巴西、阿根廷、巴拉圭、智利、危地马拉与墨西哥（仅就本书作者所知，但可能还有其他国家），本国或国家资本在上述每个国家里都建造了第一条铁路。在智利，开发了硝酸盐矿和铜矿，成为世界上商业性化肥与红铜的主要供应国；在巴西，咖啡种植园几乎供应到了世界上所有的餐桌；其他地方还有类似情况。只是在这证明是兴隆的生意以后——以及在英国必须为它的钢寻找出路以后——外国资本才进入这些部门并通过购买（往往用拉美的资本）这些土著人的特许权来接管这些原来是拉美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在拉丁美洲，这种帝国主义贸易与金融不光是增加了生产、贸易与利润量，以及积累了大约100亿美元的投资资本。帝国主义宗主国利用它的对外贸易和对外金融更加彻底地渗透进拉丁美洲经济，并且更加有效而充分地利用拉丁美洲的生产潜力来促进宗主国的发展，远远超过殖民地宗主国所能做的。如同罗莎·卢森堡所指出的——中东的一种类似的进程“扯去了所有

不清楚的联结，这些关系包括一个简单的事实：欧洲资本已大部吞没埃及的农民经济。大量土地、劳力和无数的劳动产品被国家作赋税征集，最后转入欧洲资本之手并且积累起来。"（卢森堡，438）

168 确实，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走得更远。它不但利用拉美国家来进攻农业；它还接管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和政治机构来把整个经济结合进帝国主义体系。大庄园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特别在阿根廷、乌拉圭、古巴、墨西哥和中美洲。在拉美各国政府的帮助下，外国人开始拥有大片土地，往往无人可以匹敌。在他们没有搞到土地的地方，他们也搞到那里的产品，因为宗主国也接管了和垄断了农产品及大多数其他产品的销售。宗主国接管了拉丁美洲的矿山，扩大了它们的产出，有时候在几年之内就耗尽了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为了把这些原料运出拉丁美洲并把它的设备和商品运进拉丁美洲，宗主国就鼓动港口建设或铁路建设，并不得不为所有这些系统供应公用事业服务。铁路网和电力网却完全不是网状而是辐射状，把一国或数国的内陆地区同进出口岸相联，这些港口再同宗主国相联。今天，在80年以后，这种进出口格局依然保持，其部分原因是铁路权依然如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所确立的以宗主国为取向的城市、经济与政治发展形成了一批既得阶级利益，它们设法在宗主国支持下在二十世纪仍保持和扩大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中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对宗主国的依附以及日益虚弱，已经由许多观察者所指出，虽然他们可能强调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例如，马里尼写道(6)："拉丁美洲的出口经济空前繁荣。然而，这种增长却以着重对工业国的依附为标志。"科尔多瓦论述（Ⅶ，32）称："民族资本主义阶级的根源是传统的商业资

产阶级，是一批富裕地主，是人称‘官僚资产阶级’的高层公共官员阶层（它利用政权的好处作为积累手段）。……当商业资产阶级基本上成为进口资产阶级时，它成为世界垄断资本主义在拉美国家的国内右翼，并被允许作为小伙伴参与利润分配。……” 169
霍尔珀林指出（280，282）：“在1880年（或前、后几年），初级产品和出口经济在几乎所有西属美洲的进展最终完成了一种新殖民地条约，以取代伊比利亚宗主国过去强加的那种殖民地条约。……新殖民地秩序……［带来了］更为一般的趋势：尽管高层地主阶级在当地政治、商业与金融结构中作出支持，他们在宗主国经济使者面前却日益削弱。”卡普兰在专门讨论民族国家的书中——这是极少几本有关这一被忽略的重要题材的著作之一——强调：

说明国家在拉丁美洲起主导地位的因素之一，正是由于需要在不稳定的平衡之下调整、互惠地安排和维持那些组成不平等的联合发展的异质而多样的成分。……国家还作用于经济活动和社会体系的取向、结构和功能以促成并保证依附性发展模式的成功运作。……初级产品生产与出口部门……是受到控制的。……供应农矿出口部门的生产资源得到保持和扩大……资产不受破坏。……国家还承担在空地……或土著部落居住地扩大国内边疆的任务。……国家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正是阻止土著人、土生白人和移民工人取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国家促进为某种目的的国内资本积累并吸引外国资金。……国家建设和营运公共工程与服务，……或者向外国公司发放特许权、保证、津贴和其他鼓励，从而保证其高额利润。……这种国家干预的好处流向了地主、商人、投资

人、投机商、中间人以及大公司的律师。……(卡普兰,174,197—201)

塞塞尼亚观察称(79—80),在墨西哥,"在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当政期间(1876—1911),外国资本深深地渗入了墨西哥经济。……它并没有推进一个独立的墨西哥资产阶级的发展。……政府的高官们,包括迪亚斯将军的内阁部长们,都和外

170 国投资人有密切联系。……相当多的省长、国会议员和资产阶级代表……参加了外国公司,并投资于银行业、工业、矿业、销售业、等等,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大地主"。不但现代的研究而且当代的证词都有同样的指证: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自己也说过:"因为我负责千百万美元的外资在我国的投资,我想我应当留任到直至保证找到一位称职的继任者。"(引自科西奥·比列加斯,Ⅷ,1183)一个世代以后,阿根廷财政部长费德里科·皮内多坦率地宣告:"如果一个美国贼担当了铁路、电车、银行、电力公司、航运和保险公司、谷物商,以及由阿根廷人和外国人在这个国家建立的大工业和金融财团的法律顾问的话,那么那些显赫的阿根廷人也会是卖国贼,他们在上一代里由于其杰出的专业才能而被聘在这些公司任职,其中有些人现在被刻入碑文以纪念他们对国家的出色服务。几乎所有我曾经一度有幸参与或担任专业人员的公司都曾一度是我父亲的法律事务所的客户,而我父亲是阿根廷总统佩莱格里尼和萨恩斯·培尼亚的合伙人。……"(我们在上文谈到,佩莱格里尼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很好地"服务于"他的国家,提出了很不同于澳大利亚的政策。)(引自帕雷拉·丹尼斯,14)

虽然这个证据验证了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对宗主国的更深依附和更大屈从以及世界资本积累进程的第三阶段,但是注意一

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差异也很重要。正如卡多佐和法莱托所强调的，在出口部门的主要生产资料被外国拥有的那些国家里(也许智利除外)——大部分是矿业与热带农业，有些情况下也有咖啡种植——它们的资产阶级受到更大的削弱，国内资本积累和生产结构多样化的水平更低，社会两极分化更大；而在初级出口产品的生产(虽不是销售)至少仍为本国所拥有(或者在革命后部分归国有，如墨西哥)的那些国家则比它们好些。在后面这些国家中，可投资的盈余相对数额较大，国家对这些资金可能使用的控制也较多，使得它们的国民收入有较大的增长，具有更大的多样化，并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可能来利用战争与萧条所造成的机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扩大进口替代工业。然而——虽然这超出本书的时限——现在已很明显，即使是这些国家，尽管具有这些相对有利的环境，也无法达到向自力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起飞。当然，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在殖民地的亚洲和非洲，就更少可能达到这种发展了。

这些国家中，甚至受创最少的国家也未能取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或者尽管经济增长率不低，也未能逃脱不断加速的不发达的发展，其原因在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以及亚、非、拉(除了日本显著地例外)在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第三阶段中生产方式的改变，这种情况最终肯定使这些经济社会将来绝无可能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取得资本积累，并使"民族"资产阶级(如果竟然存在的话)在新帝国主义时代在民族资本主义(甚至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小范围内推进经济发展的一切政治愿望归于无望。

为了对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古典帝国主义时期通过依附性"内部"生产方式来分析其不发达的发展进行补充，我们观察了这些大陆"外部"交换关系的进口方面，特别是在资本

主义发展的同一(第三)帝国主义阶段中,出口商品明显多于进口,此乃世界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及这些大陆的不发达,此乃其他地方积累的基础。以下第七章将讨论帝国主义的这种结构和进程。

第七章

172

多边商品贸易不平衡与不均衡经济发展[①]

与正统的国际贸易和国家发展理论相反，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并非伴随着平衡贸易（或增长），而是在事实上依靠发达的宗主国与不发达的殖民地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基本不平衡。宗主国除了最糟糕的大萧条年份以外，有着经常的、不断增大的贸易赤字，而不发达国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古典帝国主义时期中则存在贸易盈余。对国际收支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专门兴趣，以及对平衡机制的沉迷，给基础的商品贸易不平衡蒙上了一层"金钱帷幕"，我们相信这种贸易不平衡在不均衡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基本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仍然难以理解。（因此，下列讨论只是研究设想的初步阐述，它要求实际调查和理论重构。）

以下讨论的要旨是，不发达国家的出口长期超过进口，这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对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基本贡献；不发达国家产生这种出口盈余已经在那里形成了一种使亚、非、拉沦于不发达的生产方式。

这种交换方面贸易不平衡的重要性，完全不抹煞内部生产 173

① 作者在本章中对商品贸易使用了"盈余（surplus）与"赤字"（deficit），但所指与传统含义有所不同，这里的"盈余"指多于流出的商品流入，"赤字"指多于流入的商品流出。——译注。

方式的重要性及其与发展中的不发达的交换关系。贸易不平衡也没有忽视不平等交换的重要性，反之亦然。相反，每一个都突出地加强和加剧了另一个。如果不发达国家在如上所述按世界市场价格计量其出口时具有持续的出口盈余，那么，要是它们的出口按实际价值加以计量的话，它们会有大得多的、比它们的市场价格更大的实际出口盈余，这是伊曼纽尔和阿明关于不平等交换的分析中提出的。同样地，如果不发达国家即便已有商品贸易盈余（如正统理论所设想的），仍遭受到不平等交换，那么，要是它们坚持按市场价格出口比进口更多的商品，它们的交换就更加不平等，它们的损失也更大。

一、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格局

商品贸易不平衡的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多边结算的有关体系只是唯一一项严肃研究的主题，这项研究是由国际联盟承担的（1942 年），正如它的主席福克·希尔格特自己指出的（国联，第 84 页），当时正由于"它的功能被 30 年代期间的动乱所破坏。"他写道：直到那时，"这种体系不能吸引任何兴趣"。我们还可以加一句，由于新帝国主义的战后发展，宗主国及其代表似乎再次失去一切兴趣。希尔格特总结他的调查如下（1943，400，394）：

> 刚刚描述的那个特定的世界范围体系并不太旧。它出现于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从一开始就联系到英国投资收益的转移。……（397）。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在几十年的时期内完成了，就像展开一把扇子那样：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并根据既定的次序排列，而在转移的路线上，各国离英国要比该国离它的债务国更远。这种发展无疑对

现代经济增长至为重要，而它却被经济学家所忽视。我们通常认为这种经济在1870年左右开始发展，这并非偶然——我们已经看到，此时恰值多边贸易体系开始出现[破折号之间是希尔格特的话：A.G.弗兰克论]——或者说下述主张贴合我们的看法，它认为国际经济在本世纪早年即已达到成熟阶段，当时多边体系已成形，即便不是计量增长（那是迄至30年代早期的事）。……当发现几乎所有国家都能按它们贸易收支的方向安排次序，这个体系就变得清楚了：每一国家对于在列表上排在它前面的所有国家都有进口余额，对于排在它后面的所有国家都有出口余额。在列表的前头是热带债务国，它们几乎对各方面都有出口余额，在列表的末尾是欧洲债权国，它们几乎从所有国家都有进口余额，英国是最典型的事例。不过在这两大极端之间，各国次序安排各异。…… 174

康德利夫(283)将希尔格特对173个国家、96个小的国家集团和17个大的国家集团之间的贸易格局的研究总结如下：

全世界的贸易区最终汇集为六大类别。它们被安排……为一个简明的循环图表，这并非仅仅是一项理论设计，而是实际记录的世界贸易值的一项总结。热带国家出口到美国多于它们从美国进口；美国出口到英国各自治领和非热带的拉丁美洲（包括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福克兰群岛）多于它从这些地区进口；它们转而更多地出口到欧洲大陆；欧洲大陆更多地出口到英国，循环的末了是英国出口到热带国家稍多于它从它们进口。

第六个“地区”指“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和亚洲大陆，但

不包括印度、日本和北非），大约占世界贸易的10%，但难以很好地排入该体系（见下文）。

175　过一会儿我们将描述希尔格特对贸易不平衡（1928）的计算，以及我们自己对其中一些进行的复算，以更好地突出不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我们还要说明这对于后者国家中不发达的发展的意义以及它们对其他国家发展的贡献。但是，如果我们先简要概观一下希尔格特自己对这个世界体系运行的若干观察，并补充英国S. B.索尔的一些最近的观察，这就会更清楚些。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希尔格特看到——多边贸易（有别于双边贸易）占全部商品交易的大约25%（国联，87）。但是，希尔格特认为（国联，1928），“这种贸易的意义决不能以它在贸易总量中的百分比份额来加以测定”。索尔同意称（45，70，225，等处）：“几乎没有哪个现代经济的重要方面不受到多边贸易体系分类的负面影响的。……世界范围基础上的多边结算……是对国际货币平衡、国际金融、世界市场形成的价格水平（从而对各国市场形成的价格水平），并相应对生产就业和商业周期进程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1870—1930年这个时期中迅速而普遍的经济进展，如果没有多边贸易体系在外资帮助下使得经济稚嫩的国家取得生产发展，那是不可能的。”（希尔格特，405，403—404）但是，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种“普遍的经济进展”并非普遍到囊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它们是“外资”的最终供应者而自己则遭受着不断加深的不发达。同样地，索尔观察了（88）“英国通过印度所进行的大量多边结算。……如果英国的出口，特别是英国的棉布，没有在战争爆发前几年期间在印度找到门户大开的市场，它就不可能对美洲大陆以及其他地方倾注那么多的投资。……通常，英国从印度进口的1/4最后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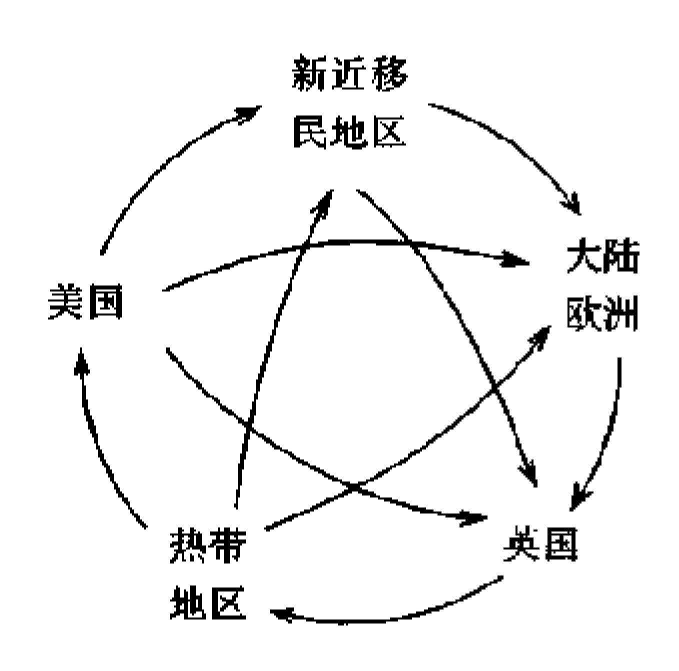
再出口”。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再来讨论。

我们结束这些导论性内容前，再谈两点情况：“结余的方向取决于参与国之经济结构和消费习惯中所固有的生产性质和要求性质。”（希尔格特，引自国联，1942，88）关于不发达国家，这些情况由莱文（174）在他的研究著作《出口经济》中的深入观察所补充：“存在外国因素的一个特色迹象是商品出口超过商品进口的盈余，……存在出口超过进口的盈余是外国因素活动的正常结果。的确，在大多数出口经济中，无形收益相当小，出口盈余是把收益汇出国外的一个必要条件——不包括使用储备或投入新资本。”那就是说，除了不平等交换（莱文对此没有考虑），正是通过殖民地国家商品出口的盈余，才使宗主国在那里实现它的投资及其他服务。让我们察看这种机制的运行。 176

1928 年多边贸易不平衡与结算的世界范围体系，可以由 J. B. 康德利夫从希尔格特改编的以下图解来加以说明——一点重要的修改将在下面谈及。

从热带地区或不发达地区开始（有关的定义请参阅下文第 199 页的“统计与方法论附录”），顺着时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区对以下地区的出口多于进口：美国，新近移民地区或自治领，欧洲大陆。其次，美国则对其他地区有出口盈余（=进口赤字）：自治领，欧洲大陆和英国，虽然美国对它们的部分出口盈余则由它从热带不发达地区的进口盈余所“抵消”。新近移民地区或自治领在贸易循环中居于中间位置。在贸易平衡上，它们从不发达地区和美国（都在循环中居于它们之前）取得更多的商品，它们向欧洲大陆和英国则输送更多的出口。欧洲大陆从三个地区——不发达地区、美国和新近移民地区，均在循环中居于它之前——得到更多进口，而它向英国则出口多于进口。最后，英国从循环中居于前面的各个地区进口更多商品，但向不发达

国家的出口则多丁——虽然是很少量的多丁——从它们的进口。最后的这种关系明显地“完成了”或“封闭了”这一贸易不平衡循环体系的圆圈。



贸易收支循环图，1928 年

注：顺时针阅读，此图表明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主要流程，箭头说明流向。

每个地区的出口超过下一地区的进口。因此，在 1928 年，美国对每个地区均有出口盈余，除了热带原料生产国。

此图根据国际联盟《世界贸易网》（日内瓦，1942）一书中的类似图表改编。

引自 J. E. 康德利夫《各国的商业》（纽约，W. W. 诺顿公司，1950）第 285 页。

另一种选择，则可把同样的循环按接受更多进口来加以观察。从英国开始，它从排列在它后面的所有地区取得更多进口；欧洲大陆向英国更多出口，从其他地区更多进口，并通过自治领；自治领对两个地区有出口盈余，对另两个地区有进口盈余；回到美国，它对所有其他地区有出口盈余，除了不发达国家，它从不发达国家得到商品进口盈余；最后是不发达地区，它对居于它以前的所有地区有出口盈余和进口赤字，除了从英国有少量的进口盈余。

178

在表 1 中，同样的多边贸易不平衡以表列和数字形式显示，涉及了 1928 年的千百万美元的商品出口赤字或进口盈余和出口盈余或进口赤字。出口赤字 = 进口盈余以 + 号表示，以说明和强调输入商品多于输出商品；出口盈余 = 进口赤字以 − 号表示，以说明和强调输入商品少于输出商品，特别是由不发达国家。这样来阅读各栏，从英国开始(第 1 栏)，我们发现它从欧洲大陆包括苏联和日本(第 2 行)，各自治领(第 3 行)以及美国(第 4 行)输入更多商品，分别为 + 7.3 亿美元，+ 1.1 亿美元，+ 6.3 亿美元，它对不发达国家有少量的出口盈余：− 4,000 万美元。把这三项进口盈余与一项少量出口盈余加起来，英国在第 6 行的总平衡为商品进口超过出口的 + 14.3 亿美元。

表1　世界五大地区1928年

商品出口赤字＝进口盈余(＋),与商品出口盈余－进口赤字(－)

(单位:百万美元)

贸易与对象	英国	欧洲大陆＋苏联＋日本	自治领	美国	不发达地区	总计
	1	2	3	4	5	6
1.英国	×	－730	－110	－630	＋40	－1,430
2.欧洲大陆＋苏联＋日本	＋730	×	－610	－720	870	－1,470
3.自治领	＋110	＋610	×	－530	－50	－140
4.美国	＋630	＋720	＋530	×	－610	－1,270
5.不发达地区	－40	＋870	＋50	＋610	×	＋1,490
6.总计	＋1,430	＋1,470	－140	－1,270	－1,490	×

来源:见表5,第202—203页

表1栏1＝表5栏1,表1栏2＝表5栏5,表1栏3－表5栏9,

表1栏4＝表5栏10,表1栏5＝表5栏16

179　欧洲大陆(第2栏)对英国(第1行)有出口盈余＝进口赤字,数额为－7.3亿美元,但它对其他三个地区都有进口盈余＝出口赤字;它对不发达地区(第2栏,第5行)的进口盈余＝出口赤字为＋8.7亿美元,补偿它对英国出口盈余的－7.3亿美元尚有余。因此,欧洲大陆总的进口盈余＝出口赤字为＋14.7亿美元。

自治领(第3栏)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第1行与第2行)都是出口高于进口,但从美国和不发达国家(第4行和第5行)取得进口多于出口。同样地,美国——1928年的新"债务国"——对英国、欧洲大陆和自治领(第4栏,第1、2、3行)有大量出口盈

余,但从不发达国家(第5行)取得很多进口盈余即+6.1亿美元(相当于它自身向欧洲出口的45%或它的总出口盈余的32%)。这样,美国的净出口盈余为 14.1亿美元。

最后,不发达国家(第5栏)从英国进口的商品虽比出口多4,000万美元,但它向欧洲大陆、自治领和美国多出口的数额却分别为-8.7亿美元、-5,000万美元和-6.1亿美元,其净出口盈余=进口赤字为 14.9亿美元。所以,在不发达地区与每个其他地区的"双边"关系中,它付出的要多于整个欧洲大陆对英国的出口盈余,比自治领净出口盈余多1/3,比美国净出口盈余多几乎一半,而收到的却只是从英国的小小4,000万美元的"回报"。 180

表2 世界三大"地区"在1928年
商品出口赤字=进口盈余(+)与商品
出口盈余=进口赤字(-)

(地区经过重组,单位百万美元)

贸易与对象	全欧洲 1	美国+自治领 2	不发达地区 3	总计 4
1.全欧洲	×	-2,070	-830	-2,900
2.美国+自治领	+2,070	×	-660	+1,410
3.不发达地区	+830	-660	×	+1,490
4.总计	+2,900	1,410	-1,490	×

来源:见表1,第178页,与表5,第202—203页

栏1:表1,栏1+栏2;或表5,栏6

栏2:表1,栏3+栏4;或表5,栏11

栏3:表1,栏5;表5,栏16

看看这四个主要地区,暂时不谈经济上较小的自治领,我们

注意到每个地区的总出口盈余或进口盈余均在14亿至15亿美元之间，但英国和欧洲大陆都是商品进口多于出口，而美国和不发达国家都是出口多于进口。这些贸易不平衡关系在表2中得到进一步总结，其中英国与欧洲大陆（包括苏联与日本）加在一起作为"全欧洲"（第1栏，第1行）；美国和自治领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地区"（第2栏第2行）；不发达国家仍作为一个"地区"，同表1一样。我们看到"全欧洲"有总商品进口盈余（第1栏，第4行）+29亿美元，一半（-14.1亿美元）来自美国与自治领，一半（-14.9亿美元）来自不发达国家。这些商品贸易盈余及赤字的分量——即便不是涵义，如希尔格特所指出的——可以通过把它们与同一年份的世界总出口值及地区总出口值进行比较而加以衡量。1928年的世界总出口大致为320亿美元，而进口到欧洲的，按照其他地区的出口值计算（见统计与方法论附录），约为180亿美元（国联，1942，45）。所以，欧洲多进口的-29亿美元代表总出口的约9%和欧洲总进口的约16%。其中，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约一半以上，或者大约分别为5%和9%。但是从不发达国家自身的观点来看——它们不像美国和自治领，没有人"帮助"它们支付它们的出口盈余——它们出口多于进口的-14.9亿美元代表了它们总共出口（包括多出口）的83.3亿美元的18%。（国联，1942，45）

181

而且，如果（如在附录表5，栏17与栏18）我们把中国和北非——它们的商品进口盈余分别为3亿美元与2,000万美元——不计入不发达国家集团，那么剩下的国家有净出口盈余=进口赤字18.1亿美元，或几乎为世界总出口的6%，欧洲总进口的10%，或它们自身（不包括中国与北非）总出口65.2亿美元的28%。这就是衡量不发达国家商品出口超过它们"相应的"商品进口而对世界发达地区进口的贡献的意义；即使这些出

口按世界市场价格衡量，情况也是这样，还不考虑平衡贸易中"不平等"交换的可能性。然而，这些商品贸易不平衡对于欧洲、美国和自治领的重要性大大超过它们在其自身进口中的份额——这个问题将在下面研讨多边商品贸易不平衡的世界体系的进一步意义时加以讨论。

至于 1928 年数据的代表性问题，它们当然在量上高于十九世纪；但是它们所展示的贸易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同整个世界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第三阶段的特点并无质的不同。世界总出口从 1820 年的大约 5 亿美元增长到 1867—1868 的大约 50 亿美元，1913 年的 200 亿美元，以及 1928 年的 340 亿美元（沃伊廷斯基，39）。但是，与此同时，研究这个问题的所有学者（诸如施洛特、国际联盟、伊姆拉、索尔）都同意，例如英国自 1816 年以来每年都始终有商品出口赤字；这项赤字从 1815—1820 年的大约 1,000 万英镑上升到 1876 年的 1 亿英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大约 1.4 亿英镑，在此之前的 1903 年曾达到 1.88 亿英镑的最大数额（巴勒特—布朗，75，以及索尔，53，根据伊姆拉的材料）。不发达国家的出口盈余在这段时期肯定也增加了。 182

统计附录表 6 中所显示的、以下表 3 所总结的某些欧洲国家和美国局部商品进口与出口的数据说明，英国从 1881 至 1905 年商品出口赤字——进口盈余日益增加，在 1911—1913 年有所减少，而西欧大陆的主要国家一起在这个时期之初的进口盈余比英国低，而最终的进口盈余则比英国在 1911—1913 年的几乎高了一倍。这种增长的商品进口盈余的主要受益者是德国。另一方面，美国早在 1881—1885 就显示了商品出口盈余＝进口赤字。然而，在世纪之交以后，当美国开始出口比进口更多的制成品（表 6，第 1 行 M）和更多的原料（第 1 行 R）时，这种情况就更加显著了。虽然这些数据并未特别提到不发达国家的贸

易收支，但却能推测一下它们的方向和一般的分量。因为在当时的每一年或者整个时期，欧洲的进口盈余——不论是英国或欧洲大陆或两者合在一起——都比美国的出口盈余大得多，我们可以推测这些欧洲的进口盈余也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美国以外某些地区的商品出口盈余。由于在这个时期的早些时候，各自治领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仍然相对较小，我们可以推测不发达国家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和二十世纪初必定有了相当大的出口盈余＝进口赤字。而且，我们怀疑在 1928 年，美国用它从不发达国家得到的进口盈余来支付它的部分出口盈余。这一怀疑似乎由美国本身的贸易收支数据所肯定，数据表明，在 1891—1900 年，1901—1910 年，以及 1911—1915 年期间，美国对不发达国家（中美洲、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的进口盈余＝出口赤字分别为其同期对欧洲出口盈余＝进口赤字的 43%、34% 和 40%（根据沃伊廷斯基一书计算，78—79）。希尔格特关于 1928 年的数据，表明了一个类似的百分数 45%（表 1，栏 4，第 5 行，占第 1 行与第 2 行的百分数）。

183

表 3　欧洲与美国多出口与多进口，1881—1913

（百万现值美元）

	1881—1885	1891—1895	1901—1905	1911—1913
出口赤字＝进口盈余				
英国	507	634	850	652
欧洲大陆	381	505	522	1,142
出口盈余＝进口赤字				
美国	108	91	455	536

来源：表 6

关于1876—1880年、1896—1900年以及1913年时期这种多边贸易不平衡世界体系历史发展的其他局部估计(有些可以证实,有些则有矛盾)都列在统计附录表7中,并由表4作了总结(关于我们的计算方法,统计附录中作了讨论)。这些数据容许对这些早年多边贸易不平衡的格局进行估计(虽然比较粗糙和不准确),它们同1928年的表1、表2与表3中的数字较为类似。它们包括欧洲、美国(与加拿大)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收支,虽然所有的收支仍以一个特定地区与所有其他地区总额相比而不是把其他地区分列。表4(与表7)也说明:

184

表4 商品进口多于出口(+),商品出口多于进口(-)

(百万现值美元)

	1876—1880	1896—1900	1913
英　国	+367	+540	+374
欧洲大陆	-250	+207	+711
美国+加拿大	-258	-490	-656
不发达国家	+133	+99	-640

来源:表7
关于计算与误差请参见附录

英国从1870—1880年到1896—1900年期间商品贸易进口盈余=出口赤字日益增加,到1913年则又有下降;欧洲大陆也有类似的进口盈余,它在后期上升到几乎为英国的一倍。然而,在这些表中,1876—1880年期间,欧洲大陆显示了出口盈余=进口赤字而西北欧洲大陆则是进出口平衡。美国(与加拿大)总是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出口盈余=进口赤字,不发达国家则表现出口盈余=进口赤字相等于美国与加拿大的1913年数字。但无论如何,在这些数据中的前面两个时期,不发达国家均显示了进口

盈余＝出口赤字。前面两个时期的所有这些数据，如同表1、表2与表5的1928年一栏，都是根据当时现行的世界市场价格。因此，这些数据由于"不平等交换"而把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定值过低"，而同样的数据也低估了这些国家的"实际"商品出口盈余。1876—1880年与1896—1900年期间不发达国家的出口赤字，从表4来看，表明生产初级产品的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下降恰正始于这一时期(见第五章)。

因此，虽然我们有关这个时期的最详细数据是关于1928年的，但这些局部数据却说明它的多边贸易不平衡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在实质上发展了这种同样的格局。说明这一情况的进一步证据将在我们讨论世界多边贸易不平衡特点的理论含义时提出来。

185

至于贸易不平衡格局的稳定性以及希尔格特扇形扩张的比拟，在这个体系发展过程中确实纳入了更多的国家。但这种纳入首先是在主要地区以内而不是各主要地区之间，例如德国，希尔格特便说它在欧洲地区内部靠它自身力量确立了联系。或者某一特定国家可能与另一国家或地区从出口盈余变成出口赤字，或反过来。所以，阿根廷对美国在1928年的出口赤字(表5，栏13，第10行)或许只是最近的事，可能较早时期是出口盈余；阿根廷可能在某个时候对英国有过出口盈余，因为它的出口首先是对欧洲大陆国家，而它的进口首先来自英国(索尔，74—79)。但是这些变化都没有改变各主要地区之间的基本关系。

在对这三种商品贸易收支及其关系的意义继续加以说明以前，我们可以转而谈一下贸易商品的运输与保险费用问题。希尔格特认为"全部商船吨位的2/3是欧洲的，欧洲集团……不但是货物进口包括到岸价值的净接受国，而且是向非欧洲国家运输或它们之间运输的从世界其他地区赚取大量收益的接受国。"

(国联,78)我们可以很保险地设想其余1/3吨位的大部分属于美国和各自治领,而现在的不发达国家则几乎没有拥有任何航运手段,从运输和保险服务方面得到的收益也微不足道——虽然它们在这方面却支付很多。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可以大体估计不发达国家为它们的进出口货物的海洋运输和保险所支付的费用,这同样要以商品出口的形式支付。(这主要包括计算不发达国家向别地区出口以及别地区从不发达国家进口之差——那就是,不发达国家的出口运输费,加上不 186 发达国家从别地区进口与别地区向不发达国家出口之差,即不发达国家的进口运输费。对热带国家,这等于希尔格特的图6中提出的出口盈余与进口盈余之差,或者如他的表44中所提出的热带国家对其他地区的收支与其他地区对热带国家的收支之差。)

对热带国家来说,这些运输开支为:对英国110,对欧洲350(或者对全欧洲460),对新移民地区100,对美国310(或者这最后两者合在一起为410)。这等于热带国家进出商品运输费为8.7亿美元,这个数额应与热带国家对这些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14.5亿美元商品出口盈余相比较。但是要作出所有不发达国家运输开支的估计,我们还必须计算并加上阿根廷、中国和其他亚洲大陆,以及北非对英国、欧洲、美国及其他地区贸易中的运输开支。阿根廷的运输开支是:对全欧253,对美国31,或者总共280以上。中国和亚洲大陆的运输开支为:对全欧120,对美国57,但是由于其亚洲内部贸易的重要性(这些贸易肯定也靠欧洲船只运输),我必须再计算其费用为70,这加起来总数为247,或者接近250。北非,我们只计算了它对欧贸易的运输费用26。总结起来,阿根廷280,中国包括亚洲大陆加北非为270,或者说,这些“非热带”不发达地区共约550。把这些加上

热带地区的运输开支 870，我们得到所有不发达国家对其他地区的运输开支（但不包括不发达国家自身之间，除了中国——亚洲）为 13.2 亿美元，还有商品出口盈余 14.9 亿（或 18.1 亿）美元。

计算运输费用，还显露了另一个特点：典型的是，不发达国家出口货物的运输费用要大大高于宗主国出口货物以及不发达国家进口货物的运输费用。因此，例如，阿根廷向欧洲出口的货187 物的运输费用为 189，而阿根廷从欧洲进口的货物的运输费用为 64。无疑，这主要是因为阿根廷出口更大、更多的货物给欧洲（与它从欧洲进口相比）。但是，中国对欧洲有出口赤字而且并不出口这种重货，然而它还得支付其出口运输费 80（和它从欧洲进口的运输费 40 形成对照）。所以，有很大理由相信不发达国家也是其出口蒙受歧视性货运费的受害者。

所有这些估计无疑是很粗略的，而且只以单一年份 1928 年为基础（虽然在下面我们将观察其他数据，它们涉及一些特定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印度的较早年份）。这些估计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尚很粗糙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都指的是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或者在海洋运输的事例中则指它们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数据使我们无法分清这些地理区划内的外国（通常是宗主国）生产，特别是在不发达地区内。同样地，这些数据使我们无法区分这些地区或国家内的外国生产与本国生产（或外国贸易与本国贸易），或者确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希尔格特作了一项局部的有关观察。“在热带国家内部，……有一个复杂的贸易关系网。因此，1928 年，荷属西印度群岛对印度的出口余额为 4,400 万美元，对英属马来亚为 8,000 万美元，而上述两个后者对若干热带国家（如巴西和古巴）有出口余额——主要是麻袋，而巴西和古巴则对美国是净出口国。……这一切都证明图

6所示热带地区对美国的出口余额部分地却是源自各个热带国家转移链条上的第二环(部分地甚至是第三环)。"(国联,79)这也证明,它们的许多生产乍一看可能像是相互间的供应,而实际上却是为宗主国生产的——而且往往通过宗主国水平结合和垂直结合的垄断而使各不发达(和发达)国家间的产品和贸易适应宗主国自身的特殊需要。(不发达国家的出口盈余,不论按市场价格或实际价值,都是低估了的,因为一旦进口品进入这些国家,统计就把相应的进口列入这些国家,而在实体上和地理上及许多场合下,这些货物甚至仅仅是被认定为这些国家的人们所购买。但是许多进口品——特别在殖民地不发达国家里——只是表面上供这些国家的经济或人民,而实际上是被宗主国外国人所购买的,他们在殖民地国土上为宗主国的企业和目的而活动。如果将这些表里的进口品从殖民地国家的进口统计中扣除,它们的进口将大大缩小,而它们的出口盈余则会相应更大。把不发达国家中外国公司的出口从这些国家的总出口中扣除,这并不"类似地"正确,因为这些出口品实际上是由不发达国家的劳工以及资本所生产的,而外国公司和许多本国公司的进口品并不有利于本地经济或人民。) 188

这个体系的发展是和英国对外投资的增长及其服务收益相关的,这是希尔格特所强调的。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投资从1816年的大约1,000万英镑,上升到1870—1874年的大约7亿—10亿英镑,再升至1913年的大约40亿英镑(索尔,10,67)。但是由于商品出口在这整个时期中为赤字,而且日益增加,索尔认为这时期中较早时"只有航运收益的上升以及其他对外服务才使得投资成为可能。"(索尔,10)后来,"英国没有利用一笔新储蓄的盈余来进行海外投资——这笔盈余是通过出口和无形服务赚来的——而是以过去贷款的部分收益进行简单再投资。这是在

1874年以后最令人注目地进行的，当时进口开始很快上升，只是到后来很不寻常的年代中资本新流出才超过了利息收入"(索尔,67)。霍尔珀林·唐伊提出，这是硬币的另一面，即使在这个时期的早些时候，英国也使拉丁美洲吸收越来越多的英国制成品，其办法就是把它在拉美商业服务中的部分收益在当地进行再投资，这比起后来的投资收益更为"无形"，虽然这种商业活动的垄断控制对于当代拉丁美洲或印第安人已并非不明显。简言之，不论这扇形展开多大(希尔格特的用语)，它的结构都是极为稳定的——而且现在仍然稳定，即使美国自1928年以来可能已经改变了它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不发达国家在一个多世纪中在这体系中一直处于相同的地位。只是它们改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之所处地位的能力已经改变——现在比当时已更加不可能了。

189

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对宗主国积累与海外投资的资本贡献

希尔格特和康德利夫的环流图(虽很形象有用)以及康德利夫对这一体系的描述——"一个环形，最后为英国对热带地区出口多于进口"这至少对一个重要方面模糊多于澄清：不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确，在1928年，热带地区(表5，栏12)从英国(第1行)有进口盈余+2亿美元。但是这仍然使它们存在总出口盈余=进口赤字-14.5亿美元。如果阿根廷(栏13)对英国(第1行)的出口盈余-1.5亿美元加到热带地区(不论中国与北非是否也加进来)而计入不发达国家(栏16和/或栏17)，那么从英国的进口盈余就缩小到+4,000万美元(或者，加上中国与北非，则为+5,000万美元。因此，这个环形真正"关闭"的程度不论如何衡量都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这个贸易收支与多边结算体系与其称为一个“环形”,不如喻为一个链条或一个根数,情况如下:

地　区	对以下地区有出口盈余/进口赤字	对以下地区有出口赤字/进口盈余
英国	无	欧洲,自治领,美国,不发达地区
欧洲	英国	自治领,美国,不发达地区
自治领	英国,欧洲	美国,不发达地区
美国	英国,欧洲,自治领	不发达地区
不发达地区	英国,欧洲,自治领,美国,(所有地区)	无
[或者更为简单]		
全欧洲(英国与欧洲)	无	美国与自治领,不发达地区
美国与自治领	全欧洲	不发达地区
不发达地区	全欧洲,美国与自治领(所有地区)	无

190

这就是说,事实上,即使以世界市场价格来衡量(如果按实际价值估计,则尤其如此),世界上不发达地区也通过其商品出口多于商品进口而实际上直接间接地资助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具体来说,不发达国家的出口盈余(1)供应了欧洲的过度商品消费,表现为后者的商品出口赤字或进口盈余,(2)帮助资助了美国与各自治领对欧洲的出口盈余,(3)帮助了欧洲的国内投资与发展,以及/或者(4)帮助了欧洲资助其对美国与自治领的投资,因此美国与自治领的发展加速,而不发达国家也资助了投入它们国内的许多“外国”投资,这却加速了它们的不发达。我

们将在下文对此详细讨论。

(1)欧洲的商品进口经常多于商品出口,这反映在1928年它的净出口赤字为+29亿美元上,所以它的过度消费主要是不发达国家所直接间接地供应的,这反映在它们的1928年商品出口盈余为-14.9亿美元(或-18.1亿美元)上。关于整个该时期并涉及早先年份,索尔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贸易格局的大轮廓是很清楚的。欧洲与北美迅速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扩大了它们从初级产品生产国购买原料和食品,除了英国为突出例外,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对初级产品生产国的国际收支上有大量赤字。……[英国]是最大的债权国,它从所谓‘无形’支付中取得很大的收入。”(索尔,45)在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些初级产品的过多出口——或不发达国家的过多进口及可投资资本——的主要来源无疑是亚洲。希尔格特写道:“作为热带产品供应国,热带亚洲——这一名称内我们包罗了印度、缅甸、锡兰以及‘东南亚’集团——比非洲与美洲热带地区加在一起更为重要。”(国联,1942,57)洛克伍德肯定了这同样的情况(1943,422),他补充说:“附带说一句,东南亚的出口盈余在世界国际收支网中起重要作用。这个地区满足了它对欧洲与英国在进口与投资收益方面的巨大净义务,大部分是通过运送橡胶与锡给美国,这反过来资助了美国向大西洋彼岸的出口。”

191

但所有这一切中最最重要的是印度。若干印度学者或研究印度的学者(见杜德,钱德拉)调查并估计了印度的资本“外流”,还观察到印度在大部分时期中不但有贸易收支盈余,而且甚至有国际收支盈余。S.B.索尔在他的已被摘引过的著作《英国海外贸易研究,1870—1914》中称(43):“我们的目的是更深入地推进国际联盟研究报告《世界贸易网》(该研究报告由希尔格特领

导,本书对此引用很多)中对于1914年以前世界贸易结算特点的分析。虽然如他的书名所指的,索尔集中于英国及其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盈余,他仍设法把后者归因于其最重要的来源:印度。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从1857至1913年间印度从未输入足够多的资本来使它有商品进口超过出口的盈余。"(204—205)索尔接着说:

> 印度的贸易对于世界贸易收支格局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谈也不会过分。一方面,它大量消费来自英国的棉布和其他出口品以及各种无形服务,另一方面,它的多种出口贸易(制成品,原料,食品)使它轻易地进入所有大工业国的市场。……在1880—1883年间,印度提供给英国几乎1,100万英镑的贸易盈余来帮助结算英国在欧洲的赤字。在其后的15年间,这一余额按英镑计算上升很少,而按卢比计算则几乎翻了一番,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此数迅速扩大,到战前时期末已经超过5,000万英镑。此外,必须记得,在后来这些年份中,从英国再出口印度产品平均远超过1,100万英镑。假定大部分这些再出口流向欧洲和北美,看来印度从这些国家的真正收益应该也在5,000万英镑左右。但是在这类分析中,我们必须考虑到很重要的服务开支和资本运动。我们的计算(在第三章附录中)把1910年的这些数额定在2,500万英镑至3,000万英镑之间,该年 192
> 的负投资净额约为900万英镑。(203—204)

> ……印度[1919年]的总盈余应该大致为2,500万英镑,还有6,500万英镑将从世界其他地区的无形收入中取得。……情况是,英国通过印度结算它对欧洲与美国赤字

的1/3以上。所有南美洲国家显然作出了第二大的贡献，虽然土耳其和日本，仅次于印度，是最重要的赤字国。我们在这里没有扣除资本流出。……对国际收支的净影响是增加对美国的赤字和减少对南美洲国家的信贷余额。(56)

……把从锡兰和海峡移民区进口的初级产品再出口，对英国结算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方面或许最为突出的是出现了对英属西非殖民地的一种重大的贸易方式。这些地区的出口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开始显著地扩大。……所以，这些殖民地在1913年对欧洲大陆有300万英镑以上的出口盈余，这是多边结算的一个重要的新来源，随着时间的推进，这对英国越来越重要。西印度群岛也是这样，尽管它们几乎被英国所忽视，却也产生了有益的盈余。……所有这些贸易方式是很有力的；各国经济的变化促成了这些现象，而且不断发展并改变着世界贸易结构。加拿大出现巨大赤字是战前时期最惊人的发展。(227—228)

……英国整个收支格局的关键在印度，印度可能提供了英国赤字总额2/5以上的资金。截止1911年3月31日年度的印度贸易与黄金收益使它对英帝国其余部分有1,580万英镑的出口盈余，对外国有4,860万英镑。仅仅从欧洲，它就赚到3,000万英镑以上，从中国和香港1,000万英镑，从日本和美国各将近700万英镑。但这并非全部，因为英国的国际收支主要通过印度而找到了对一个资本输出大国至为重要的灵活性。1910—1913年期间，对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的国际收支大大不利于英国。有了若干有利

的抵消性变化……但大部分负担压在了印度身上。……(对印度)的国际收支一定对英国有利，为数至少 1,200 万英镑。这个印度安全阀从其他观点看也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正是通过它同印度的联系，英国才能幸免于关税壁垒的打击。印度的市场向英国货敞开，而印度出口品则为英国战胜关税。……因此，虽然英国取得印度出口的份额少于英帝国的其他部分，这却适合于世界结算方式所应做的。多边体系总体上对英国经济的价值十分巨大。……(索尔，62—63)

(2)不发达国家的出口盈余也从物质上直接间接地作出贡献，使美国和各自治领能自行输出更多的商品去欧洲，以上的一些考虑中已提出了这一点。回到我们的表 5，我们可以注意到，甚至在 1928 年，当时阿根廷对美国有出口赤字 1.1 亿美元；不发达国家对美国有出口盈余 6.1 亿美元(栏 16，第 10 行)，对各自治领有出口盈余 5,000 万美元(栏 16，第 9 行)，两者加在一起总共为 6.6 亿美元。这几乎相等于美国和各自治领对欧洲出口盈余的一半。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和各自治领能够对欧洲出口多于进口而对自己牺牲较小，因为它们几乎一半多的出口是由不发达国家供应的，因此可以说不发达国家是美国和各自治领半数出口盈余的最终供应者。这样牺牲它们自己的产品去资助美国的出口盈余，当然不会有任何人补偿不发达国家，因为它们不像美国，它们对谁都没有出口赤字。

索尔提供了一些额外的细节："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美国……对欧洲多出口很多，并几乎从其他各地多进口。……此后，对印度、锡兰、巴西、西非和海峡移民区的贸易逆差增加很 194

快。[问题的另一面是]美国通过这一个顺差解决了几乎它所有的贸易与劳务赤字。"(索尔,45,48,47)

(3)不发达国家的商品出口盈余可能与国内投资和生产性消费有关,这在欧洲和英国扩大了国内市场并推动了经济发展。曼德尔等人把欧洲的资本输入联系到欧洲与英国在十八世纪的工业资本储存,这对于十九世纪也适用。我们已经观察到,英国自身的海外投资主要从国外收益中筹措资金,而不是靠自己的商品出口,因为英国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有着经常的、不断增加的商品出口赤字或进口盈余。比较一下已经摘引过的英国商品进口盈余的增长曲线:从1816年的1,000万英镑到1913年的1.4亿英镑(巴勒特—布朗,75),可以很有趣地看到——虽然巴勒特—布朗本人没有这样做——它在数额上和时间上几乎亦步亦趋地和英国国内投资相一致,这是在以各种新的解释进行衡量(凯恩克罗斯,表46),而且这只涉及贸易项目,没有涉及劳务项目。

(4)更加有意思的是研究不发达国家对欧洲出口盈余和欧洲对美国与白人移民自治领投资之间关系的一些深入方面。作为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公开驳斥,常有人提出——最近最为令人注意的是菲尔德豪斯提出——在十九世纪晚期,欧洲与英国对外投资的最大部分不是投在殖民地国家即现在的不发达国家,而是投在美国和各自治领,尽管事实上列宁自己已经对此特别提到了(《帝国主义论》第497页,以及其他地方)。但是,鉴于通过商品贸易不平衡和多边结算的资本流动,这种观察——远没有使殖民地不发达国家与这一进程相对无关——实际上要求研究不发达国家及其出口对欧洲对外投资的密切关系(欧洲对外投资没有投在不发达国家而是投在其他地方)。遗憾的是,这一任务也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和我们目前的能力。索尔确实哀叹

195

得对："这种资本的转移机制提出了既难解又诱人的问题。……就很大程度来说，我们缺乏对这种机制的认识可以归因于巨大的困难。……对这一主题的专门研究数量仍然很少。……"（索尔，68）

除了观察印度对英国的资金贡献以外，可以提出，不发达国家通过它们的商品出口盈余对英国的海外投资作出了重要的、直接的资金贡献。沃伊廷斯基报告称(199)：

> 在今年(1913)，英国出口了价值6.35亿英镑的商品，进口总额为7.69亿英镑。此外，它输入了价值2,400万英镑的黄金，因此在商品与黄金流动中有1.58亿英镑的进口盈余。为了抵消这项赤字，英国有总额达1.29亿英镑的项目（商船收益9,400万英镑，商人佣金收益2,500万英镑，其他收益1,000万英镑）。因此，英国有赤字2,900万英镑，除了它海外投资的利益与红利（总额达2.1亿英镑）。这一项目加上其他的"无形"出口扭转了英国的国际收支，使之有利于英国，净盈余为1.81亿英镑。从理论上讲，英国可以用这余额来增加商品进口而仍使国际收支保持平衡。实际上，它把这笔整个净余额留在海外作为新投资。事实上，在1913年，伦敦提供给殖民地公司和外国公司1.98亿英镑的长期贷款——几乎恰恰是过去海外投资的当前利润总额。

英国在1913年的这笔大约2亿英镑的再投资可以与不发达国家的商品出口盈余相对照。根据同一资料，1913年，英国自身对世界其余地区有商品（包括黄金）出口赤字＝进口盈余1.58亿英镑。但是希尔格特的研究说明，我们的表格提出，这

许多出口的最终来源是不发达国家，它们实际上不但为它们自己而且为所有其他地区的出口盈余"提供了资金"。1913年世界商品总出口约为200亿美元，1928年约为320亿美元(如上摘引)；那就是说，1913年约为1928年的4/7。如果我们设想不发达国家1913年的商品出口盈余对1928年的比例相当于同年份的世界出口总额，那么，我们表上1928年不发达国家的-14.9亿美元出口盈余和英国+14.3亿美元的出口赤字，可以减少(按4/7的系数)到1913年的大体分别为-8.52亿美元和-8.16亿美元，而不发达国家的运输开支从13.2亿美元减少到大约8亿美元。把这些美元值换算成英镑，除以5(1英镑等于4.80美元)，我们可以得到不发达国家1913年商品出口盈余大约为1.78亿英镑，英国的商品进口盈余大约为1.7亿英镑。(使用表6和表7中的贸易收支估计数，那么1913年的英国进口盈余则为6.52亿美元或3.74亿美元，表7中的不发达国家的出口盈余为6.4亿美元。)假如使用大体的、既有的估计程序，1913年记录的(或报告的)进口盈余额为1.58亿英镑，而我们对同一年份的估计则为1.68亿英镑，颇为相似。那么，或许我们也可以有理由提出不发达国家商品出口盈余估计为1.78亿英镑，它足够供应——即使因世界市场价格而降低定值——几乎所有的实际商品转移而使英国2亿英镑的金融再投资转为实际投资。

不管这样估计不发达国家对欧洲对外投资的直接贡献是否合适，它们通过在贸易盈余链上和国际结算体系中所占的特殊地位，无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索尔指出："美国和阿根廷在较早时期为在英国的外国借贷国中所处的地位而自豪。"然后指出："从70年代中期以后，在英帝国内进行投资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原因何在。"(索尔，67)就1913年而言，索尔

计算(67,在佩什以后)对英帝国的投资约为17.8亿英镑,而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投资为20亿英镑。如果我们在前者中抽出印度而代之以后者中的美国,以便把它们重新汇集进美国与各自治领和不发达国家(包括非俄国的欧洲1.1亿英镑),这两个集团的总数大体正好倒过来。但索尔在其他的报告称(218—219):"向英帝国的出口相对滞后,这种趋势使帝国主义颇感不安,特别是1900年以后在英帝国的投资又如此巨大。……显然同英帝国没有那么多贸易,而是同南美和远东国家的贸易,它们起来取代了美国先前保持的地位。" 197

到1928—1930,英国投资的分布有了更多的变化。希尔格特报告称:

> 多边贸易对英国商业关系的影响可以通过比较当前"无形"项目收入的地理分布与这种收入赖以转移的商品进口余额的地理分布来加以研究。……最大的进口余额是对美国和欧洲,英国在那里的投资相对较小;而对热带地区和某些英国自治领则有出口余额,英国在那里的投资巨大。在图7中[该图由希尔格特绘制,不包括在本书内,该图表明英国海外投资与英国进口余额之间的明显反比关系。]……把这种贸易余额的分布趋势突出地加以图示,其分布方式同初看的印象大相径庭。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在于商品贸易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商品需求以及可以满足这一需求的地方,而不是取决于它们的金融要求。英国资本一直积极地在世界各地发展初等教育(原文如此,疑为"初级产品"——译注),以供在世界市场上而不仅是在英国处置;……这些国家的出口盈余主要代表英国资本的收益,因而是在同某些国家的贸易中出现的,这些国家通过向英国

> 多出口来取得它们进口初级产品的资金。英国资本这样就不但推动了它所投资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推动了这些资本收益通过它们而转移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国联，82—83，重点是我们定的。）

我们不能不同意这些多边关系是重要的，正如希尔格特所表明的。但是我们必须论辩：对这些证据加以更现实的研讨，能得出与希尔格特相反的结论。第一，"英国"投在海外的资本的历史来源首要的是现在的不发达国家而不是英国自己，这是希尔格特自己在其他地方曾局部承认的，也是索尔所强调的。第二，我们现在认识到，这种资本的对外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并非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国家，它们首先提供了这些资本，然后又得到了它的一部分作为"外国"投资（即外国所拥有的投资），而在这些国家里，这些投资及其整个过程又推动了不发达的发展。第三，对经济发展的推动首先是在这些资本收益藉以转移的那些国家，那就是美国和各自治领。第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不发达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盈余促成了"这些资本的收益"以及美国和各自治领的发展，更不用说欧洲本身了。

198

索尔提供了一些其他证据可以支持我们的论点："事实上，英国发现难以对美国充分扩大出口以便在当代任何时候直接把资本转移到自己这里。……在阿根廷，我们将看到相当大的多边转移仍然是必要的。……法国的资本货工业不如英国发达，不得不间接转移其大部分投资。"（索尔，70）"例如，英国在加拿大的大量投资，被用于从美国进口提供资金，而美国是加拿大正规的资本货供应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间接结算开始变得十分明显。……这里的间接结算

只能由英国、印度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间接结算加以比拟(索尔,70,186)。但是,这两大投资与贸易三角之间并非没有关联,因为既然英国在它们中均占有一角,英国就把这些三角相互连结起来。而这整个复杂结构的基础是印度和世界其余地区的一部分。“一部分解释清楚地表明在于英国通过印度进行的大量多边结算”(索尔的话摘自其原稿第 88 页)。当然,另一部分也在于在某些年份中英国“是印度和世界大部分其余地区的资本的净输入国。”索尔在同一段的开头(第 87 页)也指出这一点。最后,我们可以再回顾索尔的观察:“如果英国的出口品没有在印度找到门户大开的市场的话,……它就不可能对美洲大陆与其他地方如此大量的投资。”(索尔,88)当然,世界各个部分都相互联结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和发展之中,但只有现在的不发达国家处于最底层。不发达国家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偏向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多边平衡功能是在商业周期中减弱波动的,特别是缓和中心国家的衰退。这个问题在本书作者的著作《世界积累,1492—1784》和即将出版的《当代世界危机》中作了论述。 199

三、统计与方法论附录

表 5 总结了下述计算:希尔格特的图 6 总结了他的表 44 中各地区(不包括地区 6,“世界其余地区”)之间在 1928 年的进、出口余额。康德利夫则简化了希尔格特的图表,只包括进口余额。希尔格特(国联,77)称,这两类余额之间的不同是“进口余额超过出口余额,主要由于进口与出口国家疆界之间的运输”,认为进口余额之所以较大,是因为包括了进口商品的运输费用,而出口余额则不包括出口商品的运输费用。所以,康德利夫在使用进口余额时不但列出商品项目的净余额,而且也列出运输

服务项目的数字。然而，希尔格特计算他的“地区A出口余额时，从地区A从别地区的进口中减去地区A向各其他地区的出口”（或反之，这取决于何者更大）。但是，由于这些进口也包含一项运输的内容，希尔格特的“出口”余额也不是纯粹的商品项目，而至少包含输入商品的运输费用（而“进口”余额则包含输出与输入商品的运输费用）。

为了更好地反映纯粹的商品贸易余额（并在后来把它们同不发达国家也付给宗主国的运输服务相比较），我们所以重新计算了希尔格特原始数据中地区A的出口余额，而从地区B向地区A的出口中减去地区A向地区B的出口（或反之，这取决于何者更大），是因为后者不包括从B向A的运输费用，正如希尔格特用以计算他的余额的A从B的进口。这是附表中的数据同希尔格特的表44、他的图6或康德利夫的图表之间的第一个不同。（我们还不包括每个地区内的余额——来自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而希尔格特的图6中也不包括，但包括在表44中每个地区净余额总数的计算之中。）我们在计算方面的改变降低了宗主国的出口赤字，增加了热带国家的出口盈余，这是与希尔格特的数字相比较，但更好地反映了它们之间实际贸易不平衡的结构与运作。

可是，对于“次要”地区（除了阿根廷已作为上述“主要”地区处理），那就是苏联、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大陆，以及北非，分别见3、4、14、15栏，我们使用了它们在附录Ⅲ“世界贸易，按始发国与终点国”各表中出现的进出口数据。对次要地区改变计算方法的原因如下：因为附录Ⅲ的各表如同希尔格特著作中的所有其他表格一样，是根据各个国家的进口与出口构建起来的，计算它们之间的差额，比起寻找对每个国家的出口（进口减去运输费用，等等）都要从每个国家的贸易伙伴的出口统计中去寻找这

200

些数字来，要容易和省时得多。对次要地区省时间是合理的，因考虑到它们在世界贸易总额及其不平衡情况中的份额非常小，使用它们的进口数代替向它们的出口数所出现的不精确问题，相对而言应是微不足道的，特别因为余额反正都要四舍五入到最邻近的1,000万美元。而且，审察附Ⅲ对于从一国向另一国的出口数据，以及第2国从第1国的进口数据（例如在中国与北非之间）会显示一些不一致（或误印），它有时也与总计或小计贸易数字有矛盾。在这类事例中，估计余额时首先消除矛盾之处，如果这还不足以使两国的贸易数字相互验证，那就把不一致的数字取其平均数，然后四舍五入归于最邻近的1,000万美元。 201
另一方面，阿根廷既被作为主要地区处理，那就计算阿根廷向其他地区出口和其他地区向阿根廷出口之间的余额。

我们不能指望在这里澄清它们的地位，但为了完成世界贸易的循环及其不平衡性，我们将把这些国家归入其他5个地区并发挥我们最佳的判断力，来决定它们最合理地适合于何处。相应地，看到俄国（第3栏）的地位处于新近移民地区与欧洲大陆（第2栏）之间，我们就把它归入后者（第2+3+4=5栏），即第5栏“全欧洲大陆（与日本）”，然后是第6栏“全欧洲”，因为如同欧洲、美国和各自治领，苏联在1928年是从不发达国家的净进口国，而且虽然它如同各自治领也是从美国的进口国，它也从欧洲其他地区进口。日本的情况（第4栏）就更为可疑了，但我们也把它加在欧洲，故第5栏为“全欧洲大陆、苏联与日本”，第6栏为“全欧洲、苏联与日本”。虽然日本从欧洲有进口盈余，但它也像欧洲一样，即使在1928年也从不发达国家有更大的进口盈余。中国和其他非热带亚洲大陆（第14栏，不包括南亚与东南亚）以及北非（第15栏）加进了“热带地区”（第12栏，包括南亚与东南亚）和阿根廷（第13栏），组成“不发达”地区（第16

表 5　1928 年世界五个主要地区和五个次要地区相互间的商品出口赤字＝进口盈余(＋)以及商品出口盈余＝进口赤字(－)　202

(百万现值美元)

贸易与对象	美国 1	欧洲大陆 2	苏联 3	日本 4	全欧洲大陆 (2+3+4) 5	全欧洲 (1+2+3+4) 6	新近移民地区 7	阿根廷 8
1. 英国	×	－730	－60	＋60	－730	－730	－260	－150
2. 欧洲大陆	＋730	×	－30	＋50	－20	＋750	－820	－300
3. 苏联	＋60	＋30	×	－10	＋20	＋80	－50	－20
4. 日本	－60	50	＋10	×	－40	－100	－60	0
5. 全"欧洲大陆"	＋730	＋20	＋20	－40	－730	×	－930	－320
6. 全欧洲	＋730	－750	－80	＋100	－730	×	－1,190	－470
7. 新近移民地区	＋260	＋820	＋50	＋60	＋930	＋1,190	×	×
8. 阿根廷(减去)	＋150	＋300	＋20	0	＋320	＋470	×	×
9. 自治领	＋110	＋520	＋30	－60	＋610	＋720	×	×
10. 美国	＋630	＋740	＋70	－90	＋720	＋1,350	＋640	＋110
11. 美国，自治领	＋740	＋1,260	＋100	－30	＋1,330	＋2,070	＋640	＋110
12. 热带地区	－200	＋510	＋40	＋150	＋700	＋500	＋60	0
13. 阿根廷(加上)	＋150	＋300	＋20	0	＋320	＋470	×	×
14. 中国	－50	－30	＋20	－50	－60	－110	－10	0
15. 北非	＋60	－100	＋10	0	－90	－30	0	0
16. 不发达地区	－40	＋680	＋90	＋100	＋870	＋830	＋50	0
17.(不发达地区，中国，北非)	(－50)	(＋810)	(＋60)	(＋150)		(＋970)	(＋60)	0
18.(总计)	(＋1,420)	(＋1,320)	(＋80)	(＋220)		(＋3,040)	(－490)	(－360)
19. 总计	＋1,430	＋1,190	＋110	＋170	＋1,470	＋2,900	－500	－360

表 5(续)

	自治领 (7-8)	美国	美国+自治领 (9+10)	热带地区	阿根廷	中国	北非	不发达地区 (12+13+14+15)	不发达地区 (12+13)	总计 (与17)	总计 (与16)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	-110	-630	-740	+200	-150	+50	-60	+40	+50	-1,420	-1,430
2.	-520	-740	-1,260	-510	-300	+30	+100	-680	(-810)	(-1,320)	-1,190
3.	-30	-70	-100	-40	-20	-20	10	-90	(-60)	(-80)	-110
4.	-60	+90	+30	-150	0	+50	0	-100	(-150)	(-220)	-170
5.	-610	-720	-1,330	-700	-320	-60	-90	670			1,470
6.	-720	-1,350	-2,070	-500	-470	+110	+30	-830	(-970)	(-3,010)	-2,900
7.	×	-640	-640	-60	0	+10	0	-50	(-60)	(+490)	+500
8.	×	-110	-110	0	×	0	0	0	(0)	(+360)	+360
9.	×	-530	-530	-60	0	+10	0	-50	(-60)	(+130)	+140
10.	+530	×	+530	-780	+110	+60	0	-610	(-670)	(+1,200)	+1,270
11.	+530	-530	×	-840	+110	+70	0	-660	(-730)	(+1,340)	+1,410
12.	+60	+780	+840	×	0	+100	+10	+110	(+1,340)	(+1,340)	+1,450
13.	×	-110	-110	0	×	0	0	0	0	(+360)	+360
14.	-10	-60	70	-100	0	×	-20	-120	(-100)	(-280)	-300
15.	0	0	0	-10	0	+20	×	+10	(-10)	(-40)	-20
16.	+50	+610	+660	-110	0	+120	-10	×	(-110)	(+1,380)	+1,490
17.	(+60)	(+670)	(+730)	0×	0	(+100)	(+10)	(+110)	×	(1,810)	×
18.	(-130)	(-1,210)	(-1,340)	(-1,340)	(-360)	(-280)	(-40)	(-1,380)	(-1,810)	×	×
19.	-140	-1,270	-1,410	-1,450	-360	+300	+20	-1,490	×	×	×

表 5(续)

来源:国际联盟(福克·希尔格特),《世界贸易网》,日内瓦,1942。

余额计算法:输出离岸价出口品,减去收到的出口品(=进口品减去运费+保险),按来源与注解所规定的在地区间以四舍五入并入 1000 万美元,以下注明者除外。

注解:栏/行类别按以下详细说明的来源作出或构成。表列数字仅为经过四舍五入的进、出出口品的余额(除去以下的 3、4、14、15 栏),数字来自资料来源表 44 及其附录Ⅱ"世界贸易,按始发国与终点国",第 106—171 页。1—17 地区参考 3 资料来源在第 11—13 页所规定的内容并由资料来源在第 76 页上重新组合成 A－F 地区。

栏/行:

1. 地区 E=地区 16(主要为英国与爱尔兰)
2. 地区 D=地区 14+15(工业与非工业欧洲)
3. 地区 13(苏联)=地区 F 的一部分(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与进口数据中不一致者取其平均数
4. 地区 12(日本,朝鲜,台湾)=地区 F 的一部分;出口与进口数据中不一致者取其平均数
5. 栏 2,3,4 总和(全　欧洲大陆　,包括苏联与日本)
6. 栏 1,2,3 总和－1－5(全欧洲,苏联与日本)
7. 地区 C=地区 2,4,8,17(新近移民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英国自治领+阿根廷,等)
8. 地区 8(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福克兰群岛)
9. 栏 7 减栏 8 之差(=自治领－新近移民地区减去阿根廷等)
10. 地区 B=地区 5(美国)
11. 栏 9+栏 10 总和(美国+自治领)
12. 地区 A=地区 3,6,7,9,10(撒哈拉以南非洲,除去南非;拉丁美洲,除去地区 8+阿根廷;南亚=印度,缅甸,锡兰;东南亚)
13. 同栏 8
14. 地区 12(中国与其他亚洲大陆国家,除去印度,缅甸、锡兰=主要是中国=地区 F"世界其余地区"的一部分);出口与进口数据中不一致者取其平均数
15. 地区 1(北非=地区 F　世界其余地区　的一部分);出口与进口数据中不一致者取其平均数
16. 栏 12,13,14,15 总和(不发达国家)
17. 栏 12,13 总和,即 16 减 14+15(不发达国家,不包括中国与北非=热带地区－阿根廷)
18. 栏 1,2,3,4,9,10(=6+11)加 12,13(=17)的算术总计
19. 栏 1,2,3,4,9,10(=6+11)加 12,13,14,15(=16)的算术总计

栏)。但是中国与北非及其他不发达国家不同，在它们对欧贸易中以及实际上对全世界贸易中，出现进口盈余或出口赤字。现在尚不清楚这种异常(至少对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殊的进出口价格差别或运输费用。因此，这个剩余类别“世界其余地区”的缩小以及把中国和北非包括进不发达国家内，显著地降低了后者的出口盈余——进口赤字，比较一下包括这些国家的16、19栏一行，与中国和北非不包括在不发达国家和整个世界的17、18栏一行，就可以观察到这一点。

整个来说，出口赤字＝进口盈余或过量(例如欧洲进口更多商品，超过它以商品出口的支付)，用＋号表示，以强调“取”多于“给”，而出口盈余—进口赤字常规称为“逆差”赤字(例如不发达国家出口更多商品，超过它们得到的商品进口)用－号表示，以强调“给”多于“取”，常规用语称为贸易“顺差”。 205

希尔格特(和康德利夫)把世界贸易分列入主要地区——英国、欧洲大陆、新近移民地区、美国、热带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这大部分保留了，但在两方面作了些修改。阿根廷(第8栏，包括乌拉圭、巴拉圭和福克兰群岛)移出“新近移民地区”(第7栏)，使英属自治领“地区”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虽然南非保留在这一“地区，”其准确性也可怀疑，但它的贸易份额较少，而且其出口货币黄金的意义复杂，似乎根据现有目的不宜把它分出去。

虽然用这种方式计算的自治领贸易余额(第9栏)和美国贸易余额(第10栏)——开始是分别考虑的，正如希尔格特和康德利夫所做的那样，但在这里把它们最终加到一起作为第11栏“美国与自治领”类。阿根廷调换到第13栏，以便最终加到“热带地区”(第12栏)及其他国家，形成第16栏(以及第17栏)的“不发达”地区。

对希尔格特分组的另一点重大修改是分割他的剩余地区F组"世界其余地区",放到其他的地区去。希尔格特自己制造了这个"地区"或"组",占世界贸易的大约10%,因为它的组成成分不能很好列入其余90%贸易余额的格局。他解释称,"应当就F组说几句,这组包括苏联、北非以及非热带的亚洲,没有在[希尔格特关于贸易流动的]图6中表明。苏联从热带地区、美国和新近移民地区多进口,向欧洲大陆和非大陆欧洲多出口,显然进入了C组与D组之间[新近移民地区和欧洲大陆]。F组中剩下的国家地位如何就不太清楚了。……"(国联,1942,83)

关于1928年以前的时期,即1876至1913年之间的若干年份,我们在表6与表7中提供了更多不完全的和不精确的贸易余额数

206 据。希尔格特自己在他后来的《工业化与对外贸易》(国联,1945,100)一书中对1881—1885、1891—1895、1901—1905、以及1911—1913各年份的商品进口与出口余额作了一些估计。可是,这些数据只限于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其中大多数都已包罗在我们的表6中。我们保留了希尔格特以+号表示出口余额和以-号表示进口余额的标记。所以,美国日益增加的多进口也以+号表示。欧洲分别处理(第3—6行),整个"欧洲大陆"(第7行=第3—6行之和)与"西欧"(第8行=第2—6行之和)在他的表中的-号以后。美国出口多于进口同样在+号以后。

因为希尔格特在这项研究中感兴趣的是原料(R)与制成品(M)出口的相对扩大,特别是把后者的增长视为世界贸易扩大与工业化的一部分,余额(B)不是他提供的,而是由我们自己计算的。

208 表7总结并调整由更新的来源(耶茨,1959,226)所提供的1876—1880、1896—1900和1913年份的进出口数据,并对一些相似的商品出口赤字=进口盈余(+)和出口盈余=进口赤字

表 6　1881—1913 若干国家与年份商品进口(－)与出口(＋)余额

(年平均数,百万现值美元)

		1881—1883	1891—1895	1901—1905	1911—1913
1. 美国	R	+250	+197	+414	+343
	M	-142	-106	+41	+196
	B	+108	+91	+455	+536
2. 英国+爱尔兰	R	-1,262	-1,291	-1,567	-1,990
	M	+755	+657	+717	+1,338
	B	-507	-634	-850	-652
3. 德国	R	-332	-586	-879	-1,477
	M	+329	+357	+617	+1,158
	B	-3	229	-262	-319
4. 法国	R	-455	-393	-378	-788
	M	+220	+251	+338	+461
	B	-235	-142	-40	-327
5. 意大利	R	+21	-2	-46	-196
	M	-61	34	-15	-39
	B	-40	-36	-61	-235
6. 荷兰	R	-100	-101	-126	-252
	M	-3	+3	-33	-9
	B	-103	-98	-159	-261
7. "欧洲大陆"(B3、4、5、6之和)		-381	-505	-522	-1,142
8. "西欧"(B2、3、4、5、6之和)	B	-888	-1,139	-1,372	-1,794

来源:国际联盟(希尔格特),《工业化与对外贸易》,日内瓦,1945,第100页。
注释:R=原料,M=制成品,B=余额

表 7 1876—1913 世界各主要地区商品出口赤字＝进口盈余(+)与商品出口盈余＝进口赤字(−)

(单位:百万现值美元)

	1876—1880				1896—1900				1913			
	A 出口	B 进口	C 调整的进口	D 余额	A 出口	B 进口	C 调整的进口	D 余额	A 出口	B 进口	C 调整的进口	D 余额
1. 英国＋爱尔兰	982	1,587	−349	+367	1,230	2,011	1,770	+540	2,511	3,206	2,885	+374
2. 西北欧	1,920	2,250	+1,912	−8	2,990	3,585			6,402	7,717		
3. 其他欧洲	960	845			1,322	1,080			2,374	2,824		
4. 欧洲大陆(2+3)	2,880	3,095	2,630	−250	4,312	4,665	4,105	−207	8,776	10,541	9,487	+711
5. 美国与加拿大	700	520	442	−258	1,260	875	770	−490	2,836	2,431	2,180	−656
6. 不发达地区(亚、非、拉)与大洋洲	1,448	1,860	1,581	+133	1,890	2,260	1,989	+99	5,036	4,885	4,396	−640
7. 总计		7,062	6,010		8,693	9,811			19,139	21,123		
8. ×为进口的%			85%	−8			88%	+356			90%	−211

来源:保罗·拉马丁·耶茨《对外贸易四十年》(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公司,1959),第 226 页。

注释:进口调整为不包括运输费等,压缩到"相当于"出口,用每年的总出口对总进口(第 7+8 行)的百分比与地区数据相比。

(一)作出一些估计,虽然比表5中提出的1928年数字更为粗糙和不精确。由于这个来源提供了出口(A栏)与进口(B栏)数字,由于后者的总数每年都大大高于上述数字,由于每年的进口总数大大超过全世界出口总数,我们就把进口数据“压缩”到出口“相当数”(C),办法就是用每个时期的总出口—进口百分比(即分别为85%、88%和90%)与记录的进口相比,以便估计“调整的进口”(C),排除运输费等。送出的出口(A)与收入的出口(或调整的进口)(C)之间的余额就计算为每个时期的D栏。当然,这种程序过多压缩了运费较低的制成品进口和过少压缩了运费较高的原料进口。从原则上说,所有地区(D栏第8行)的正数和负数余额应抵消,总计为0。第一时期的情况几乎是这样的,但是第二和第三时期我们在数据和调整中有大约分别等于总出口的4%和1%的平衡误差。

耶茨的地区划分我们保留了,除了“西北”与“其他”欧洲(第2行,第3行)并入欧洲“大陆”(第4行)这一点类似于希尔格特——所以也与我们的1928年的表类似——而且第6行的头两个时期中也不包括大洋洲和南非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称它们为“不发达地区”)。

参考书目

（编著者姓名字头按汉语拼音次序排列）

A

阿布代尔—马利克，阿努瓦：《埃及：军事社会》

Abdel-Malek, Anouar. *Egypt: Military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阿吉拉尔，M.阿朗索：《拉丁美洲发展的理论与政策》

Aguilar, M. Alonso. *Teoría y política del desarrollo latinoamericano*. Mexico,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1967.

阿明，萨米尔：《世界规模的积累》

Amin, Samir. *L'accumulation à l'échelle mondiale*. Paris, Anthropos, 1970.

阿普特克，赫伯特：《美国革命，1763—1783》

Aptheker, Herber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0.

——《殖民地时代》

——*The Colonial Er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9.

阿里吉，乔瓦尼：《从历史角度看劳动力供应：对于罗得西亚的非洲农民无产阶级化的研究》，载阿里吉与索尔《非洲政治经济学论文集》

Arrighi, Giovanni. 'Labour Suppl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the African Peasantry in Rhodesia', in Arrighi, G., and Saul, J. S.,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私人通信，后改写为《不发达问题分析中的阶级结构与殖民地结构》，

载《青年评论》杂志

——Private Communication, subsequently rewritten for publication as 'Struttura di clase e struttura coloniale nell' analisi delsottosviluppo', *Giovane Critica*, 22—3, Milano, 1970; revised and enlarged version in *Problemi del Socialismo*, Roma, XIV, 10, luglioagosto, 1972.

阿什沃思,威廉:《1850年以来国际经济简史》

Ashworth, William. *A Short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ince 1850*. London, Longman, 1962, 2nd ed.

阿尔特萨诺,爱德华多·B.:《罗萨斯:人民民族主义的基础》

Artesano, Eduardo B. *Rosas: Bases del Nacionalismo Popular*. Buenos Aires, A. Peña Lillo (ed.) 1966.

B

巴伦,保罗:《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Baran, Pau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巴勒特—布朗,迈克尔:《帝国主义以后》

Barrat-Browne, Michael. *After Imperialism*. London, Heinemann, 1963.

巴蒂亚,B. M.:《印度的饥荒》

Bhatia, B. M. *Famines in India*. Bombay, Asia Publishers House, 1963.

拜罗奇,保罗:《工业革命与不发达》

Bairoch, Paul.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t sous-dévéloppement*. Paris, 1963.

贝利兹,克劳迪奥:《三腿桌》

Veliz, Claudio. 'La mesa de tres patas', *Desarrollo Económico*, Ⅲ, *no*. 1—2, April-Sept. 1963.

伯特伦,G. W.:《加拿大工业的经济增长,1870—1915),载伊斯特布鲁克与沃特金斯《加拿大经济史探讨》

Bertram, G. W. 'Economic Growth in Canadian Industry, 1870—1915', in Easterbrook, W. T., and M. H. Watkins. *Approaches to Canadian Eco-*

nomic History.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67.

伯恩鲍姆,诺曼:《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与韦伯》载尼尔·斯梅尔斯特编《经济社会学读物》

Birnbaum, Norman. 'The Rise of Capitalism: Marx and Weber', in Smelser, Neil J. (ed.), *Readings on Economic Sociolog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65.

波克,J.H.:《荷兰的印度人经济的结构》《二元社会的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Boeke, J. H. *The Structure of the Netherlands Indian Economy*.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2, and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of Dual Societies*.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3.

博克斯,佩勒姆·H:《巴拉圭战争的起源》,载《伊利诺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第XV卷第3期

Box, Pelham H. 'The Origins of the Paraguayan Wa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Urbana, vol. XV, no. 3, 1927.

布鲁切,斯图尔特:《关于殖民商人的资料与读物》

Bruchey, Stuart. *The Colonial Merchant. Sources and Reading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

——《1607—1861 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源:社会因果论》

—— *The Root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607—1861. *An Essay in Social Caus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布坎南,基思:《东南亚世界》

Buchanan, Keith. *The Southeast Asian World*.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68.

D

戴维森,巴兹尔:《非洲奴隶贸易,前殖民地史,1450—1850》

Davidson, Basil.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Precolonial History* 1450—1850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Black Mother*). Boston, Atlantic-Little Brown, 1961.

戴克,K.:《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

Dike, K.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迪恩,菲利斯与科尔,W.A.:《英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与结构,1688—1959》

Deane, Phyllis and Cole, W. A.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Trends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7, 2nd ed.

杜德,帕姆:《今日印度》

Dutt, R. Palme. *India Today*.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9.

多布,莫里斯:《资本主义发展研究》

Dobb, Maurice.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5, rev. ed.

多德,道格拉斯:《美国西部与南部经济发展的比较分析》,载《经济史杂志》第XVI期

Dowd, Douglas F.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merican West and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 December, 1956, excerpted in Harold D. Woodmaned., *Slavery and the Southern Economy, Sources and Reading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

E

恩格斯,弗里德里克:《德国的农民战争》

Engels, Frederick,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ed. including 'The Mark', 'On the History of the Prussian Peasantry', 'Decay of Feudalism and Rise of National States', and other manuscripts and letter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6.

F

费雷尔,阿尔多:《阿根廷经济》

Ferrer, Aldo. *The Argentine Econom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福克纳,哈罗德·安德伍德:《美国经济史》

Faulkner, Harold Underwood.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0, 8th ed.

弗洛雷斯卡诺,恩里克:《墨西哥的玉米价格与农业危机(1703—1810)》

Florescano, Enrique. *Precios del maiz y crisis agricolas en México* (1703—1810). Mexico, El Colegio de México, 1969.

弗兰克,安德烈·冈德:《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

Frank, Andre Gunder.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1969.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1.

——《墨西哥农业,1521--1630:生产方式的转变》

——*Mexican Agriculture* 1521—1630: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manuscript 196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 press. Spanish translation. Escuela Nacional de Antropologia e Historia, Mexico, 1976.

——《拉丁美洲:不发达还是革命》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论道尔顿的"经济人类学的理论问题"》

——'On Dalton's "Theoretical Issues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Ⅱ, no. Ⅰ, Feb. 1970.

——《流氓资产阶级与流氓式发展》

——*Lumpenbourgeoisie. Lumpen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世界积累,1492—1789》

——*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8.

——《对经济危机的反思》

——*Reflexions on the Economic Crisis*, Barcelona, Anagrama 1977 (in Span-

ish).
——《当代世界危机》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risis*, in preparation.
弗兰克尔,S.赫伯特:《非洲经济家长制的专制》
Frankel, S. Herbert. 'The Tyranny of Economic Paternalism in Africa', *Optima* (supplement), Dec. 1960.

G

盖勒,卢西奥:《1914年以前的阿根廷工业增长和适当可出口初级产品的理论》
Geller, Lucio. *El crecimiento industrial argentino hasta 1914 y la teoría del bien primario exportable*. Santiago, 1969 (mimeo).
高夫,凯瑟琳:《对人类学家们的新建议》
Gough, Kathleen 'New Proposals for Anthropologists' *Current Anthropology*, IX, no. 5, Dec. 1968. Revised as 'Anthropology: Child of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vol. 19, no. I, March 1968.
格尔茨,克利福德:《农业衰退,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的过程》
Geertz, Clifford.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格特,汉斯与米尔斯,C.赖特:《从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
Gerth, Hans, and Mills, C. Wright.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格雷,刘易斯·C.:《到1860年的美国南部农业史》
Gray, Lewis C.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 Gloucester, Mass., 1958, 2 vols.
格拉—桑切斯,拉米罗:《加勒比地区的糖与社会》
Guerra y Sánchez, Ramiro. *Sugar and Society in the Caribbe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original Spanish edition, Havana, 1927).
古尔德纳,阿尔文·W.:《西方社会学危机在来临中》

Gouldner, Alvin W.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国际联盟《工业化与对外贸易》、《世界贸易网》

League of Nations (Folke Hilgerdt).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eign Trade*, Geneva, 1945.

——(Folke Hilgerdt). *The Network of World Trade*. Geneva, 1942.

H

哈格里夫斯,J.D.:《西非:前法属国家》

Hargreaves, J. D. *West Africa: The Former French State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67.

哈洛,文森特:《巴巴多斯历史,1625—1685》

Harlow, Vincent. *A History of Barbados* 1625—1685.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26.

哈珀,劳伦斯·A.:《航海法对十三个殖民地的影响》,载哈里·N.沙伊贝尔编《美国经济史选读》

Harper, Lawrence A. 'The Effect of the Navigation Acts on the Thirteen Colonies', in Harry N. Scheiber(ed.), *United States Economic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New York, Alfred A. Knopt, 1964.

哈特威尔,R.M.:(编)《工业革命的原因》

Hartwell, R. M. (ed.).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1967.

——《工业革命的原因,谈方法论问题》,载 R.M.哈特威尔编《工业革命的原因》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 Essay in Methodology', in R.M. Hartwell(ed.),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1967.

汉密尔顿,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报告》

Hamilton, Alexander. *The Reports of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

Harpers, 1964(original editions 1790—91).
汉密尔顿,厄尔·J.:《美国的财富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500—1700)》
Hamilton,Earl J.'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惠尔赖特,E.L.:《澳大利亚与阿根廷比较研究》
Wheelwright,E. L.'Australia and Argentina: A Comparative Study',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Collected Essays*. Sidney,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ook Co., 1974.
霍尔珀林—唐伊,图利奥:《拉丁美洲当代史》
Halperin Donghi, Tulio.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de América Latina*.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69.
霍布斯鲍姆,E.J.:《革命的时代,1789—1848》
Hobsbawm,E. J.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Mentor, 1964.
——《列宁与"工人贵族"》
——'Lenin and the"Aristocracy of Labor"', *Monthly Review*, New York, XXI, no. Ⅱ, Apr. 1970.
霍夫曼,沃尔特·G:《工业经济社会的成长》
Hoffmann, Walter G.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Manchester,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8.

J

吉诺维斯,尤金:《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
Genovese, Euge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New York, Pantheon, 1965.
加贝尔,约瑟夫:《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一篇马克思主义讲话》
Gabel, Joseph. 'Une lecture marxiste de la sociologie religieuse de Max Weber',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Paris XLVI, Jan.-June 1969. Reprinted in José Sazbón, ed., *Presencia de Max Weber*. Buenos Aires, Nueva Visión, 1971.

剑桥欧洲经济史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金德尔伯格,查尔斯·P.:《贸易条件》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Terms of Trade*. New York Wiley, 1956.

K

卡兰德,盖伊·史蒂文斯:《美国经济史选集,1765—1860》

Callender, Guy Stevens. *Selections from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765—1860.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Reprints of Economic Classics 1965 (original od. 1911?).

卡普兰,马科斯:《拉丁美洲民族国家之形成》

Kaplan, Marcos. *Formación del Estado Nacional en America Latina* Santiago,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1969.

凯恩克罗斯,亚历山大·柯克兰:《本国与外国投资,1870—1913》

Cairncross, Alexander Kirkland. *H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1870—1913. New York, 1953.

康德利夫,J.B.:《各国商业》

Condliffe, J.B. *The Commerce of Nations*. New York, Norton, 1956.

考克斯,奥利弗:《作为一种制度的资本主义》

Cox, Oliver. *Capitalism as a Syste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4.

——《资本主义基础》

——*The Founda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克莱尔蒙特,弗里德里克:《经济自由主义与不发达,对一种思想解体的研究》

Clairmonte, Frederick.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e Disintegration of an Idea*.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0.

科茨沃思，约翰：《经济停滞阶段》

Coatsworth, John. *The Stages of Economic Stagnation*. Ann Arbor, Michigan, Radical Education Project, 1966 (mimeo).

科尔多瓦，阿曼多：《外国投资与不发达》

Córdova, Armando. *Inversiones extranjeras y subdesarrollo*. Caracas,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conómicas y Sociales, 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1968(mimeo).

科西奥·比利亚赫斯，丹尼尔：《墨西哥现代史，波菲利奥统治时期，经济生活》

Cosio Villegas, Daniel. *Historia Moderna de México, el Porfiriato, Vida economica*. Mexico, Hermes, 1965, 2 vols.

昆塔纳，马蒂亚斯，载昆塔纳，米格尔：《埃斯特万对安图尼亚诺》

Quintana, Matias, in Quintana, Miguel. *Estevan an Antuñano*. México, Secretaria de Hacienda, 1957.

L

拉科斯特，伊夫等：《阿尔及利亚今昔》

Lacoste, Yves, Nonschi, André, and Prenant, André. *L'Algérie, passé et présent*.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n.d.

拉腊斯，何塞：《卡斯蒂利亚治下的重商主义时代(1500—1700)》

Larraz, José. *La época del mercantilismo en Castilla* (1500—1700). Madrid, Atlas, 1943.

拉米雷斯·内科恰，埃尔南：《智利独立的经济背景》

Ramírez Necochea, Hernán. *Antecedente económicos de la Independencia de Chile*. Santiago,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Educación, U. de Chile, 1967, 2nd ed.

莱本斯坦，哈维：《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

Leibenstein, Harvey.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7.

莱文,乔纳森:《出口经济社会,从历史角度看它们的发展格局》

Levin, Jonathan. *The Export Economies, Their Pattern of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雷维拉,吉盖多伯爵:《关于1993年耶稣会传教团的报告以及留交布朗西福特1794年的指令》

Revilla Gigedo, Conde de. *Informe sobre las Misiones* 1793 *e instrucción reservada al Marqués de Branciforte* 1794. México, Editonal Jus, 1966. Colección México Heroico, no. 50.

利普塞特,西摩·马丁:《第一个新国家,从历史与比较角度看美国》

Lipset, Seymour Martin.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67.

利斯特,弗里特里希:《政治经济学全国体系》

List, Friedrich.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56.

里亚德,哈桑:《纳赛尔的埃及》

Riad, Hassan. *L'Egypte nassérienne*. Paris, Ed. de Minuit, 1964.

里贝罗,达西:《美国各民族的文化—历史构型》

Ribeiro, Darcy. 'The Culture-Historical Configurations of the American Peoples', *Current Anthropology*, Chicago, Oct. 1970.

李嘉图,大卫:《政治经济学原理与税收》

Ricardo, Davi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1817.

列宁,V.I.:《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Lenin, V. I.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Collected Works, vol. 3.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Selected Works, vol. 1, Part 2,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刘易斯,W.阿瑟:《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经济发展》,载阿加拉瓦拉与辛格《不

发达经济学》

Lewis, W. Arth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in Aggarawala, A. N., and S. P. Singh,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卢森堡,罗莎:《资本积累》

Luxemburg, Rosa.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4.

洛克伍德,威廉·W.:《日本的经济发展,增长与结构变化》

Lockwood, William W.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战后的远东贸易关系》,载《美国经济评论》第 XXXⅢ卷第 1 期

——'Postwar Trade Relations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XXⅢ, no. 1, Supplement, Part 2, Mar. 1943.

罗廷森,马克西姆:《伊斯兰与资本主义》

Rodinson, Maxime. *Islam et Capitalis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罗德尼,沃尔特:《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背景下上几内亚海岸的非洲奴隶制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压迫》,载《非洲史杂志》第Ⅱ卷第 3 期

Rodney, Walter. 'African Slavery and other Forms of Social Oppression on the Upper Guinea Coas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tlantic Slave-Trad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Ⅱ, 3, 1966.

罗米欧,卡洛斯:《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经济发展》

Romeo, Carlos. *Comercio exterior, intercambio desigual, desarrollo económico*. La Habana, Ministerio de Industrias, 1964 (mimeo).

罗莎,何塞·玛丽亚:《我们经济独立的维护和丧失》

Rosa, José Maria. *Defensa y pérdidad de nuestra independencia económica*. Buenos Aires, Libreria Huemul, 1964, 2nd ed.

M

马里尼,鲁伊·毛罗:《依附的辩证法》

Marini, Ruy Mauro. *La Dialectica de la Dependencia*. Mexico, Ediciones Era, 1973.

马丁内斯,阿尔贝托与阿兰达,塞尔希奥:《智利经济发展中的工业与农业》

Martínez, Alberto y Aranda, Sergio. *La industria y la agricultura en eldesarrollo económico chileno*. Santiago, Instituto de Economia y Planificación, Universidad de Chile, 1970.

马克思,卡尔:《资本论》

Marx, Karl. *Capital*.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9—62, 3 vols.

——《政治经济学批判》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Charles Kerr, 1904.

——《哲学的贫困》

——*La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Alfred Coste Ed., 1950.

麦格道夫,哈里:《帝国主义时代》

Magdoff, Harry. *The Age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迈耶,杰拉尔德·M.:《发展的国际经济学》

Meier, Gerald M.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曼彻斯特,阿伦·K.:《英国优势在巴西的兴衰》

Manchester, Allan K. *British Preeminence in Brazil: its Rise and Fall*.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3.

曼德尔,欧内斯特:《第三世界的原始积累与工业化》

Mandel, Ernest. 'L'accumulation primitive et l'industrialisation du Tiers-Monde', in Victor Fay (ed.), *En Partant du capital*. Paris, Editions Anthropos, 1968, and corrected version in *Pensamiento Critico*. La Habana, no. 36, Jan. 1970.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2 vols.

曼尼克斯,丹尼尔·P.与考利,马尔科姆:《黑色的货物,大西洋奴隶贸易史,1518—1865》

Mannix, Daniel P., and Cowley, Malcolm. *Black Cargoes. 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518—1865.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2.

芒图,保罗:《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

Mantoux, Pau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64(original French ed. 1907).

毛泽东:《矛盾论》

Mao Tse-tung. 'On Contradiction,' in *Collected Work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7, vol. Ⅰ.

美国普查局:《美国殖民地时期至 1957 年的历史统计》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明茨,西德尼:《作为社会—文化区域的加勒比地区》

Mintz, Sidney. 'The Caribbean as a Socio-Cultural Are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IX,4, 1966.

缪达尔,贡纳:《亚洲戏剧》

Myrdal, Gunnar. *Asian Drama*. New York. Pantheon, 1968, vol. I.

——《经济理论与不发达领域》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Regions*. London, Duckworth, 1957.

莫罗,弗里德里克:《欧洲的扩张,1600—1870》

Mauro, Frederic. *L'expansion Europénne* 1600—1870.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走向洲际模式,1500 年与 1800 年之间的欧洲海外扩张》

——'Towards an Intercontinental Model. European Overseas Expansion Between 1500 and 18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V, no. Ⅰ, Aug, 1961.

莫姆森,沃尔夫冈:《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和他的全球史哲学》

Mommsen, Wolfgang. 'Le sociologie politique de Max Weber et sa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Revue International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XVⅢ, Ⅰ, 1965, reprinted in José Sazbón(ed.), *Presencia de Max Weber*. Buenos Aires, Nueva Visión, 1971.

穆尔,小巴林顿:《独裁与民主的社会根源》

Moore, Barrington,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穆克吉,拉马克里希纳:《东印度公司的兴衰》

Mukherjee, Ramkrishn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5;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N

内特尔斯,柯蒂斯·P.:《英国的重商主义与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Nettels, Curtis P. 'British Mercantilism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Ⅻ, 2, Spring 1952, reprinted in William Appelman Williams,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Diplomacy*. Chicago, Rand McNally, 1956, vol. Ⅰ, 1750—1900.

——《一种国民经济的出现》

Nettels, Curtis P.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Economy*. 1775—1815.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2.

尼赫鲁,贾瓦哈尔拉尔:《印度的发现》

Nehru, Jawaharlal. *The Discovery of India*.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60

尼古劳斯,马丁:《工人贵族的理论》



Nicolaus, Martin. 'The Theory of the Labor Aristocracy', *Monthly Review*, New York, XX I, no. II, Apr. 1970.

——《无人知晓的马克思》

——'The Unknown Marx', *New Left Review*, London 1968.

涅托.阿尔特塔,路易斯·爱德华多:《关于哥伦比亚经济文集》

Nieto Arteta, Luis Eduardo. *Ensayos sobre economic colombiano*. Medellin. Oveja Negra, 1969.

诺曼,赫伯特·E.:《日本成为现代国家而兴起》

Norman, Herbert E.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诺思,道格拉斯·C.:《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

North, Douglass C.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New York, Norton, 1966.

——与托麦斯,罗伯特·保罗:《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

——and Thomas, Robert Paul.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III, I, Apr. 1970.

P

帕卢瓦,克里斯蒂昂:《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Palloix, Christian. *L'économie mondiale capitaliste*. Paris. Maspéro, 1971, 2 vols.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Imperialisme et mode de production capitalist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Paris, no. 12, 1969a.

——《开放经济中增长的问题》

——*Problèmes de la croissance en économie ouverte*. Paris Maspéro, 1969b.

——《帝国主义问题》

——'La question de l'imperialisme chez V. I. Lenin et Rosa Luxemburg', *L'homme et la société*, Paris, 15, Jan.-Feb.-Mar. 1970.

帕雷拉·丹尼斯，阿尔弗雷多：《阿根廷统治阶级与宗主国之间关系的性质》

Parera Dennis, Alfredo. 'Naturaleza de las relaciones entre clases dominantes argentinas y las metropolis', *Fichas*, Buenos Aires, I año, no. 4, Dec. 1964.

帕森斯，塔尔科特：《社会学理论与现代社会》

Parsons, Talcott.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帕里，J. H.：《复兴的时代》

Parry, J. H.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New York, Mentor, 1964.

——《欧洲霸权的确立：1415—1715，复兴时代的贸易与探险》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pean Hegemony: 1415—1715. Trade and Exploration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1.

——《欧洲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1415—1715》

——*Europe and a Wider World 1415—1715*. London, Hutchinson, 1949.

P

普里奥巴曾斯基，E.：《新经济学》

Preobazhensky, E. *The New Econom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Q

钱德拉，比潘：《印度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Chandra, Bipan. *The Rise and Growth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India*. New Delh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6.

乔齐尔—科瓦尔斯基，斯坦尼斯拉夫：《韦伯与马克思》

Jozyr-Kowalski, Stanislaw. 'Weber and Marx.' *Polish sociological Bulletin*, I (17), Warsaw, 1968, reprinted in Spanish in José Sazbón (ed.), '*Presencia de Max Weber*. Buenos Arien. Nueva Visión, 1971.

S

萨克，奥马尔·塞拉尔：《Tansimat 与我们的工业》，载伊萨维，查尔斯编《中东经济史，1880—1914》

Sarç，Omar Celal. 'Tansimat ve Sanayimis'(The Tansimat and our Industry) in Issawi，Charles (ed.)，*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1880—1914*.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

塞缪尔森，库尔特：《宗教与经济行为，对马克斯·韦伯的批判》

Samuelsson，Kurt. *Religion and Economic Action. A Critique of Max Weber*. 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1.

塞塞尼亚，何塞·路易斯：《外部渗透与墨西哥的权力集团》

Ceceña，José Luis. 'La penetración extranjera y los grupos de poder en México (1870—1910)'，*Problemas del Desarrollo*，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Economía，México，año I，no. 1，Oct，Dec，1969.

桑托斯·马丁内斯，佩德罗：《总督辖区时期门多萨的经济史，1778—1818》

Santos Martínez，Pedro. *Historia económica de Mendoza durante el virreinato*，1778—1818. Madrid，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uyo，1961.

森，博瓦尼：《印度农业关系的演化》

Sen，Bhowani. *Evolution of Agrarian Relations in India*. New Delhi，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62.

绍尔，卡尔·O.：《早期拉丁美洲大陆》

Sauer，Carl O.，*The Early Spanish Mai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施莱辛格，A. M.：《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1763—1776》

Schlesinger，A. M. *The Colonial Merchant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76*. New York，1918.

施洛特·W.：《1700 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海外贸易》

Schlote，W. *British Overseas Trade from 1700 to the 1930'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

史密斯，托马斯·C.:《现代日本的农业渊源》

Smith, Thomas C.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reprinted New York, Atheneum, 1966).

斯密，亚当:《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7(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776).

斯塔克，沃纳:《马克斯·韦伯与目的的外生性》

Stark, Werner. 'Max Weber and the Heterogony of Purposes', *Social Research*, XXIV, 2, 1967, reprinted in José Sazbón(ed.), *Presencia de Max Weber*. Buenos Aires, Nueva Visión, 1971.

斯塔瓦里亚诺斯，L.S.编:《现代人史诗集》

Stavarianos, L.S. (ed.) *The Epic of Modern Man.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66.

——《1500年以来的世界:全球史》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66.

斯威济，保罗、多布，莫里斯、高桥、希尔顿、罗德尼、希尔，克里斯托弗:《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Sweezy, Paul., Dobb, Maurice, Takahashi, K., Hilton, Rodney, and Hill, Christopher.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New York, Science and Society, 1963.

松巴特，沃纳:《现代资本主义》

Sombart, Werner.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München, Duncker & Humbolt, 1922, 5th ed.

苏勒—卡纳尔，让:《黑非洲，殖民地时代，1900—1945》

Suret-Canale, Jean. *Afrique noire. L'ère coloniale* 1900—1945. Paris, Ed. Sociales, 1964.

索纳，丹尼尔与艾丽斯:《印度的土地与劳工》

Thorner, Daniel and Alice. *Land and Labour in India*. Bombay, Asia publish-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

ing House, 1962.

索尔,S. B.:《英国海外贸易研究,1870—1914》

Saul, S. B. *Studies in British Overseas Trade* 1870—1914.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60.

T

德·托克维尔,亚历克西斯:《美国的民主》

De Tocqueville, Alexis.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4, 2 vols. (original French ed. 1835, 1840).

托尼,R. H.:《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Tawney, R. H.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entor, 1945(original edition 1926).

托雷斯—里瓦斯,埃德尔维托:《对中美洲社会发展的说明》

Torres Rivas, Edelberto. *Interpretación del desarrollo social centroamericano*. Santiago, Prensa Latinoamericana, 1969.

W

瓦伊塔尔,路易斯:《对智利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Vitale, Luis. *Interpretación marxista de la historia de Chile*. Santiago, Prensa Latino-americana, vols. 1 and 2, 1968, 1969.

维拉尔,皮埃尔:《资本主义形成的问题》

Vilar, Pierre. 'Problems of the Formation of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no, 10, Nov, 1956.

韦伯,马克斯:《经济通史》

Weber, Max.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0 (original German ed. 1923).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s, 1958(original ed. 1904—5).

威廉斯,埃里克:《资本主义与奴隶制》

Williams, Eric. *Capitalism and Slavery*.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6 (original ed. 1944).

——《特立尼达与多巴哥人民的历史》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rinidad and Tobago*.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64.

沃尔顿,加里·M.:《殖民地商业的新证据》

Walton, Gary M. 'New Evidence on Colonial Commer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VIII, 5, Sept 1968.

沃特金斯,梅尔文·H.:《经济增长的主产品理论》

Watkins, Melvin H. 'A Stapl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in Easterbrook, W. T., and M. H. Watkins (eds.). *Approaches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67.

沃迪斯,杰克:《非洲:造反的根子》

Woddis, Jack. *Africa: the Roots of Revolt*.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60.

沃伊廷斯基,W. S. 与 E. S. 沃伊廷斯基:《世界商业与政府》

Woytinsky, W. S. and E. S. Woytinsky. *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55.

X

希尔格特,福克:《多边贸易实例》

Hilgerdt, Folke. 'The Case for Multilater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XXIII, no. 1, Supplement Part 2, May 1943.

希尔,波利:《加纳南部的流动可可农》

Hill, Polly. *Migrant Cocoa Farmers of Southern Gha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西德里,桑德罗:《贸易与权力,英葡关系中的非正式殖民主义》

Sideri, Sandro. *Trade and Power. Informal Colonialism in Anglo-Portuguese Relations*. Rotterdam, Rot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70.

锡克,恩德雷:《黑非洲的历史》

Sik, Endre. *The History of Black Africa*. Budapest, Akademiai Kiado, 1966.

夏皮罗,迈耶:《关于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的札记》

Shapiro, Meyer. 'A Note on Max Weber's Politics', *Politics*, New York, vol. 2, 1945, reprinted in José Sazbón(ed.), *Presencia de Max Weber*. Buenos Aires, Nueva Visión, 1971.

谢泼德,詹姆斯,F·与沃尔顿,加里·M.:《英属北美殖民地国际收支中"无形"收益的估计,1768—1772》

Shepherd, James F., and Walton, Gary M. 'Estimates of "Invisible" Earnings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of 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1768—177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X, 2, June 1969.

谢里登,里查德:《1750年以前种植园的发展》

Sheridan, Rich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ntations to 1750. An Era of West Indian Prosperity* 1750—1775. Barbados, Caribbean Universities Press, London, Ginn & Co., 1970.

——《种植园革命与工业革命,1625—1775》

——'The Plantation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625—1775', *Caribbean Studies*, vol. 9, 3, Oct. 1969.

辛格,H. W.:《投资国与借贷国之间的收益分配》

Singer, H. W.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1950.

欣克勒默特,弗朗兹:《不平等发展的辩证理论》

Hinkelammert, Franz. 'Teoría de la dialéctica del desarrollo desigual', *Cuadernos de la Realidad Nacional*, Santiago, no. 6, Dec. 1970.

Y

耶茨,拉马丁·P.:《外贸四十年》

Yates, Lamartine P. *Forty Years of Foreign Trad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9.
伊斯特布鲁克,W. T. 与沃特金斯,M. H.:《加拿大经济史探讨》
Easterbrooke, W. T. and Watkins, M. H. *Approaches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67.
伊曼纽尔,A.:《不平等交换》
Emmanuel, A. *L'échange inégal*. Paris, Maspéro, 1969.
伊姆拉,艾伯特·H:《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中的经济因素,十九世纪英国外贸研究》
Imlah, Albert H. *Economic Elements in the Pax Brittanica. Studies in British Foreign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英国的国际收支和资本输出,1816—1913》
——'British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Export of Capital 1816—191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852.
伊萨维,查尔斯:《1800年以来的埃及:对不平衡发展的研究》
Issawi, Charles. 'Egypt since 1800: a Study in Lop-side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 no. I, Mar, 1961.

索　　引

（字头按汉语拼音音节次序排列，旁注
数字为原书页码，请按本书边码查阅）

A

阿布代尔—马利克，阿努瓦 Abdel-Malek, Anouar, 155, 156

阿吉拉尔，M.阿朗索 Aguilar, M. Alonso, 140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33；阿尔及利亚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156

阿里，穆罕默德 Ali, Mohammed, 154

阿拉尔将军 Allard, General, 143

阿明，萨米尔 Amin, Samir, Ⅺ, 5, 8, 9, 12, 103, 107, 109, 117, 133, 158, 159, 173

阿拉伯世界与帝国主义 Arab world and imperialism, 154—157

阿根廷 Argentina, 49, 84, 117, 126—127, 132, 141, 167, 170, 174, 185, 186, 193, 196, 198

阿伦，雷蒙德 Aron, Raymond, 25

阿里吉，乔瓦尼 Arrighi, Giovanni, Ⅺ, 6, 7, 158, 159, 163, 164

阿斯特萨诺，爱德华多·B. Astesano, Euardo B., 85

埃及 Egypt, 115, 129, 132, 144, 154—156

澳大利亚 Australia, 11, 24, 33, 42, 43, 117, 120, 121, 126—127

B

巴伦，保罗 Baran, Paul, 4, 153

巴巴多斯种植园制度 Barhados, plantation system in, 50—51
巴勒斯坦 Palesfine, 11
巴拿马 Panama, 166
巴拉圭 Paraguay, 85, 129, 167, 174
巴勒特—布朗,迈克尔 Barrat-Browne, Michael, 182, 194
巴斯蒂德,罗杰 Bastide, Roger, 25
巴西 Brazil, 20, 23, 44, 50, 52—55, 86, 96, 127, 132, 167, 170, 193

拜罗奇,保罗 Bairoch, Paul, 131

贝特尔海姆,查尔斯 Bettelheim, Charles, 4, 5, 107, 109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190;北美洲的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of, 79—82
本迪克斯,赖因哈德 Bendix, Reinhard, 25

比尔德,查尔斯 Beard, Charles, 63
比利时 Belgium, 29
比较利益 Comparative advantage:比较利益与自由贸易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free trade, 94—101;比较利益理论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101, 105
秘鲁 Peru, 22, 23, 35, 44, 55, 159;秘鲁的矿业经济 mining economies in Peru, 45—47
边际生产率理论 Theory of marginal productivity, 101

伯恩鲍姆,诺曼 Birnbaum, Norman, 27
波克 Boeke, J.H., 110, 111, 150
博利瓦尔,西蒙 Bolivar, Simon, 82
玻利维亚 Bolivia, 23
博克斯,佩勒姆 Box, Pelham H., 85

剥削 Exploitation，4；剥削的时期 periods of exploition，7，11
波多黎各 Puerto Rico，48，86

布鲁切，斯图尔特 Bruchey，Stuart，30，57—62，79—81
布里登博，卡尔 Bridenbaugh，Carl，59
不发达殖民地 Underdeveloped colonies，11—12
不发达国家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5；不发达国家与二元理论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ualist theory，111；不发达国家的出口盈余 export surplu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193；对不发达国家的投资 investment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198；不发达国家贸易统计 trade statistic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179—189
不发达 Unerdevelopment，11；不发达与阶级结构 underdevelopment and class structure，122—125；美洲的不发达与发展 under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in America，25—69；美国的不发达与发展 under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in United States，79—81；英国造成的不发达 underdevelopment by Britain，86；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44，50，138，142；非洲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Africa，160—164；阿尔及利亚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Algeria，156；埃及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Egypt，154—156；印度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India，87—91，146—149；东南亚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South East Asia，149—151；不发达的内部决定论对“外部”决定论 internal v. “external” determination of underdevelopment，2—7；殖民地的不发达 underdevelopment of colonies，30；不发达的结构理论 structural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2
不平等的交换 Unequal exchange，9，12，13，18，22，24，31，78，103—110，117，123，173

C

出口余额 Export balances, 199

出口统计 Export statistics, 179—189

出口盈余,不发达国家的 Export surplu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193

出口与进口数据 Exports and import data, 208;原料出口 exports of raw materials, 208;世界商品出口 world merchandise exports, 195—196

D

戴维森,巴兹尔 Davidson, Basil, 20, 162

戴克 Dike, K., 157

丹麦 Denmark, 104

德国 Germany, 26, 95, 98, 129, 145, 182, 185

迪亚斯,波菲里奥 Diaz, Porfirio, 167, 169

迪恩,菲利斯 Deane, Phyllis, 74

帝国主义 Imperialism:帝国主义与非洲 Imperialism and Africa, 157—164;帝国主义与阿拉伯世界 Imperialism and Arab world, 154—157;帝国主义在亚洲 Imperialism in Asia, 146—154;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 Imperialism in Latin America, 164—171

第三产业部门的增长 growth of tertiary sector, 119

东南亚 South-east Asia, 149;东南亚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149—151;东南亚的贸易格局 South-east trading pattern, 190

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75, 88, 90, 114, 149

杜德,帕姆 Dutt, R. Palme, 191

对外投资 foreign investments, 189—190;英国的对外投资 foreign investments by Britain, 195, 198

对外贸易 foreign trade, 39—40;英国的对外贸易 foreign trade from Britain, 77;对外贸易对农业 foreign trade v. farming, 58—69

多布,莫里斯 Dobb, Maurice, 41

多边融资,商业的 Multilateral financing of trade, 16

多边贸易与英国 Multilateral trade and Britain, 197

多边贸易余额 Multilateral trade balances, 189

多边贸易不平衡 Multilateral trade imbalances, 176—189

E

俄国 Russia, 121,132, 135, 144

二元结构 Dualism, 110—112

二元主义理论与不发达国家 Dualist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111

F

发展 Development, 11, 12;资本主义发展与工业化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in dustrilisation, 11;美洲的发展与不发达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Africa, 25—69, 79—81;资本主义发展 capitalist development, 76,78,86,87,129;非洲的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merica, 158;美洲的发展 development in America, 21—23;阿根廷的发展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126—127;澳大利亚的发展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126—127;日本的发展 development in Japan, 153—154;拉丁美洲的发展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82 87;发展的"内部"对"外部"决定论"internal"v."external"determination of develop-

ment,2—7；国内市场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market，121—128，130，138；殖民地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colonies，36—37；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44，50，138，142；非洲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Africa，160—164；阿尔及利亚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Algeria，156；埃及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Egypt，154—156；印度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India，87—91，146—149；东南亚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South East Asia，149—151；美国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ited States，124—125；发展的结构理论 structural theory of development，2；世界资本主义发展 world capitalist development，149，152，156，164

发展理论的恶性循环 vicious circle of development theory，1

法莱托，恩佐 Faletto，Enzo，170

法农，弗兰兹 Fanon，Franz，158

法国 France，50，78，142

范登博什 van den Bosch，J.，151

非洲 Africa，14，17，23，77，79，113—119，137，142，175；非洲与帝国主义 Africa and imperialism，157—164；英国在非洲 Britain in Africa，159；非洲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Africa，160—164；非洲的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158；非洲的农民经济 peasant economy in Africa，162—164；非洲的移民拓殖 settlement in Africa，159—161；对非洲的奴隶贸易 slave trade with Africa，19—21；对非洲的贸易 trade with Africa，21

费雷尔，阿尔多 Ferrer，Aldo，86，122

费 Fei，J. C. H.，110

菲尔德豪斯 Fieldhouse，D.K.，194

分期问题 question of periodisation，7—10
封建主义 Feudalism，41

福克兰群岛 Falkland Islands，174
福格尔，罗伯特 Fogel，Robert W.，79
弗兰克，安德烈·冈德 Frank，Andre Gunder，5，19，84，111，141
富兰克林，本杰明 Franklin，Benjamin，66
弗里德曼，米尔顿 Friedman，Milton，37
弗尼瓦尔 Furnivall，J. S.，151

G

高尔曼，罗伯特 Gallman，Robert E.，79
高夫，凯瑟琳 Gough，Kathleen，141
高桥 Kohachiro Takahashi，41

盖勒，卢西奥 Geller，Lucio，126

甘地，圣雄 Mahatma Gandhi，148

哥伦比亚 Colombia，49，85
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49，166
格尔茨，克利福德 Geertz，Clifford，18，149，164
格特，汉斯 Gerth，Hans，25，26
格兰特，尤利塞斯 Grant，Ulysses S.，79
格雷，刘易斯 Gray，Lewis C.，43，52—53，55，56，57
格拉—桑切斯，拉米罗 Guerra y Sanchez，Ramiro，47
格瓦拉，埃内斯托·切 Guevara，Ernesto Che，107
工资 Wages，12；工资与生产率 wages and productivity，107；工资与利润 wages and profits，105；工资与不平等交换 wages and unequal ex-

change, 108
工业增长 Industrial growth, 132
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70—91, 130—133
工业化 Industrialisation：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发展 industrialisatio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11；美洲的工业化与联系效应 industrialisation and linkages in America, 115；英国的工业化与联系效应 industrialisation and linkages in Britain, 114—115；印度的工业化与联系效应 industrialisation and linkages in India, 115；拉丁美洲的工业化 industrialisation in Latin America, 84—87
工业 Industry：新兴工业 infant industry, 128—129；航运业 shipping industry, 63, 67
古巴 Cuba, 48, 86
古尔德纳，阿尔文 Gouldner, Alvin W., 25, 26, 27
国际分工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16, 75—78, 100, 101, 103, 111, 128, 130, 132, 137, 138
国家作用，拉丁美洲的 State role in Latin America, 169
国富 Wealth of nations, 1
国贫 Poverty of nations, 1
国际收支 Balance of payments, 172

H

哈格里夫斯 Hargreaves, J.D., 20
哈洛，文森特 Harlow, Vincent, 50
哈珀，劳伦斯 Harper, Lawrence A., 63
海地 Haiti, 48
海峡移民拓殖 Straits settlements, 192, 194

汉密尔顿，亚历山大 Hamilton, Alexander, 62, 98
航运业 Shipping industries, 63, 67

赫希曼,艾伯特 Hirschman, Albert, 115
荷兰 Holland, 40, 41, 50, 95, 150
亨廷顿 Huntington, 32
洪都拉斯 Honduras, 166
华盛顿,乔治 Washington, George, 54
霍尔珀林-唐伊,图利奥 Halper in Donghi, Tulio, 84, 87, 169, 188
霍布斯鲍姆 Hobshawm, E. J., 70, 74
霍夫曼,瓦尔特 Hoffmann, Walter G., 131, 132

J

积累与生产 Accumulation and production, 134—139;资本积累 capital accumulation, 116,139;资本积累与卡尔·马克思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Karl Marx, 38—43;资本积累的历史进程 historical proces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XⅢ 10, 43;宗主国资本积累 Metropolitan capital accumulation,71—75, 189—190;新英格兰资本积累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New England, 66;资本主义积累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143;世界资本积累 world capital accumulation, 13, 21, 23, 78, 86, 87, 105, 129, 140, 170;世界资本积累进程 world proces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XI
技术差距 Technological gap, 130
吉诺维斯,尤金 Genovese, Eugene, 123
加拿大 Canada, 11, 23, 55, 117, 120, 121, 126, 183, 192, 198
加勒比 Caribbean, 19, 20, 23, 44, 47, 52—55, 60, 64—65, 115, 149, 167
加贝尔,约瑟夫 Gobel, Joseph, 26
加勒廷,艾伯特 Gallatin, Albert, 79
交换问题 Questions of exchange, 10
交换关系 Exchange relations 8, 10
阶级结构与不发达 Class structure and underdevelopment 122—125

杰弗逊,托马斯 Jefferson, Thomas, 54
结构主义者 Structuralists, 5
进口与出口数据 Import and export data, 208
进口余额 Import balances, 199
进口统计 Import statistics, 179—189
进口替代 Import substitution, 128—130, 137
金德尔伯格,查尔斯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03, 113
经济发展,非洲的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158
经济增长,北美的 Economic growth of North America, 79—82
经济,农民 Peasant economy, 150;经济与资本贷款 economy and capital loans, 144—145;非洲的农民经济 peasant economy in Africa, 162—164;中国的农民经济 peasant economy in China, 152
经济民族主义,印度的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India, 99

K

卡多佐,费尔南多·恩里克 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85, 170
卡普兰,马科斯 Kaplan, Marcos, 84, 169
坎宁,乔治 Canning, George, 82
康德利夫 Condliffe, J.B., 174,176,205
考茨基,卡尔 Kautsky, Karl, 25
科茨沃思,约翰 Coatsworth, John, 141
科尔 Cole, W.A., 74
科尔多瓦,阿曼多 Cordova, Armando, 110, 168
柯廷,菲利浦 Curtin, Philip, 20
科尔科,加布里埃尔 Kolko, Gabriel, 30
克罗默,洛德 Cromer, Lord, 155
凯斯卡马霍克农村调查 Keiskammahock Rural Survey, 161
矿业经济学 Mining economics, 45—47
魁北克 Quebec, 44

L

拉科斯特,伊夫 Lacoste, Yves, 156

拉丁美洲 Latin America, 19, 31, 77, 78, 79, 113, 116—118, 129, 137, 149, 175;拉丁美洲的发展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82—87, 164—171;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 imperialism in Latin America, 164—171;拉丁美洲的工业化 industrialisation in Latin America, 84—87;拉丁美洲的自由派改革 liberal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165—167;宗主国在拉丁美洲 metropolis in Latin America, 168—170;拉丁美洲的国家作用 role of state in Latin America, 169;拉丁美洲的贸易 trade in Latin America, 83

拉德克利夫—布朗 Radcliffe-Brown, A. R., 141

拉米雷斯·赫尔曼 Ramirez, Herman, 83

拉尼斯 Ranis, G., 110

莱维内,里卡多 Levene, Ricardo, 83

赖因斯马 Reinsma, R., 150

兰德斯,戴维 Landes, David, 73

劳工,西班牙对劳工的剥削 Labour exploitation by Spain, 45—50;流动劳工 migrant labour, 161, 162

勒鲁瓦—博利厄,保罗 Leroy-Beaulieu, Paul, 43

利普塞特,西摩 Lipset, Seymour, 59

利润与贸易政策 Profit and trade policy, 136;利润与工资 profit and wages, 105

里斯本 Lisbon, 96

利斯特,弗里德里希 List, Friedrich, 92, 94, 95, 97

里亚德,哈桑 Riad, Hassan, 153

里贝罗,达西 Ribeiro, Darcy, 30, 31, 33, 59

李嘉图,大卫 Ricardo, David, 38, 92, 93, 95, 98, 136

联系效应 Linkages, 112;美洲的工业化与联系效应 industrialisation and

linkages in America, 115;英国的工业化与联系效应 industrialisation and linkages in Britain,114—115;印度的工业化与联系效应 industrialisation and linkages in India,115;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 backward and forward linkages, 113—121;

列宁 Lenin, V. I., 4, 115, 128, 134, 138, 141, 194

刘易斯,阿瑟 Lewis, W. Arthur, 110

卢格德,洛德 Lugard, Lord, 141

卢森堡,罗莎 Luxemburg, Rosa, 135, 141—146, 147, 154, 155, 161, 164, 167

洛克伍德,威廉 Lockwood, William W., 153

罗兹,塞西尔 Rhodes, Cecil, 141

罗得西亚 Rhodesia, 11, 164

罗伯逊 Robertson, H. M., 25, 29

罗廷森,马克西姆 Rodinson, Maxime, 26

罗德尼,沃尔特 Rodney, Walter, 20

M

贸易经济学 Economics of trade, 93

马尔库塞,赫伯特 Marcuse, Herbert, 25

马里尼,鲁伊·毛罗 Marini, Ruy Mauro, 133, 138, 168

马歇尔,艾尔弗雷德 Marshall, Alfred, 37

马丁,马格雷特 Martin, Margaret, E., 79

马丁内斯,阿尔贝托-阿兰达,塞尔希奥 Martinez, Alberto y Aranda, Sergio, 12

马克思,卡尔 Marx, Karl, 1, 2, 3, 14, 23, 25, 28, 38—43, 54, 60, 71, 75, 88, 128, 136, 137, 141

马克思与韦伯的比较 Marx and Weber, comparison, 26—28

马克思主义 Marxism, 7

迈耶,杰拉尔德 Meier, Gerald M., 103

麦格道夫,哈里 Magdoff, Harry, 108
曼彻斯特 Manchester, 72
曼德尔,欧内斯特 Mandel, Ernest, XIII, 8, 9, 13, 73, 78, 194
曼海姆,卡尔 Mannheim, Karl, 25
曼尼克斯,丹尼尔 Mannix, Daniel P., 15
芒图,保罗 Mantoux, Paul, 74
毛泽东 Mao Tse-tung, 2, 3, 6
贸易,英印 Trade between Britain and India, 97, 191—193;英葡贸易 trade between Britain and Portugal, 95—97;英美贸易 trade between Britain and United States, 68—69;欧亚贸易 trade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17—19;西印度群岛与美国之间的贸易 trade between West Indies and United States, 66; 加勒比贸易 Caribbean trade, 64—65;殖民地贸易 Colonial trade, 15;贸易经济学 economics of trade, 93;英国的贸易条件 terms of trade for Britain, 101—102;对外贸易, foreign trade, 39—40;英国的外贸 foreign trade from Britain, 77;外贸对农业 foreign trade v. farming, 58—69;自由贸易, Free trade, 75, 86, 131;自由贸易与比较利益 free trad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94—101;自由贸易和德国 free trade and Germany, 98;自由贸易与美国 free trade and United States, 98;英国的自由贸易 free trade in Britain, 94;智利的自由贸易 free trade in Chile, 100;拉丁美洲的贸易 trade in Latin America, 83;印度的贸易 trade in India, 88—90;多边贸易与英国 multilateral trade and Britain, 197;贸易的多边融资 multilateral financing of trade, 16;奴隶贸易与奴隶制 slave trade and slavery, 15, 19—21, 51, 53, 54, 57, 66, 72, 124—125, 157;贸易条件 terms of trade, 101—103;对非洲贸易 trade with Africa, 21;对印度贸易 trade with India, 72;世界贸易的扩大 expansion of world trade, 76—78;世界贸易地区 world trade regions, 205;世界贸易统计 world trade statistics, 200—208
贸易余额,英国的 Trade balances of Britain, 192; 美国的贸易余额 trade balances of United States, 193

贸易增长,英国的 Trade growth in Britain, 71—75

贸易不平衡 Trade imbalance, 172;多边贸易不平衡 multilateral trade imbalance, 176—189;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格局 patterns of world trade imbalance, 173—205

贸易格局,英国的 Trade patterns of Britain, 16

贸易政策与利润 Trade policy and profit, 136

贸易三角 Trade triangles, 14—17, 67, 72

美国United States, 11, 19, 20, 23, 31, 44, 55—58, 103, 115, 116, 117, 120, 174, 192, 193, 196, 197, 198;美英贸易 trade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66—69;美国与自由贸易 United States and free trade, 98;美国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 trade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West Indies, 66;美国的发展与不发达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United States, 79—81;美国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ited States, 124—125;美国的重商主义发展 mercantile development in United States, 61—69;美国东北部 North-east of United States, 58—69;美国的种植园制 plantation system in United States, 52—55;美国的贸易收支 trade balance of United States, 193;美国的贸易统计 trade statistics of United States, 177—189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145

美洲 America, 14;美洲的发展与不发达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America, 21—23, 25—69;美洲的工业化与联系效应 industrialisation and linkages in America, 115;另参见拉丁美洲;北美;南美;美国

米尔斯,赖特 Mills, C. Wright, 25, 26

米特雷,巴托洛梅 Mitre, Bartolome, 127

民粹派 Narodniks, 135

明茨,西德尼 Mintz, Sidney, 53

缪达尔,贡纳 Myrdal, Gunnar, 92, 103

墨西哥 Mexico, 22, 23, 35, 44—47, 55, 83, 85, 132, 159, 166, 167, 169, 171

莫姆森,沃尔夫冈 Mommsen, Wolfgang, 26
穆尔,巴林顿 Moore, Barrington, 152
穆克吉,拉马克里希纳 Mukerjee, Ramakrishna, 19, 90

N

拿破仑 Napoleon Bonaparte, 157
奈特,弗兰克 Knight, Frank, 37
南非 South Africa, 11, 103
南美 South America, 192
内特尔斯,柯蒂斯 Nettels, Curtis, P., 61
尼赫鲁,贾瓦哈尔拉尔 Nehru, Jawaharlal, 147, 148
尼加拉瓜 Nicaragua, 166
尼古劳斯,马丁 Nicolaus, Martin, 42
农民经济 Peasant economy, 150;农民经济与资本贷款 peasant economy and capital loans, 144—145;非洲的农民经济 peasant economy in Africa, 162—164;中国的农民经济 peasant economy in China
奴隶种植园对农业 Slave plantations v. farming, 55—58
奴隶制与奴隶贸易 Slavery and Slave trade, 15, 19—21, 51, 53, 54, 57, 66, 72, 124—125, 157
诺思,道格拉斯 North, Douglass C., 62, 79, 124—125
诺曼 Norman, E. H., 153

O

欧洲 Europe, 11, 24, 77, 130, 190, 192, 193, 194, 197;欧亚贸易 trade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17—19;欧洲贸易统计 Europe trade statistics, 177—189
欧洲宗主国 European metropolis, 14, 23, 88

P

帕德莫尔,乔治 Padmore, George, 161

帕卢瓦，克里斯蒂昂 Palloix, Christian, 3—4, 5, 74, 109, 133, 135
帕雷拉·丹尼斯，阿尔弗雷多 Parera Dennis, Alfredo, 170
帕森斯，塔尔科特 Parsons, Talcott, 25, 26
庞巴尔侯爵 Marquis de Pombal, 95
海军准将佩里 Commodore Perry, 18
皮门特尔，德乌斯图亚 Pimentel, Deustua, 83
皮内多，费德里科 Pinedo, Federico, 170
葡萄牙 Portugal, 29, 40, 82, 95—97, 129
普雷维什，劳尔 Prebisch, Raúl, 92, 103
普里奥巴曾斯基 Preobazhensky, E., 7, 8, 9, 40

Q

气候因素 Climatic factors, 32
钱德拉，比潘 Chandra, Bipan, 99, 191
清教主义 Puritanism, 30；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 puritanism and capitalism, 58

R

日本 Japan, 24, 104, 120, 129, 132, 146, 153—154, 192

S

萨克，奥马尔·塞拉尔 Sarc, Omar Celal, 154
萨米恩托，多明戈·福斯蒂诺 Sarmiento, Domingo Faustino, 85, 141
萨尔瓦多 El Salvador, 166
塞缪尔森，库尔特 Samuelsson, Kurt, 29, 30, 58
塞塞尼亚，何塞·路易斯 Cecena, José Luis, 169
赛伊 Say, J. B., 97
桑切斯，格拉 Sanchez, Guerra, 47
森，博瓦尼 Sen, Bhowani, 19

沙佩拉 Schapera, I., 161
沙,萨义德 Shah, Said A., XI
绍尔,卡尔 Sauer, Carl O., 47
生产与积累 Production and accumulation, 134—139;资本主义生产 capitalist production, 3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109;生产方式 mode of production, 17—24, 30, 86, 128;生产方式的转型 transform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 77, 140;生产方式的过渡 transitions of modes of production, 40—42;殖民地的资本货生产 production of capital goods in colonies, 113—114;生产的问题 questions of production, 10;原料生产 production of raw materials, 115—121
生产率与工资 Productivity and wages, 107;边际生产率理论 theory of marginal productivity, 101
圣多明各 Santo Domingo, 48
施莱辛格 Schlesinger, A. M., 63
施洛特 Schlote, W., 101, 102, 182
史密斯,托马斯 Smith, Thomas C., 153
世界商品出口 World merchandise exports, 195—196
世界贸易地区 World trade regions, 205;世界贸易统计 world trade statistics, 200—208
市场,国内市场与资本主义 Internal market and capitalism, 134;内部与外部市场 internal and external market, 110—133;国内市场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market, 121—128, 130, 138
斯密,亚当 Smith, Adam, XV, 1, 3, 23, 25, 28, 33—37, 38, 42, 43, 44, 54, 59, 60, 72, 74, 75, 92, 93, 97, 106, 114, 134, 140
斯威济,保罗 Sweezy, Paul, 4, 41
松巴特,沃纳 Sombart, Werner, 28
苏勒—卡纳尔,让 Suret-Canale, Jean, 159
索尔 Saul, S. B., 16, 102, 126, 131, 175, 182, 188, 190, 191, 193, 195, 196

索罗金 Sorokin, P. A., 25

T

塔瓦雷斯,马里亚·德康塞桑 Tavares, Maria de Concepcão, 129
特加斯特 Tergast, G.C.W., 151
特里尼达 Trinidad, 48
特里维廉,查尔斯,爵士 Trevelyan, Sir Charles, 89
土耳其 Turkey, 144, 192
托尼 Tawney, R. H., 29
托雷斯·里瓦斯,埃德尔维托 Torres Rivas, Edelberto, 166
托克维尔,亚历克西斯 Tocqueville, Alexis de, 59

W

瓦伊塔尔,路易斯 Vitale, Luis, 84
瓦特,詹姆士 Watt, James, 70
韦克菲尔德 Wakefield, E.G., 43
韦伯,马克斯 Weber, Max, 25
韦伯,玛丽安娜 Weber, Marianne, 25
韦伯理论 Weber Thesis, 25—33, 58
韦伯与马克思的比较 Weber and Marx, comparison, 26—28
威廉斯,埃里克 Williams, Eric, 15
危地马拉 Guatemala, 166, 167
唯物辩证法 Materialist dialectics, 3
沃勒斯坦,伊曼纽尔 Wallerstein, Immanuel, 5
沃尔顿 Walton, G. M., 67
沃特金斯 Watkins, M. H., 112, 113, 120, 128
沃特海姆 Wertheim, W.F., 18
沃迪斯,杰克 Woddis, Jack, 160, 161
沃伊廷斯基 Woytinsky, W. S. 和 E.S., 13, 18, 24, 76, 77, 182, 183,

195
乌拉圭 Uruguay, 117, 170, 174

X

锡兰 Ceylon, 192, 193
锡克,恩德雷 Sik, Endre, 157
西非 West Africa, 193
西印度群岛 West Indies, 16, 48, 64—66, 72, 74, 192
西蒙,赫伯特 Simon, Herbert, 37
西摩,戴维 Seymour, David, 127
希尔格特,福克 Hilgerdt, Folke, 173, 174, 175, 181, 183, 185, 187, 188, 191, 195, 197, 199—205
希尔,波利 Hill, Polly, 158
西班牙 Spain, 29, 44, 50, 78, 82, 104
夏皮罗,迈耶 Shapiro, Meyer, 26
香港 Hong Kong, 192
小亚细亚 Asia Minor, 145
谢里登,里查德 Sheridan, Richard, 48
欣克勒默特,弗朗兹 Hinkelammert, Franz, 131
辛格 Singer, H. W., 103, 110
形而上学观 Metaphysical outlook, 6
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XIV, 22, 24, 44, 58, 59, 64, 66, 129
新几内亚 New Guinea, 33
新世界与亚当·斯密 New World and Adam Smith, 33—37
新西兰 New Zealand, 11, 24, 33
新教与资本主义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 28—30
叙利亚 Syria, 145

Y

亚当斯,布鲁克斯 Adams, Brooks, 72

亚当斯，约翰 Adams, John, 67

亚洲 Asia, 14, 17, 23, 77, 79, 113—118, 130, 175；亚欧贸易 trade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17—19；帝国主义在亚洲 imperialism in Asia, 146—154

耶茨，保罗·拉马丁 Yates, Paul Lamartine, 208

伊曼纽尔，阿基里 Emmanuel, Arghiri, 5, 9, 12, 17, 30, 31, 40, 92, 94, 103—110, 173

移住民 Transplanted peoples, 32

伊姆拉，艾伯特 Imlah, Albert H., 182

伊斯兰 Islam, 26

伊萨维，查尔斯 Issawi, Charles, 155

意大利 Italy, 29, 104

（非洲的）移民拓殖 Settlement in Africa, 159—161

（对）依附的分析 Analysis of dependence, XII, XIII

印度 India, 18, 19, 23, 78, 114, 115, 119, 129, 130, 132, 175, 193, 198；印英贸易 trade between India and Britain, 97, 191—193；英国在印度 Britain in India, 87—91, 147—148；印度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India, 87—91, 146—149；印度的经济民族主义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India, 99；印度的工业化与联系效应 industrialisation and linkage in India, 115；对印度贸易 trade with India, 72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115, 150, 164

英国 Britain, 29, 41, 44, 50, 117, 129, 156, 167, 174, 190, 194, 196, 198；英印贸易 trade between Britain and India, 97, 191—193；英国与印度 Britain and India, 87—91, 147—148；英国与多边贸易 Britain and multilateral trade, 197；英葡贸易 trade between Britain and Portugal, 95—97；英美贸易 trade between Britain and United States, 68—69；英国的殖民化政策 colonisation policies of Britain, 60, 63；英国的对外投资 foreign investment by Britain, 195, 198；英国的外贸 foreign trade from Britain, 77；英国的自由贸易 free trade in Britain, 94；英国